

青春系列

系列

鄭培凱 主編

我的老師們

隱堂

陳思和



CITYU HK
PRES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的老師們

擴大出版領域影響力 創造學術界更大價值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自2017年建立策略夥伴合作關係，結合雙方在文化與出版上的影響力，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共同策劃，並合作出版學術專著及大眾讀物，聯合引進有共同意向和市場前景的國外版權圖書，分別在內地和香港出版發行。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1996年成立，是香港城市大學的出版部門，一直致力於推動學術研究，傳播知識和富創意的作品，以及提升知識轉移。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主要出版三類書籍：學術書籍，專業書籍及一般書籍，範圍涵蓋文、理、工、社科、商、教育及法政等方面，尤其專於出版有關中國研究、香港研究、亞洲研究、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書籍，竭力出版具地區影響力及長遠價值的作品。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1986年11月18日在桂林成立。多年來，出版社堅持為教學科研服務的出版方向和社會效益優先的出版方針，以「開啟民智，傳承文明」為追求，為履踐自身的文化使命，在以教育出版為中心的基礎上，優化圖書結構，形成了一軸（教育出版）兩翼（學術人文和珍稀文獻出版）、多元並舉的出版格局。

青春
系列

系列

鄭培凱 主編

我的老師們

隱堂



陳思和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項目統籌 陳小歡

實習編輯 陳泳淇（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四年級）

書籍設計

蕭慧敏



Création
城大創意製作

鳴謝

本叢書名「青青子衿」及書名「我的老師們」由鄭培凱教授題字，謹此致謝。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404-4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19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y Teache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404-4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總序	vii
自序	xiii

第一輯

復旦的精神	2
我的老師們	10
《光華文存》序	22
感天動地夫妻情 ——記賈植芳先生和任敏師母	28
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	36
五年來的思念	64
章培恆先生	73
朱東潤先生	82
楚狂陳子展	87
世界盃還沒有結束，您怎麼就走了？ ——告別潘旭瀾教授	91

第二輯

我心中的巴金先生	98
初見冰心	109
忠厚長者許杰	113
瀟灑老人施蛰存	117
康乃馨不再飄香 ——懷念王瑤教授	121

懷念畢修勺先生	130
永遠的浪漫	135
——懷念吳朗西先生	
為自由而抗爭的靈魂	141
——懷念無名氏先生	
獨秀峰下的風景	147
——告別鄭超麟先生	
紀念柯靈先生	151
傅雷的精神遺產	157

第三輯

沈謙先生	164
耀德不見了，文學衰落了	168
《曾敏之評傳》序	177
假如中國現代小說也有「大傳統」	182
——紀念夏志清先生	
《梁披雲評傳》序	191
陳映真先生	197

總序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邀約我編一套叢書，希望由著名的人文學者來執筆，反映文、史、哲、藝各個領域的學術研究，最好是呈現長期累積的研究心得與新知，厚積薄發，深入淺出，讓一般讀者讀得興味盎然。這一套書要有學術內容，但不是那種教科書式的枯燥羅列，或是充滿了學術術語與規範的高頭講章。社長與副社長跟我討論了一番，勸我出面聯繫學界名流，請他們就自己著作中，挑選一些比較通俗而有啟發性的文章，或說說自己在學術研究上最有開創性的心得，編輯成書，出版一個系列，以吸引關心人文知識的讀者，並能刺激青年學者，啟導他們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得到前輩的啟發，追尋有意義的學術方向。

大學出版社出版學術書籍，一般有兩種類別與方向：一是毫無趣味的入門性教科書，雖然言之有物，卻乾巴巴的，呈現某一學術範疇的全面知識，主要提供基礎學問給學生，可以作為回答考試的標準答案。另一類則是學術專題的深入研究，將學者鑽研多年所累積的學術成果撰寫成專著，解決特定的學術問題，為學術的提升貢獻新知，是專家寫給專家看的書籍。

出版社想出的這一套叢書系列，是希望我聯絡學界耆宿，說服他們寫隨筆文章，揭示自己潛泳在學海中的經驗與心得，既要有知識性，有學術的充實內涵，又要有趣味性，點出探求學術前沿與新知的體會。其實，這類文章最難寫，先得吃透了整個學術領域的知識範疇，潛泳其

間，體會出知識體系的脈絡，然後像葉天士那樣的名醫把脈一樣，知道學術研究的病灶難點，指出突破的方向與探索的前景。出版社希望的目標，聽起來很有道理，說起來很輕巧，卻是最難以做到的。

現在有許多學術著作，展示了刻苦鑽研的成果，像清朝的考證學一樣，旁徵博引，把古往今來的相關知識全都引述了一通，類似編了本某一專題的註解大全，最後才說出幾頁自己的研究心得。有些論述長篇累牘，往往沒有什麼新意，只讓我們看到作者皓首窮經的辛苦耕耘，卻不一定有什麼收穫。這樣的研究專著，看來是為了學術職場的升等，寫給學術考核的專家們看的。精深難懂的研究專著，有其出版的必要，因為它總是長期學術耕耘的成果，功不唐捐，甚至有可能是可以傳世的巨作，要經過好幾代學者的分析才能體會其中的奧義。但是，一般而言，大量的學術專著也只是顯示了作者的努力，讓學術同行認可其專家的地位，是給少數研究者看的。有他不多，沒他不少，對學術的發展與知識的傳播，似乎無關緊要。一般的知識精英，對學術有興趣，是想知道研究領域出現了真知灼見，能夠啟動深刻的人文思考，並不想知道某一專題研究的過程與細節，就好像人們都對科學研究的成果感到興趣，卻不肯待在實驗室裏，跟着科學家長年累月觀察實驗的過程。所以，出一套叢書，請學術名家就他們畢生研究的經驗，以隨筆的形式，總結一下心得，則是大家都喜聞樂見的。

接受了出版社的委託，聯絡了一些朋友，大家都很給面子，說「應該的，應該的」，做了一輩子學問，也該總結一下，讓一般讀者知道探求學問的門徑，理解人文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反正都到了退休的年齡，完全不必理會學術職場的名利，可以靜下心來反思自己的學術道路，如何可以金針度人。大家有了撰著的興趣，都問我，這套學者隨筆叢書的名稱是什麼。我突然福至心靈，好像是天上文曲星派了個小精靈來點醒，脫口就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有了，就是「青青子衿」系列。

「青青子衿」一詞，來自《詩經·鄭風·子衿》，詩不長，只有三段：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按照漢代學者的解釋，是講年輕人輕忽了學習，讓老師們有點擔心，希望他們回到學校，認真讀書。陳子展先生是這樣譯成白話的：

青青的是你的衣領，悠悠不斷的是我的憂心。縱使我不往你那裏去，你難道就不寄給我音訊？青青的是你的佩玉綬帶，悠悠不斷的是我的心懷。縱使我不到你那裏去，你難道就不到我這裏來？溜啊踏啊，在城闕啊。一日不見，如三月啊！

這首詩的解釋，過去是有歧義的，主要是朱熹推翻漢代以來的詮釋，認定了「鄭風淫」，所以，這也是一首男女淫奔之詩。結果朱熹的說法成了明清以來的正統解釋，連現代人談情說愛，也都喜歡引述這首詩，特別是「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這兩句，很容易就聯想到《王風・采葛》同樣的詩句，讓人日思月想，情思綿綿。其實，認真說起來，朱熹的說法並不恰當，這首詩也不是一首「淫詩」。漢代的《毛傳》明確指出，「《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對「嗣音」的「嗣」字，解釋得很清楚：「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至於「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說，「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鄭玄則箋解說：「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更延伸解釋：「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也，何為廢學而遊觀乎？」大體說來，從漢到唐的經解詮釋，說的是嚴師益友，互勉向學的意思，比起朱熹突然指為「淫奔之詩」，要恰當得多。

清末的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中，引述古人對《子衿》一詩的理解與傳述，是這麼說的：

魏武《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雖未明指學校，但無別解。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於今。《北史》：大寧中徵虞

喜為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規陵夷，每攬《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宋朱子《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宏《菁莪》之樂育。皆用《序》說。

列舉了曹操以來，歷代對《子衿》的理解與認識，包括朱熹的《白鹿洞賦》在內，都同意《毛序》的詮釋，是關心學業，沒有人提起「淫奔」的想法。也不知道朱熹撰寫《詩經集傳》的時候，是否突然吃錯藥了，滿心只想男女之事，讓後人想入非非。

當然，詩無達詁，可以隨你解釋，只要解釋得通就好。我們採用漢代去古未遠的解釋，希望青年讀者讀了這套書，可以對學術發生興趣，在人文思維方面得到啟發。假如你堅持「青青子衿」是首情詩，那更好，希望你能愛上這套書。

鄭培凱

自序

我不是散文家，也不以寫散文為志業，我一生中斷斷續續寫下的比較感性的文字，也沒有被單獨編輯成書，只是按照編年形式編入我的各類文集。從《馬蹄聲聲碎》開始，我就編入了幾篇人物特寫，以後的類似文字也陸續地編入其他文集。這些文章一直是處於我的整個寫作狀態的邊緣，只是因為心裏積累了太多的感情，才會有必須傾訴出來的慾望。我寫的人物，大多是我尊敬的師長，有些在我成長道路上起過決定性的影響，他們對待我，就像巴金筆下的勇士丹柯，用自己的熱烈的心，為我照亮了前面的路程。我說的是賈植芳先生、巴金先生，沒有他們對我的影響，就沒有今天的我。我寫這兩位老人的事跡，點點滴滴都滲透了我自己內心的感動，其實也是在寫我的心靈的成長過程。還有一些師長，在我求學成長過程中對我有過教誨、有過提攜，或者是直接幫助過我，他們中有些人與我只有一面之緣，有的則是忘年之交，他們在我的生命中產生過的溫暖和影響，是我不能忘記的。還有，第三輯收了幾篇寫台灣朋友的文章，我與他們有過交往，有的是我尊敬的前輩，他們已經故去，我寫下這些文字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們的音容笑貌能夠長留在我的心間。本書裏所寫的人物中，只有兩位先驅者我無緣瞻仰，一位是傅雷，一位是梁披雲，但他們的精神長存，也是後輩所不能忘記的。

我寫下的人物特寫，嚴格意義上說，不是表彰先進人物，不是歌頌當代英雄，他們都是普通的知識分子，他們也有自己的苦惱，有自己的坎坷經歷，但是在他們身上都有一種高貴的品質，是任何苦難、折磨、誤解，甚至疾病和死神，都遮蔽不了的，就像夏天夜空中的星星，散發着熠熠的光亮。霧霾和風雨，只能遮蔽一時，天空總會晴朗，星星總會燦爛發光。

由此我扯開去說幾句關於星光的話，我想，星球（在我們眼睛裏它彷彿很小，所以暱稱為星星）總是在宇宙按照自己的軌跡運行，只因地球的環境太差，霾或者其他污染物模糊了我們的視線，所以經常看不見天空的星星，或者看見了，也覺得暗淡無光。然而，我們不能以此就認為星星消失了，天空暗淡了。我們只能相信，星星是永恆的，星光也是永久的，不管我們的眼睛看得見或看不見，都沒有關係，我們的心裏需要這樣的信念。

我寫下的這些人物，願他們的名字就像星光一樣，在我們心裏具有永恆的意義。

初寫於 2017 年 1 月 9 日於魚焦了齋

修改定稿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輯



復旦的精神

1998 年是北京大學的百年校慶，討論北大傳統的言論甚多，我當時想，講北大傳統是自由主義也好，愛國主義也好，有一點不容否認的，就是北大的傳統裏始終有着京師大學堂的影子。有了這個背景，北大的精神傳統就體現出當時的國家意志，「五四」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自由民主精神正是體現了由皇權專制向民主共和轉型時代的國家意志的兩端。因此，陳獨秀辦《新青年》，放在上海辦，只是一家有着自由化言論的民間刊物，雖有些影響卻無以號召全國，後來蔡元培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將《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情況就不一樣了。白話文學的意見也是提出許多年了，但北大一舉義旗，文學革命就發動起來了。這裏原因當然很多，但北大因為有着京師大學堂的背景，才會有這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威力，讓軍閥武人驚惶失措。再說清華大學，它的前身是留美預備學校，一開始就有西方現代教育制度的模子。有着西方勢力背景的學校，國家意志不易滲透，所以具有非官方、非主流色彩。人文學者廁身其中，能夠比較獨立地培養起學術價值規範。這可以用陳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來概括，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們似乎都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派，清華大學的學術領袖們，也都以穩健學風為標記，聞一多拍案是後來的事了，當時陳寅恪先生的這兩句話是針對王國維自殺提出來的，那時正是北伐勝利、國民黨建立了統一政權的時候。從理論上說，國

民黨政權代表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利益，愛國主義和自由民主都是適用的，而陳先生提出這個思想，卻是與這個政府劃清了界限，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放在政治民主的範疇來談的，這與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思想也不一樣，他是作為一個學人而有自己的自由思想、獨立品格，他的價值是以知識分子的學術地位為標準的。傳統知識分子只為聖賢立言，只對廟堂發言，對照之下，陳先生提出這個原則是對學術負責，只是在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上要維護獨立、自由精神。這是針對國民黨政府而言的，清華在那時剛剛改制為「國立」。不過還有一點須要說明：清華雖有西方的背景，但與一般的教會學校性質不一樣，現在有些學者在關注教會學校的辦學經驗，是應該的，但也要看清教會背景的致命弱點。教會學校本質上反映了西方思想文化和經濟力量對中國的滲透。它是以培養符合西方標準的可用型人才為主的，有些技術型的人才，像醫學、土木工程等學科，教育效果比較明顯。至於人文學科的人才培養，就很難說了。

在這個前提下來討論復旦大學的傳統，就不難找到它的特點。復旦大學的前身是復旦公學，是馬相伯先生為支持抗議教會勢力控制震旦學院教育的學生而創立的，也就是說，它在成立之初就擁有兩個特徵：一是反對教會對教育的控制，二是堅持民間辦學，走的是通過民間集資、華僑捐助、不靠官府權力，也不靠西方勢力的獨立自主的辦學道路。邵夢蘭的《校史沿革》記錄 1941 年復旦大學在重慶被改為國立大學的過程時，含糊地說了一點史料：

這次報部，表面上好像先斬後奏，手續上欠缺一點，其實在二十八年三月已有第一次謀改國立的商榷，渝滬兩地函電再

三，交換意見，曾因謠言誤會，說本校已由部令改為國立西康大學，雖經吳副校長（吳南軒）正式向李老校長（李登輝）闢謠；可是改為國立後，上海部分有些問題未獲協議，只好擱置，第二次謀改國立……幸留滬李老校長及其他校董共同體察此危機，共同挽救，不再顧到其他枝節問題。

語焉不詳，許多細節值得校史研究者進一步探究，大致猜測，應該是與「改制國立」即改變了復旦一向堅持的民間辦學傳統有關。復旦的老校長李登輝是近代中國值得重視的教育家，他的偉大就在於始終靠民間集資的能力創辦了復旦這座人文精神濃厚的大學。過去華僑資助辦學的並不少，但所辦的大多是技術性、職業性的學校，為家鄉子弟謀一條求生存的道路。上海這座經濟型的現代城市裏，技術培訓和職業學校是其重要的教育特色，但像復旦那樣使人文傳統在民間薪盡火傳，知識分子能在一個良好的民間工作崗位上承傳學術精神，這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是值得另眼相看的。在這意義上，李登輝之功不在黃炎培、陶行知、陳嘉庚等民間教育大家之下。現在復旦校園裏尚留當年李校長募捐而建造的遺蹟；更感人者，上海淪陷以後，李登輝以老病之身蟄居租界，為失學的復旦學生考慮，竟說服一位著名銀行家負債購房，無償供復旦師生讀書之用，那就是赫德路的復旦大學。那位銀行家與復旦的因緣是由於他的女兒曾是復旦學生，一次從復旦圖書館回家路上不幸遭瘋狗咬而不治，李校長在處理這個悲慘事件過程中與那位銀行家有過幾次接觸，竟能發展出如此盛事，其人格魅力可見一斑。梁大鵬在〈懷李故校長登輝博士〉一文中有一段說得很好的話：

他不像一般主持大學教育行政的人，長於較量，精於盈虧，周旋酬酢，應付人事，只要學校能夠安定下來，便算功德圓滿；李校長顯然也不像另一派的大學校長，以社會領袖自居，對於校政僅作政策上的決定，平時決不過問細節，遇事涉及基本原則卻很認真，言人之所不言，為人之所不為。我們的李校長似乎是屬上述兩派之間的人物。

這話頗值得玩味。大凡私立學校的校長，必須有務實精神和經營頭腦，但李登輝校長可貴的是他還具有知識分子崇高的人文關懷和一身凜然的正氣。這就是他不同於蔡元培這樣的領袖人物，也不同於一般學界的行政人員的地方。

因為復旦大學有着私立大學的傳統，所以與廟堂的關係比較疏遠，與民間動盪的革命思潮息息相關。復旦建立於清末，與從事反清鬥爭的地下政治力量有着密切聯繫，革命元老于右任就是復旦的創始人之一。「五四」學生運動興起後，從「五四」到「六三」工人運動爆發的一段時期裏，運動中心逐漸南下，復旦大學的學生在其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他們直接在反對黨領袖孫中山的秘密參與和指揮下做了大量工人和商會的工作，終於使「五四」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是民間思潮洶湧推動政治的典型例子。上海當時有三所較為著名的大學：南洋公學是公立大學，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聖約翰大學是教會學校，校風更加保守；而復旦大學是私立學校，革命之風容易盛行，所以成為上海學生運動的策源地。許多學生由於參加學生運動不得不轉入復旦，如後來曾當校長的章益就是因參加「五四」學生運動被聖約翰大學開除而轉入復旦大學的。1930年代抗日救亡運動中，復旦學生也是風起雲湧，當時于右任已經轉

為在朝人物，自然不希望學潮發生，一次學生發起赴南京請願，于先生趕到車站阻止，說得口乾舌燥，學生還是搶上火車，于先生也隨之上車，到了南京下車後，繼續在車站勸說，仍然無效，學生之所以能如此肆無忌憚，背後自然有許多原因，而李登輝校長和章益等一批骨幹教師的支持是極為重要的力量。有一篇回憶文章記載：抗戰前一年，警察進復旦校園抓學生，李校長和文學院余楠秋院長出面保護學生，結果挨了警棍，引發了學生與警察的大衝突。李登輝校長當然不會自覺地反對政府，但在知識分子和大學校長的雙重身份的制約下，他在廟堂與學堂之間，顯示出現代大學校長中極為難得的崇高本色。這在國立學校是不可想像的，所以「五四」學潮中有良知的蔡先生只能以辭職的方式來支持學生，卻不能像李登輝校長那樣直接支持學生。李校長保護本校學生的精神榜樣曾影響過幾代復旦的校長，章益是李校長言傳身教的學生，在極其險惡的年代裏曾設法保護學生而任勞任怨；陳望道先生也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力保護自己的學生，拳拳之心，彌足珍貴。這一點在許多回憶文章都已經說到了。

復旦大學在 1950 年代有過一次飛躍性的發展，那是全國高校的院系調整以後，一大批著名教授進入復旦，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學術重鎮的格局。教授們來自各個大學，他們將各自的校風學風帶入復旦大學，使原來民間辦學的草根精神獲得根本性的提升。但是當時高校已經納入了國家統一的教育計劃之中，成為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一個主戰場，以往的學風已經很難延續。復旦大學原來就不是國家意志的產物，它的傳統究竟是什麼也許不那麼重要，即使曾經有過一些校訓校規，也很少有人去認真實踐。我對校

史缺乏研究，有些問題無法深究，比如，在復旦校歌裏有這麼一句詞：

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

這「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嚮往與陳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知有沒有聯繫，如果沒有直接的聯繫，那就說明民間辦學與知識分子民間立場有着根本上相溝通的精神。這樣的精神在 1950 年代顯然是不能公開倡導的，但教育的力量不僅僅在於講台掌握在誰的手裏，而是體現在知識分子對學術的獻身態度和對學術傳統的承傳自覺。我剛才說到民間辦學時用了「草根精神」一詞，其實草是最軟弱最卑賤的東西，它看上去微不足道，決不鮮豔奪目，但草之根卻是最堅韌最易於生長的，象徵了頑強的生命力。這種草根精神在學術為顯學的時代裏並不受人們重視，但是一旦學術在「政羅教網」中失去了應有的尊嚴與地位時，這種草根精神就變得重要了，有時可以成為被綁的普羅米修斯們的精神支柱。

在復旦的教授中，自詡為大師或以大師自居的似乎很少，但在平凡的治學和為人中卻體現出知識分子的本色。章培恆老師在《我跟隨蔣先生讀書》一文中回憶蔣天樞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敬仰時說了兩件事：一件是蔣先生在 1953 年「獨來南海弔殘秋」時就接受了陳先生所囑託的傳播其學術著作的任務，1978 年以後，蔣先生編輯、整理和校勘的《陳寅恪文集》陸續出版，出版社送來千元稿酬，蔣先生沒有接受，理由是學生給老師整理文稿不應拿錢；還有一件是，蔣先生所寫的陳寅恪研究論著，包括《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均是陳述事實，不作發揮，更沒有借此炫耀自己。我以前讀

過章老師另外一篇文章，還講了關於蔣先生的其他一些事，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是在 1960 年代，蔣先生應約校點《詩會通義》，有意讓章老師合作（當時章老師是蔣先生的助手）。書出版後，蔣先生用校點費讓章老師購買一套學習古籍必備的大型叢書。這些事情看起來都很小，很微不足道，但真要這樣本色地做了，這樣地對待老師和對待學生，在現在的環境下卻是很不容易的。教育的傳統主要體現在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上，對老師是否真誠地出於敬仰和愛戴，全力維護和發揚老師的學術成果；對學生無論賢愚，是否盡力幫助其走上學術的道路，使學術得以弘揚傳播，這是為人師表的基本要素，也是教育上學術承傳的主要體現。現在常聽做教師的抱怨收入菲薄，不安心於教職，彷彿因為沒有優越的生活環境，就沒有心思談學論道了，這種話偶爾談及也沒有什麼，但是談多了就真這麼認為了，並原諒自己的倦怠，結果使人變得卑瑣起來，治學上也不會有大的出息。章老師所舉蔣先生的幾件事，都涉及到點滴的經濟瑣事，但其意義卻是遠大而且重要的。我雖在復旦校園工作多年，卻一直無緣聆聽蔣先生的教誨，但從章老師的文章裏，感受到的不僅僅是蔣先生個人的高風亮節，而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師道的教育。

朱東潤先生百年誕辰之際，我寫過一篇紀念文章，其實朱先生沒有直接教過我，我們也沒有個人的交往，我在寫這篇文章時身在異國，寫朱先生時摻雜了更多對復旦的感情。我是這樣開始的：

我進大學那一年，朱東潤先生已經 82 歲，還擔任着中文系的系主任。時間過得可真快，記得第一次走到學校大門前，眼睛望着「復旦大學」四個毛體字，心裏不由的「格登」跳了

一下。像是為了壯膽，我很記住自己邁入學校大門那一刻的心境，從這以後，我的生命旅程就一直走在復旦校園裏，平靜如水地上課、下課……一晃竟 18 年過去，朱東潤先生今年是百歲誕辰了。

現在又是幾年過去，我在復旦學習和工作已經超過 20 年了，但平時只是教書寫作，對復旦的歷史和傳統也不怎麼關心和了解，這次因為要編這本關於復旦大學的散文選《走近復旦》，¹我才有機會接觸一些校史材料，便產生如上一些心得。但也只是淺嚐輒止，有望通過這本小冊子，引起復旦校友進一步研究母校的精神傳統與學術立場的熱情。

1999 年 7 月 31 日於黑水齋

1. 陳思和、龔向群主編：《走近復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本章原為該書的序言。

我的老師們

我是七七級本科大學生，也就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當時高考熱是一個社會思潮。「文革」爆發的第一個舉措就是廢除高考制度，整整十年沒有高考，到了 1970 年代中期開始實行推薦制度，提倡工農兵學員「上、管、改」大學，1976 年「文革」結束，第二年高考制度恢復，舉國沸騰，從高中六六屆開始，有老三屆（高中、初中的六六、六七、六八屆學生）以及所謂「新三屆」（六九、七〇、七二屆的中學生，沒有七一屆，當時中學七一屆延長了一年學制，成為七二屆），主要是從社會上各行各業來報考大學的，尤其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當時還看不到回城的出路，高考成為唯一改變命運的途徑。我當時在淮海街道圖書館工作，編制是小集體所有制，當時盧灣區圖書館幾次與區裏人事部門聯繫，要求把我調過去工作，都是因為不能解決編制問題而擱淺。因此高考也成為我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

當年高考是在 1977 年 10 月，錄取時間是 1978 年初，一共有兩批，第一批發榜我沒有被錄取，過了一個多月左右，盧灣區招辦傳出消息來說，為了讓更多有真才實學的考生能進大學，政府決定若

本章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建系 85 周年編撰系史而接受學生的訪談，根據錄音整理，成稿於 2010 年 8 月。

干學校再擴大招生，好像是4月2日那天，正式通知發下來，我獲復旦大學中文系錄取。當時第一次錄取名單下來時，淮海街道的青年錄取名額不多，但這一次錄取了很多，主要是師範類學院，進復旦大學的就我一個。

當時學校校舍不足，我們第二批21人都是上海戶籍，其中有李小棠、徐克仁、吳基民等一時俊傑，我們的戶口沒有遷到學校，人也住在家裏，走讀。學校只給我們一間臨時性的宿舍。這間宿舍由我們21個走讀學生共同擁有，但真正在裏面常住的大約只有四五個同學，我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經常是一周回家兩次，周三和周六。因為是走讀，我很少參加班級裏的集體活動，也很少參加學校裏的集體活動。學校裏經常發生一些熱火朝天的活動、爭論、風潮，我都是事後才聽說的，很少參與。如當時比較熱鬧的競選寶山縣人民代表，我們班的張勝友就出頭參加競選，新聞系的徐邦泰、哲學系的景曉東等也競選，連老教授王中先生也站出來「以身試法」，我都沒有參加，連投票也沒有參加。中文系組織學生文學社團「春筍社」創辦大學生刊物，在街上叫賣引起警察的干預等，我都沒有參加。這種不愛熱鬧，也不愛參加集體活動的性格後來延續下來，一直到留校任教後還是這樣。集體活動能不參加都不參加，社會潮流能不跟上就不去跟，自己只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這樣做的好處是少受干擾，也沒有什麼糾紛，時代風雲都在我的身邊擦肩而過。但今天要回憶，也實在乏善可陳。

當時中文系「十大教授」中王欣夫先生、劉大杰先生、陳望道先生都已經過世。其他七大教授尚健在，但是我們也沒有機會見到。唯朱東潤先生擔任了一屆系主任，有時候晚上打着手電筒，一

個人到學生宿舍來與學生談話。那時朱先生大約已經八十多了，但是獨來獨往，走路不用人攙扶。我只聽過一次他的學術講座，好像是我們剛進校那一年的5月27日校慶報告會，在第一教學樓舉行學術報告會。朱先生的報告題目是關於梅堯臣的詩，他說話口齒清楚，有條有理。不知怎麼一會兒講到郭沫若，他說雖然郭沫若曾經罵過他，但他還是贊成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裏對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批評，意思是杜甫草堂頂上的茅草被風吹走，有窮孩子拾去，杜甫罵那些孩子是盜賊，朱先生用同情的口氣說，拾去就拾去吧，一點點稻草被拾去了，就罵孩子是盜賊，太過分了。朱先生的說話口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文系老師對朱先生都很欽佩，說他好話的有很多，說起「文革」剛開始，朱先生就作為學術權威被拋出來批鬥，批鬥會牆上寫着大標語：「打斷朱東潤的反革命傲骨。」朱先生仍然昂首挺立，批鬥他的人硬按下他的頭顱，他一忽兒就昂起來，於是再被硬按下，反覆多次，足以證明他是真有傲骨的。不過據朱先生自己說，是他的頸脊椎有病，想低頭也低不下去。

其次印象較深的是陳子展先生，陳先生與賈植芳先生是好朋友，經常到賈先生家串門，我在先生家裏經常遇見他。但我與他沒有直接說過話。陳子展對青年很警惕，他看到賈先生就有說有笑，一看到我們年輕人在場，打個招呼匆匆就走。賈先生說，陳先生以前在運動中吃過年輕人的虧，現在他不願意與年輕人打交道。學校裏安排他指導研究生，他只指導了一位，以後再也不願意指導了。張世祿先生是一次王力先生來復旦相輝堂作學術報告時見到的。張世祿先生坐在第一排，王力看見張先生坐着，也很客氣，先說張先

生是我的老師，云云，很給了復旦的面子。王力講到一半時，下面不停地有人往上遞條子，每次條子傳送到第一排張先生手裏，張先生慢慢起身走到講台邊上，吃力地把條子遞上去，由主持者接過那條子，再傳給王力。這樣來來往往好多次，看得出他很吃力，動作很慢，但也沒有人幫助他。其餘幾老，有的是偶然到府上去拜訪過，如郭紹虞先生、趙景深先生，但那時他們年紀都比較大了，幾乎沒有能夠談什麼。還有些教授就沒機會拜訪，如吳文祺先生，就在畢業拍集體照時他來了，坐在第一排，而蔣天樞先生則是久聞其名未見其人。

當時上課是上大課，我們文學班有七十多人，漢語班有三十人，經常在一個教室裏上課。有時還與上一屆的工農兵學員一起聽課。講古代漢語的是周斌武老師，這是我大學四年中最難忘的課程。周老師滿腹經綸，精通數理英文，他自己發明一套教授古漢語的方法，涉及到國際音標、數學公式、英文邏輯等，難倒了一批人。學生中不斷有人呼喊講得太難，但周老師總是站在講台上臉帶微笑地說：「不難的、不難的。」他還在黑板上寫着「欲把金針度與人」幾個字，說是要把「金針」傳給大家。當時學生中有惡作劇者，特意找出一些自以為很難解釋的古漢語例句，下課的時候輪流去請教周老師，以為可以難倒他。可是他們哪裏是周老師的對手？周老師不知道這是惡作劇，他萬分誠懇地一一作了解答，如數家珍。這下才傾倒了一大批學生。周老師還是書法家，他上課用的教材全是自己用毛筆手抄，學期結束時，他很動感情地說，我與你們師生一場是有緣份的，這本教材大家要好好保存，留給大家做一個紀念。這本教材至今還在我的書櫥裏珍藏着。教授現代

漢語的是金路老師，胖胖的身材，開口非常談諧，他知道下面坐着許多搞創作的學生，上課盡量舉文學的例子，什麼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的作品裏用過多少個括號、托爾斯泰作品裏有多少個破折號等，大家都佩服得不得了。金老師在我留校時已經調到留學生辦公室教留學生去了，那是對外漢語的前身。我們七七級同學對金老師的印象非常深。每次同學聚會，問起中文系老師的情況，總是問周老師可好？金老師可好？

應該說，我們七七級是恢復高考後第一屆大學生，上課內容也體現了政治上撥亂反正時期的過渡性和實驗性，研究語言的比較沒有問題，但研究文學就問題多了。當時課堂上爭議最大的是文學概論和現代文學史。文學概論課是吳中杰老師上的，他以敢說敢為著稱，每次上台講課時，一枝粉筆夾在手指上，但很少板書，他操着浙江普通話，指桑罵槐，句句都有鋒芒。吳先生是魯迅研究專家，相傳「文革」中他為《解放日報》編了一版魯迅語錄，不知是故意還是無意，把魯迅在 1930 年代批判張春橋的語錄也編進去了。張春橋是「文革」中的大紅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與江青他們勾結成「四人幫」，但在 1930 年代他還是一個上海灘頭小文痞，曾經化名狄克寫文章攻擊作家蕭軍，魯迅反批評他。這本來也沒有什麼，魯迅批評過的人很多，也不見得都是壞人。但張春橋到 1960 年代已經變成真壞人了，特別怕人家揭他老底。吳中杰老師就這樣得罪了張春橋，後來復旦的紅衛兵組織中有個叫「紅革會」的團體發起「炮打張春橋」運動，遭到鎮壓，張春橋他們就給吳老師安上一個在「反革命小集團」背後「搖鵝毛扇」的軍師的罪名，批判大會上給吳老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文革」以後當然平

反了，我們都把吳老師看作是反「四人幫」的英雄。吳老師言必稱魯迅，論時事不留情面，每堂課我們都聽得很過癮。我們班級裏同學盧新華寫了一篇小說《傷痕》，引起了轟動，後來「傷痕文學」的名字就這樣叫開了。小說寫了一個叫王曉華的女孩在「文革」中誤以為自己母親是黨內「叛徒」，與她劃清界限，但還是受了很多苦，等到她醒悟過來，母親已經死了，遺恨永遠沒辦法彌補。大家都說這個小說寫得深刻，獨有吳中杰老師表示不同意見，他痛恨王曉華那樣的人，為了躲避禍害竟與自己母親劃清界限，還怨恨自己的母親，他認為這樣的人應該給以批判而不是同情。顯然，吳老師讀《傷痕》是帶了他自己的複雜經驗和老辣眼光，我們青年人不得理解，就纏着與吳老師辯論，吳老師專門花一節課的時間來分析《傷痕》，說得盧新華心服口服。後來盧新華出國，每次回來必去拜訪吳中杰老師。

主講現代文學史的是潘旭瀾老師和蘇興良老師，潘老師上課時教室裏坐滿了聽課的人，許多青年教師都來旁聽。潘老師滿口福建話，說話語速極慢，聽他的課很容易記筆記。我是現代文學史課程的課代表，經常去潘老師和蘇老師家裏聊天，老師們都非常隨和。第一次見潘老師，他就問：報紙上有個經常寫隨筆的陳思和，是不是你？我很驚訝，當時沒有第二個叫陳思和的人在發表文章，但我其實也沒有發過幾篇短文章，潘老師卻注意到了。留校後我受潘老師教誨頗多，剛留校不到一個月，他就叫到我他家裏去，說現代文學學會要在海南島開第二屆年會，他不想去參加，想讓我代表他去參加。那時候出差開會是極寶貴的機會，年輕人一般也沒有資格去參加全國性的年會，但因為潘老師說是代表他去的，學校裏都給我

報銷了差旅費用。在這次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王瑤、李何林、唐弢、嚴家炎、樊駿、馬良春、盧鴻基等一流前輩學者，眼界就此大開。潘先生還特意給馬良春先生寫了一封信，要我帶去，意思是要我代表他參加學會的理事會。我沒有拿出去給馬良春，也沒有提出過這樣的要求。但潘老師的栽培之心我深深領受了，永遠銘記在心。後來潘老師擔任了中國當代文學學會的副會長，大約是2001年，在廣東肇慶開年會，他也是主動要我去參加，並且明確地說，他要退了，一定要我接着他當副會長。他誠懇地對我說：「你只要不推辭，一定選得上，別人的工作我去做。好嗎？」口氣裏像哄孩子說話，我非常惶恐，就答應了，其實當時我還不是這個學會的會員。蘇興良老師當時是青年教師，與我關係就更加隨便了，我經常去他家聊天，那時蘇老師的孩子很小，非常頑皮，蘇老師總是一邊與我說話，一邊要對付孩子的纏繞，後來我留校，蘇老師也一直很關照我。

一年級的現代文學作品選是鄧逸群老師主講。有一次講魯迅的《祝福》，鄧老師引用許壽裳先生的話，說祥林嫂的悲劇，不僅在於狼吃了她的兒子阿毛，而是舊禮教吞噬了祥林嫂這樣的勞動人民的靈魂，這是精神上的「創傷」。這個話啟發了聽課的盧新華，他由此想到，「文革」給人們留下的也不僅僅是肉體上的創傷，更嚴重的是精神上的「傷痕」。於是創作了短篇小說《傷痕》。可以說，是鄧老師生動深刻的講課啟發了《傷痕》的創作，但鄧老師很謙虛，從不張揚。中文系教師中對學生最關心的是鄧老師，同學們都叫她鄧媽媽，每屆學生她都能叫出名字，了解他們的情況，從生活到思想，都關心他們。我留校後很多年了，鄧老師遇到我還總是

叫我小鬼啊，你怎麼怎麼了。想起來心口總是暖暖的。鄧老師曾經花了很多心血編過一套四卷的現代文學作品選，我們都參加，題解、內容都很充實，但後來出版社不知怎麼就不印了。十多年過去了，在鄧老師的提議下，由我挑頭重新主編這套作品選，鄧老師是副主編，全體教研室老師都參加了。我們在原有基礎上做了很大的調整，現當代文學作品都放進去了，共有五本。換了一家出版社出版，口碑很好，現在還一直在重印。鄧老師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她堅決不肯接受主編費，幾次推辭，最後還是沒有接受。復旦讀書期間，現代文學的課是我最喜歡也是最投入的課。當代文學史的課程是陸士清老師和唐金海老師主講，張新老師也講過詩歌。選修課有陸士清老師主講的台灣文學，這是全國高校最早開設的台灣文學課程，潘旭瀾老師主講的杜鵬程研究，陳鳴樹老師主講的魯迅研究，這三門課我都是課代表。陳鳴樹老師是李何林先生的高足，他熔鑄了哲學思想和歷史背景來講魯迅，他的課受到同學們的喜愛。那時陳老師家住在市中心長樂路，與我在淮海路的住家不遠，我有問題就很隨便地去找他家請教，他總是很親切地解答。那時候電話不普及，我有天晚上看書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就冒冒失失地跑去陳老師家。偏巧他那天身體不適，已經睡下了。我突然敲門，好像師母也不在，陳老師披衣起身，邊穿衣服邊迎我進去，接着談到很晚。我當時惶恐的感覺至今還歷歷在目。

古代文學史是中文系的壓軸大課。當時給我們上先秦兩漢的是顧易生、王運熙兩位教授，他們兩位風格完全不同。顧先生人高馬大，中氣十足，一開口就呵呵地笑；王先生溫文爾雅，細聲細氣，平時上課總戴着帽子，低着頭，慢慢地唸講義，一旦說到他感

興趣的題目，如魏晉時代的「風骨」，南北朝的民歌，他的頭就抬起來了，眼睛也炯炯有神了，極有風度。唐宋部分是陳允吉老師主講，他講課談諧瀟灑，經常引用錢鍾書、陳寅恪、夏承燾的觀點，說起來談笑風生，是中文系最受歡迎的課之一。陳老師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關心學生，與鄧老師一樣，他幾乎叫得出每一個學生的名字，經常到學生宿舍去看望學生，與學生聊天。他掌握了解學生的情況比我們學生自己還清楚。我有一篇課堂作業是分析劉禹錫的《竹枝詞》，我把劉禹錫的《竹枝詞》視為一個整體，像一部民間表演的歌劇一樣，有獨唱有合唱。寫完後我也不知道這樣分析對與不對，就冒昧交給老師。陳老師看後告訴我，他已經把這篇作業推薦到《復旦學報》了。不久文章就登了出來。這是我第一次正經發表學術論文，也沒有做任何修改。文章發表後我去感謝陳老師，陳老師卻對我說，你以後還是在現代文學方面多下功夫吧。我後來意識到，也許當時系裏已經在考慮我留校任教了，希望我在現代文學領域有所努力。文學史的明清部分是李平老師主講，文學批評史由李慶甲老師、蔣凡老師和黃霖老師分段主講，駱玉明老師作為王運熙先生的助教也經常來我們宿舍輔導，他們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上過的課還有外國文學史，是外文系夏仲翼、翁義欽兩位老師主講的，寫作課是秦耕老師主講，這些都對我們後來的成長產生過有益的影響。

我本來對古代文學是有興趣的，如果有老師引導，也可能朝這個方向發展。但也許是受到了陳允吉老師的暗示，更重要的是受賈植芳先生的影響，我的興趣逐漸轉向現代文學。大二開始我已經和李輝在一起研讀巴金著作，並且在賈先生的指導下撰寫研究論文。

賈先生幫我們推薦了一篇論文給《文學評論》編輯王信先生，很快得到了回信，讓我們把論文改成讀者來信的形式發表。這樣，到了四年級，我已經全力以赴地做巴金研究的論文了。我們七七級的四年級課程也很精彩，有章培恆先生講《西遊記》的研究、應必誠老師講《紅樓夢》的研究、王水照先生講蘇軾的研究、蔣孔陽先生講西方美學、劉季高先生講《左傳》等。但因為我把主要精力轉到現代文學，就着重選修現代文學方面的課了。不過我記得有一門課我是上過的，是日本的伊藤教授講日本古代文學，章老師陪着他。那位教授上課經常遲到，章老師解釋說，在日本高校裏，教授為了表示尊嚴是允許遲到的。章老師是復旦的明星教授，那時他大約四十多歲，烏黑的頭髮，筆挺整潔的西服，雪白的襯衣，在校園裏非常引人注目。他剛從日本講學回來，用自己的研究經費為中文系購買了大量日本漢學書籍和研究資料，還學習日本大學教授的工作態度，每學期開設四門課程。他平時不苟言笑，但在課堂上出口成章，滿堂生輝。我留校時，系主任是胡裕樹先生，很快就換章培恆先生。他當系主任的這幾年，是中文系撥亂反正最辛苦的階段，章先生出於公心，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才奠定了中文系後來發展的基礎。

最後，我簡單介紹一下賈植芳教授。他是我的導師，我說的「導師」不僅僅指學業上的，更是指人生的導師。賈植芳先生是七月派作家，胡風的朋友。1952年院系調整被安排到復旦大學，建設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1955年他受到胡風冤案的牽連被捕，被判了十年徒刑，在監獄裏關到1965年，然後就放回學校監督勞動。旋即又遭遇了「文革」的迫害。我們進校不久，他從強迫勞

動的印刷廠回到中文系資料室，雖然同樣是勞動，但待遇要好多了，也自由多了。我認識賈先生是在資料室裏，我與李輝研讀巴金著作，正好賈先生帶領了中文系老師主編巴金研究資料集。我們自然向他請教，他也樂意熱情指點，漸漸地我們就熟悉了。復旦中文系的歷史裏不能少了賈植芳教授，少了他的故事，中文系的歷史就會變得蒼白。賈先生在 1950 年代就是深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他在系裏上四門課：現代文學、外國文學、蘇聯文學和文學寫作。他說話時山西口音很重，一般人初聽不容易理解，但還是受到學生們歡迎。我聽曾華鵬先生說過，1950 年代賈先生上課時總是夾一大疊外文資料，當時還沒有中譯本，他一邊講一邊翻資料，順口就翻譯出來，解釋給學生聽，學生的眼界忽然開朗。寫作課上，賈先生喜歡改動學生的作文，有一次學生施昌東氣呼呼地找賈先生，認為先生改得不對。先生耐心與他解說，使他心服口服。賈先生是一位魅力型的教師，他的周圍有一大批追隨者。後來章培恆、施昌東、范伯群、曾華鵬等學生都因為賈先生的冤案受到牽連，但他們在艱難的人生道路上都沒有放棄自己的學業，30 年後，分別成為古代文學、文藝美學、現代文學等領域的翹楚。這就是賈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可惜施老師去世太早，我那時已經留校任教了，親眼看到賈先生對施昌東的關懷，遠勝於一般父子之情。

我畢業留校後，中文系為每個老先生配一個助手，都由青年教師擔任。我擔任賈先生的助手，協助他編一部現代文學史上外來影響的大型資料集，那是國家社科規劃的科研項目。我在賈先生的指導下編完這部資料集後，就跟着他研究 20 世紀中外文學關係。後來比較文學學科興起，賈先生接受中文系領導的委託，開始籌建

比較文學學科點，招收研究生，並且擔任了上海比較文學學會的會長。因此可以說，賈植芳先生為復旦中文系創建了兩個學科，培養了一批優秀學者，學術傳承源遠流長。賈先生一生艱難坎坷，四次入獄，但其性格開朗，胸襟坦白，硬硬朗朗地活了一輩子。他經常說，他的一生就是要把「人」字寫端正。這個話，我起先還沒有貼切的理解，後來在經歷了 1989 年的一系列風波後，我漸漸地明白，要真正做到把「人」字寫端正，還真是不容易的。

我留校以後，還是不大關心學校的事情，所以中文系的歷史我說不大清楚。我住在市區，一般上完課就到第九宿舍先生家裏聊天，吃飯，喝酒，完全像自己家裏一樣。有朋友來了，也總是往先生家裏帶，那裏的人愈來愈多，漸漸地，周五中午就成了一個自然聚會點。別人要找我就到先生家裏，總是能夠找到我的。後來有個時期，風聲緊了起來，我因為在 1988 年與王曉明教授聯袂發起「重寫文學史」，在徐俊西老師主編的《上海文論》上開設專欄，造成過一些社會影響。有人想把「重寫文學史」當做資產階級自由化來批判，中文系也有些人搞些興風作浪的動作。我不太了解，也不在意。但許多關心我的老師都跑到賈先生那裏，讓他轉告我，要我小心謹慎對待，周斌武老師、陳鳴樹老師最為關切。但這一切，賈先生都是很久以後才告訴我的。他當時什麼也沒有說，我去他家，照例就是喝酒，吃飯，聊天，並以自己的歷史經驗教訓，分析當時的形勢，往往一言道破天機，讓人心情豁然開朗。時光一天一天過去，雨過天晴，什麼也沒有發生，唯有老師們的關懷和教誨，我一輩子也忘記不了。

《光華文存》序

1978年5月27日，復旦大學校慶日，各院系都舉辦了學術報告會，那是復旦大學在恢復高考制度以後的第一次大型學術活動，也是「文革」後復旦大學的學者名流們第一次在學術意義上的揚眉吐氣的集體亮相。我當時躋身在剛入學的七七級新生行列，深深地被這一種從未見識過的熱氣騰騰的學術氣氛所感染。那一天，第一教學樓各個教室裏都在舉行報告會，裏裏外外擠滿了人。我所在的中文系的報告會場裏，報告人由老中青教師組成，第一位就是中文系系主任朱東潤教授，他講的是梅堯臣的詩歌藝術。第二位報告人是文藝理論教研室的丘明正老師，他的題目是「試論共同美」，也就是剛剛復刊的《復旦學報》第一期所刊登的論文。

關於「共同美」，今天已經不再是一個讓人感興趣的話題，但是在1970年代末，階級鬥爭理論還是一種主流意識形態，嚴重干擾人們的正常理性思維的時候，美感是否可能超越「階級意識」，竟成為一時的敏感話題。當時思想理論界還沒有進入撥亂反正，凡是派的一些觀念還佔據了主流地位，而思想解放的鋒芒也開始閃爍，衝突與交鋒正在發生。隨着形象思維的討論，美學的突破就成

《光華文存》是《復旦大學學報》為紀念學報（人文社科版）復刊30周年而編選的一套「論文精選」系列。本章是為其中的文學卷寫的序言。

了文藝理論領域恢復人性尊嚴的第一聲吶喊。我回憶這段歷史想強調的是，這個聲音是從《復旦學報》發出的，剛剛復刊的學報就已經踏上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驅者的行列。

同一期的學報還發表了夏征農先生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公開討論社會主義社會需要民主的機制。我作為學生，只有讀到這些振聾發聵的聲音時，才切身感受到復旦大學作為高等學府的思想力量。高等學府不僅僅是青年學子人生過渡的一個階段，不是的，高等學府是一個精神的境界，一個人格的熔爐，在這裏青年學子應該接受人類千百年以來積累的思想精華的薰陶，應該成為人中之龍，健康地騰飛於將來；大學不是技術培訓班，滿足於幫助青年謀取一個領薪水的職業，更不是思想洗腦班，靠鉗制輿論來扼殺青年的思想活力。我親身經歷了復旦大學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爆發出來的思想力量，可以說，當時的七七級、七八級的同學就是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獲得了人生的目標、學術的理想和知識分子人格的錘煉。在這過程中，《復旦學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啟蒙作用。思想解放運動本身就是在新舊觀念的衝突與辯論、批判與反批判、反覆與曲折，甚至付出很多代價以後，才一步步艱難進步，獲得共識的。《復旦學報》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寶貴地留下了復旦師生們學術探索的艱難步履。

我謹以中文為例。這次《光華文存》，因為考慮到各學科專家的標誌性成果，限於篇幅，對一些有探索意義但未必成熟，並且當時引起爭議的論文，沒有能全部收錄進來。但是這些文章在文學領域的探索意義功不可沒。比如，當時有一位在讀的中文系學生，曾

在北京一家雜誌上發表論文，¹通過比較「五四」新文學與1949年後的當代文學的發展狀況，觸及當時比較敏感的文學史估價問題，一時間爭議蜂起，壓力也隨之而來。《復旦學報》緊接着發表了這位學生的另外一篇論文，討論巴金《家》裏面高老太爺「臨終發善」，從人性的觀點出發，糾正當時文藝評論對作品人物作簡單階級劃分的錯誤觀點，論文雖然是從具體作品分析出發的，但其所批評的是帶有傾向性的現象。這篇文章後來被別的書刊多次轉載，證明是一篇有見解的學術論文，學報的支持、鼓勵了這位學生的學術探索，也暗示了文學向人性回歸的必然趨勢。再比如，在思想解放運動最蓬勃的時候，中文系一位青年教師和當時一位哲學系學生聯名在學報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抗戰文化背景的關係，從今天來看，這個研究思路不但沒有什麼錯，而且對後來的學術進步很有啟發。但在當時卻觸犯了禁忌，引起過來自上面的壓力。1982年初我剛留校任教，學報的編輯約我再寫一篇關於《講話》的文章，既要保護前一篇論文，又要轉過彎子。其實我並不擅長寫這類文章，對這個題目也沒有什麼興趣，但是作為一個青年教師，能夠在學報上發表論文是很嚮往的。於是與學報的編輯們一起討論文章如何寫法，他們明確要求我依照鄧小平在第四屆文代會上的祝辭為指導，強調以毛澤東命名的文藝思想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文藝觀點，而應該理解作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結晶，既包括了瞿秋白、張聞天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文

1. 指當時復旦中文系七八級學生趙祖武發表〈一個不容迴避的歷史事實——關於「五四」新文學和當代文學的估價問題〉，《新文學論叢》，1980年第3期。

藝實踐，也包括了後來的中共黨的領導者如周恩來、鄧小平的文藝思想，所以毛澤東文藝思想是在實踐中逐漸豐富起來的，而不僅僅是一本小冊子就能夠涵蓋。換句話說，要以一種寬泛的發展的觀點來認識包括《講話》在內的毛澤東文藝思想，而不能用凡是派的觀點來對待。其實我當時的理論修養達不到這樣的深度，但還是勉為其難地完成了任務，文章發表後，也馬上被一些專業刊物轉摘，這個風波也算過去了。從中我感受到了《復旦學報》編輯們的學術良知與應對智慧。——順便說一句，我前面提到的那篇引起爭議的文章寫得很有價值，我後來從事當代文學中戰爭文化心理的研究，最初的啟發就是來自那篇文章。

思想解放運動在高校的另一個重大成果，就是推動各個人文學科打破禁區，推動思想理論創新，探索新的學科增長點的生成與發展。這也是復旦大學近 30 年來人文學科努力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學報是復旦大學人文學科的窗口，它始終密切關注學者專家的學術創新活動，及時反映他們最新的學術成果。在《光華文存》這部文選裏，我們可以看到 30 年來幾代學者的學術思想結晶。復旦大學中文、外文、新聞等專業在上世紀 50 年代院系調整以後，稱得上名流雲集、專家林立。陳望道先生作為中文、新聞兩個一級學科的領軍人物，在語文修辭、新聞傳播，以及經典翻譯等領域，把復旦大學文科提升到當時的前沿位置。郭紹虞教授的文學批評史、朱東潤教授的傳記文學、趙景深教授的戲曲研究與民間文藝、劉大杰教授的文學發展史、王欣夫教授的版本目錄學、陳子展教授的《詩經》研究、蔣天樞教授的《楚辭》研究、張世祿教授的古漢語研究、吳文祺教授的辭通研究、王中教授的新聞學理論、伍蠡甫

教授的西方文論、孫大雨教授的莎士比亞研究、葛傳槩教授的英語詞典學等，都是一代學術精品，記錄了復旦大學人文高地的興盛狀況。從 1955 年反胡風運動一直到「文革」浩劫，復旦的教授與全國學術界一樣，遭受了極大的身心的摧殘與學術思想的禁錮，但是到了 1978 年，隨着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劫後餘生的老教授們不但迅速撿拾起自己既有的學術殘卷，同時在原來的水平上有了可貴的開拓，從實踐中形成了新的學科增長點。《光華文存》中收錄了 1978 年以後的學術論文，其中郭紹虞教授關於文體分類學、朱東潤教授關於傳記文學、賈植芳教授關於比較文學等的倡導，都是含有學科重建的重大意義。

接着就是復旦第二代學人群體的整體隊伍形成，他們湧現崛起於五六十年代，在「文革」磨難的時代裏不忘學術，注重積累，打下了扎實的學術功底，1980 年代是他們展現成果的大好時機，湧現出一大批精於專業、守前待後、在某些研究領域中作出重要貢獻的學者。《光華文存》的主體部分集中反映了這方面的成果。再接下來的第三代以降的中青年學者，大多數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制度以後陸續進入復旦的學生，他們直接受到復旦前輩們的教育和培養。中文學科（外文與新聞有所不同）因為比較特殊的原因，很少有留學國外的背景，他們的成長基本上是吸吮前輩們施予的學術營養、沿着導師們指點的道路探索進步。說其「探索」，意味着這一代學者沒有躺在前輩成就上停滯不前，他們大多有師承、有實踐，在前輩所指引的道路上不斷提出新的問題，解決新的疑難。學科不斷地充實壯大，研究隊伍也不斷地推陳出新。第三代學人們隨着自身研究的深入與學術環境的變化，也開始承擔起培養新人、光

大學術的責任。他們現在面臨新的任務是：在學科帶頭人的位置上培養年輕的學術梯隊，組合新的學術團隊，使本學科有堅實的科研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資本。《光華文存》收入了一部分更年輕的學者的論文，在他們的研究文字的背後，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整個學術梯隊幾代學者的力量所在。因此說，這部論文選集（語言文學新聞）體現了《復旦學報》復刊後 30 年來的學術精華，也珍貴地記錄了復旦大學人文學科在思想解放運動以來所走過的道路。

2008 年 3 月 27 日

感天動地夫妻情

——記賈植芳先生和任敏師母



1997年10月8日，普通的一天，中午當我走進先生家的時候，看見任敏師母獨自坐在飯廳的一張靠背椅子上，一臉的疲倦，顏色灰黃，五官有點模糊不清。我像往常一樣匆匆打個招呼就進去看望先生，後來回想起來，當時真有一絲不祥的徵兆掠過心頭，但我輕易放過了。我照例在先生家吃午飯，圍桌而坐的就是先生、師母和我，還有兩位青年朋友。飯桌上我問起先生的身體健康狀況，先生還朗聲笑着說，「我最近胃口不好，任敏倒是身體不錯，東西也吃得多一些了。」師母在一邊笑笑，也沒有表示特別的贊同，近幾年師母有一種反應遲鈍的症狀，說話不多，不過那天她吃得特別少，一會兒就放下了筷子。飯後，我與先生先離開飯桌，師母似乎站不起來，用手掌在桌面上支撐了一下，有點吃力的樣子。第二次的的不祥之兆又在瞬間滑過我的心頭。

大約半個小時左右，我們在客廳裏聊天，先生從房間裏出來說，師母有些頭痛，我們連忙走進去，看見師母趴在床邊的書桌上，渾身顫抖，嘴角流着口水。我們立刻叫來了救護車，把師母送進第一人民醫院。醫生馬上診斷病人是中風。

醫生的第一次搶救很順利。半個月後師母出院了，那天我正出差在外，中午還特地打電話過去，說情況很好。可是誰也沒有想到，病人回家只坐了一頓飯的工夫，又糊塗過去了。接着是第二次送進醫院，師母再也沒有清醒過。



半年過去了，師母的病日重一日，不僅完全沒有知覺，而且因為肺部感染而整日發出淒慘的長嘯，一條走廊裏佈滿了不安的聲音，只要踏出電梯，嘯聲就撲面而來，彷彿是命運之門被噹噹地敲響。師母住的病房是個重病房，每一次有病人去了，都會引起人們的不安聯想。醫生也不止一次地暗示病人家屬，應該充分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當時我和我的妻子，還有我的學生們，都日夜在醫院裏輪流照顧病人，對於師母的嚴重狀況早有了準備，唯一使我們擔心的是先生的承受能力，誰都知道這對老夫婦是如何相依為命從苦難中走過來，走到此時此刻，先生已經 82 歲，他會怎樣面對命運之神的無情到來？我們一次次話到嘴邊都被先生擋了回去。他每天在家裏等待着師母康復的消息，遇到人第一句話就問：老太太好點嗎？他毫無醫學知識和病情觀念，只聽進別人安慰他的話，卻聽不進一句危險的警告。當別人告訴他病人很危險很危險，他總是搖搖頭，說：「會好的，你們要當心噢。」於是，別人本來想說的話都咽回去了。

師母除了腦中風外，又感染了肺炎，大量的痰湧在喉頭，呼吸極為困難，進食完全是靠輸液和鼻飼，身上插了許多管子，醫生是司空見慣，但旁人看了心驚膽戰。每天用藥五百多元，錢到領

藥，旁觀者都嘖嘖嘆息，不知是可憐病人還是惋惜那水樣流出去的錢。我知道師母當年因先生一案所累，西遷青海任教員，退休回上海後，當地教育局連退休薪金也數年不寄來，遑論醫藥保險。先生已經退休，微薄的收入僅夠日常開銷，哪裏經得起如此折騰？旁邊的好心人突然多了起來，當然不是捐款，而是閒言碎語：「人到如此，何必再花冤枉錢？」這樣的意思，甚至在醫務人員的私下談話裏也有所流露。這種時候，只要對病人的信心有一絲動搖，治療就很難堅持下去。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條人命是被認為不值得用更多的錢去換的。但唯有先生，他絲毫也不動搖。家裏所有的積蓄都用上了，正好某出版社雪中送炭地匯來一筆稿費，大約有萬把元，他看也不看就交到學生手裏，說趕快送到醫院去。他還親自找治療醫生，動感情地說：「我和任敏，來上海時手裏只有幾個銅板，一捲鋪蓋，現在是有一個像樣子的家了，我大不了再拿幾個銅板回老家去住。」這就是賈先生的真心話，我想，先生從來就不是一個只說空話的人，他心裏早就做好了回老家的打算，才這麼豁出去了。

終於有一天，師母高燒不退，時有抽搐，醫生已經發出了危險的警告，意思是過不了今夜了，快讓病人家屬再來看一眼吧。我有點慌，也有點緊張，連忙安排學生去接先生到醫院來。先生來了，他一手拄着拐棍，一手緊緊握着師母的手，大聲叫着：「任敏！任敏！」他看着師母毫無反應的臉，認真地說：「任敏啊，以前別人整我們，我們沒有辦法，現在好了，我們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來。」真奇怪啊，從住院以來一直沒有反應的病中師母突然淚似噴泉，流得滿面都是。而且，這一夜竟然扛過來了。第二天清晨，我趕去醫院，見病房門口全是人，心裏暗暗叫不好，可是跑過去一看，是另一張床上的老人悄悄離世，師母卻安然渡過難關。

有一次只有我和先生相對而坐的時候，我忍不住勸先生想開一些，我自作聰明地舉了陳從周先生的例子。當年從周先生葬亡妻歸來，先生曾去弔唁，從周先生對先生說，此刻的感覺與「文革」中從幹校回家一樣，一身輕鬆了。先生聽出了我的意思，他徐徐而說：「人總是會走這條路的，我當然知道。不過能治就一定要治，盡可能搶救，我怕我一鬆勁，大家就不盡心了。」原來先生心裏完全明白啊。我近日常常想起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一寸光陰一寸金，那是教人勉學的意思，但我真實地感覺到另一重意思：人的生命，也是這樣一寸寸地買回來的，而這買生命的「金」，不僅是金錢的金，它還是唯人所有的像金子一樣的心，黃金的心。

三

先生面對任敏師母的病，一定想過很多很多。如果說世上真有所謂的患難夫妻，那麼他們就是一個絕配的例子。抗戰初期，在日本攻讀社會學的先放先生放棄學業回國參加抗戰，一度流落西安古城，因為懂日語，被一個駐紮在黃河邊上的國民黨工兵部隊招聘去翻譯日文技術材料，師母正在西安商業專科學校會計系唸書，由喜讀文藝雜誌《七月》，進而被人介紹認識了在《七月》上經常發表創作的先生，他們因愛而結合、而同居在黃河邊上。他們沒有辦過任何社會法律認可的手續，也沒有雙方家庭的財富和對方的地位作保證，師母只說了一句話，她這人苦吃得起，就是氣受不起，所以生活在一起，吃苦不怕，只要不受氣就行。先生說他一輩子都遵守這個承諾，可是他沒有想到，她以後跟着他吃的苦，竟是那麼的大。他們新婚不久，軍隊裏有人懷疑這對浪漫青年加入軍隊是別有企

圖，懷疑他們是共產黨派來的，要秘密逮捕他們，幸好有人通風報信，於是先生帶着師母夤夜逃亡。先生晚年所著的回憶錄《獄裏獄外》一書裏，記載着這麼一個細節：

那一夜天特別黑，真是伸手不見五指，我們不敢走大路，就翻山逃命。一路都是荒山巨石，我走在前面，慢慢地往前摸，爬過一塊大石，就輕輕喊任敏，她沿着聲音走過來。就這樣整整逃了一夜，才脫了危險。

我想，有過這樣經歷的人是很難忘懷這一切的，先生那低沉的「任敏、任敏」的叫喚聲，一定伴隨了師母坎坷的一生。就是這一聲，吃得起苦的師母付出了極大的代價——1955年先生因胡風冤案牽連入獄，師母也跟着被捕審查，接着發配青海；第二次被捕入獄，整整幾年都掙扎在飢餓線上。直到自然災害時期，她被釋放出來，當時她的生活道路可以有多種選擇，但師母毫不猶豫地選擇回先生的山西老家，與姑翁生活在一起，代替獄中丈夫盡孝道，為兩個老人送了終。所以，那昏昏沉沉遊蕩在陰陽界的師母之魂，分明是聽到了先生的叫喚，她又回來了呀！

《獄裏獄外》還有一段記載：

關於任敏這許多年受的委屈和苦難，我關在監獄裏一點也不知道，只是憑經驗猜想她到青海會凶多吉少。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個包裹，包裹的布是家鄉織的土布，裏面只有一雙黑面圓口的布鞋，鞋裏放着四顆紅棗，四顆核桃，是我們家鄉求吉利的習俗。雖然一個字也沒有，但我心裏明白，任敏

還活着，她已經回到我的家鄉了。這件事使我在監獄裏激動了很久很久。

這些棗子和核桃的意象，也一定是伴隨了先生坎坷的後半生。當師母病倒以後，先生特地找出珍藏多年的書信和日記，精心挑選出他與師母在「文革」後期到平反前後的通信，以及「文革」後等待平反期間的日記，編成厚厚的一本《解凍時節》出版。出版社把校樣寄來時，先生親自拿到醫院，對着昏迷不醒的師母不停地說：「看吧，你寫的信、你寫的文章，我們都保留下來了……」師母又一次淚流滿面。

四

就這樣，當錢花到無錢可花、藥用到無藥可用、夢做到無夢可做的時候，任敏師母奇跡般地闖過了生死大關，回到了自己的家裏。她依然是昏睡不醒，但能夠吃東西，能夠被攙扶着走下地來。她回到了先生的身邊，安心地昏睡着，這已經是第三個年頭了。

這下子忙壞了高齡的賈先生，他請來了內侄女管理他的家，又請了保姆專門負責照料病人。他聽說病人每天吃四種水果：蘋果、香蕉、橘子和彌猴桃，對身體有好處，就親自去買，親自監督師母吃下去，再加上按家鄉風俗製做的小米、大棗、核桃、麥片等各種食物煮成的粥，每天不斷地餵養着病人。先生親自照料着這一切，每到晚上，他看着師母已經把一天安排的食物都吃下去了，他伸手摸摸師母的額頭，一切都正常了，他才放心地睡下去。有一次，師母因感染在長海醫院裏住了幾天，治癒後學生們送她回家，先生站

在門口，用手撫摸着師母的額頭，嘴裏嘮叨着：「任敏不用怕了，咱們回家了。」是的，在這個世界上，師母只有在先生的身邊才不會感到害怕，而只有師母在先生的身邊，先生才是最放心的。

但是，善良的願望仍然是要落實到具體的經濟問題上，我這裏還要談到先生困窘的生活狀況。先生早在上世紀的 50 年代為復旦中文系建立了現代文學教研室，成為這一學科的學術帶頭人。80 年代復出以後，他又以精湛的外國文學造詣開拓了復旦大學的比較文學學科，成為全國最早的中外文學關係研究領域的博士生導師。他從 50 年代起教書育人，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術人才。這且不說也罷，但就在他最需要經濟上支持的時候，他的退休工資只有 1,000 元左右，沒有其他的津貼。這當然不是先生個人的遭遇，一般高校裏的退休老教授大約處境差不多，可是對於一個沒有子女補貼，又要負擔重病在身的老妻的老人來說，也未免特別艱難了一些。但這些也不說罷了。我想寫寫先生的，不是他的實際生活面臨的困難，而是先生面對這樣困難的態度和精神大氣。

賈植芳先生，在他被師母的病拖得山窮水盡的時候，已經是八十幾歲的老人了，但是他與任何人，包括他的學生，如同他親生子女一樣的學生，都沒有吐露過一句關於經濟困難的話。反之，從那時候起，他不聲不響地整理起自己的舊稿、日記、書信、回憶錄，寫作各類長短文章。他每天伏案，著述不已。這幾年來，他的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如回憶錄《獄裏獄外》的修訂版（2001 年）、紀實體的文獻資料《解凍時節》（2000 年）、散文集《雕蟲雜技》（1998 年）、《不能忘卻的紀念》（2001 年）、自選集《歷史的背面》（1998 年）、書信集《寫給學生》（2000 年）、《賈植芳致胡風書

札》（影印本，2001年），以及重新修訂出版的譯著《契訶夫手記》（2000年）等。最近，他又有一部散文集《老人老事》於2002年問世。這就是賈植芳先生在這短短四年裏的工作。

我把先生的著述放在這麼一種環境裏論述，絕對沒有忽視這些著述的學術價值和文學價值的意思，正相反，凡讀過《獄裏獄外》、《解凍時節》的讀者都不會忘記這兩部書所傳遞的歷史真實信息的重要意義。有些書，用不着商業操作和傳媒渲染，它會讓一代代讀者為之感動和珍愛，賈先生的書就是這樣的書。我也絕對沒有把這些書的出版看作是出於純粹的經濟動機，事實上我明明知道其中有幾種書的出版，作者是拿不到一分稿酬的，但是，我還是要在經濟動機上高聲讚美賈植芳先生，歷來為有志氣的文人所不屑一顧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行為，在當代文人賈植芳先生身上卻煥發出崇高的道德氣節。他一生多災難，多坎坷，這已經是他的歷史了，但現在，就在他八十多歲的衰朽晚年，他仍然用自己特立獨行的思想和艱辛勞動，塑造着一個硬硬朗朗的老知識分子的形象。

五

但是我知道，先生的願望還遠不止這些。有一次，楊浦區區委書記去看望先生，問他有什麼困難，先生毫不遲疑地回答，能不能讓任敏再醒過來，好好再過一陣子？

我想，這也是我們所有人的願望。

2002年5月5日於黑水齋

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



一個多月來，不少在媒體工作的朋友來約我寫紀念賈植芳先生的文章，我都答應了，卻遲遲寫不了一個字。頭腦從未有過的遲鈍，思緒從未有過的滯澀，我都嚐到了。直到今天，上海市比較文學學會在光華樓主持了先生的追思會。我在場內突然明白過來，我的無意識裏，何嘗不是暗暗拒絕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先生真的離我而去了。

一個多月來，我昏天黑地地忙碌，差不多一直在外地跑來跑去，用緊張的工作去麻醉自己，努力不去碰這一個事實。我希望先生還坐在他的書房會客、讀書、寫他的日記、發出他的朗朗笑聲。先生高齡卻無大病，性格豁達，看淡生死，晚年他的生活平靜而幸福。他生前最後幾個月一直住在第一人民醫院的特需病房，享受着醫院裏一流的照顧。醫生告訴我先生睡在病床上，伸手碰得到的地方全是書，始終關心着醫院外發生的事情。十天前醫生發現他有心臟停搏的跡象，中文系馬上送去了費用為他安裝起搏器。那天，去醫院探望的是副主任祝克懿老師，回來告訴我，先生的笑聲響徹病房。當時我想，先生是老年人，身體內各種器官都趨向衰弱，並沒有致命的病，即便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大約也還可以維持較長

一段時期。對於先生那樣堅強的生命，任何奇跡都是可能出現的。但是我沒有想到，僅十天以後，先生的腸道、呼吸都出了問題，突然間，撒手離開了這個世界。

先生真的離我而去了。校園裏掛滿了學生手疊的白紙鶴。我走在那些白紙鶴行列中，突然想起了先生曾經告訴我的一件事：1966年5、6月間，先生作為胡風冤案的「骨幹分子」服刑後從監獄裏釋放出來，被安排在復旦大學的印刷廠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一個很熱的中午，先生赤裸上身，拖着一輛沉重的拖車，從學校的工會禮堂前走過。正巧禮堂門口站着一群中文系的老教授，他們衣冠楚楚，從裏面走出來，說說笑笑，不曾注意迎面走來的一個拖車夫。先生是遠遠地看見他們了，他們曾經是同事，是朋友，可是在1955年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面，這是他出獄後第一次以這種難堪的方式與他們劈面對。先生說，當時他想迴避，拖着車子繞開走，可是他的腳還是一直往前走着，終於走到了這群過去的同事的面前。他們都怔住了，禁了口，驚恐地看着狼狽不堪的先生。先生說他還是抬起了頭顱，默默地在同事們不同的眼神下走了過去。他心裏在唸叨，你們也許比我還要狼狽了。果然，不久史無前例的浩劫開始了，所有的教授都在劫難逃。

我想說的是，先生做人的坦蕩。這是我從先生身上最強烈地感受到的一種品質。我們今天常常勸人走好一生的路，用「清清白白做人」來勉勵自己或者別人，但我覺得，做個坦坦蕩蕩的人，比做個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堅強和不容易。清清白白，可以從消極的立場上去拒絕和抵制這個社會上的污濁；而坦坦蕩蕩的人是無所畏懼的人，他就是一腳踏進了污泥濁水，他還是能夠坦坦蕩蕩，哪怕他

坐在監獄裏，受千百人的唾罵、侮辱、迫害，他仍然是個仰俯無愧的人。先生一生的命運總是與國家命運的多難聯繫在一起。抗戰爆發，先生在日本大學攻讀社會學，為了抗戰，毅然放棄了學位奔回祖國，在槍林彈雨的中條山戰區出生入死；他的伯父身為買辦，膝下無子卻廣有家產，曾經對先生說，你一生奔波，幾次入獄，還不如隨我做買賣，繼承家業。先生卻對伯父說：「你出錢供我讀書，不就是想讓我活得像個人樣麼？如果你讓我去做個商人，何必要我苦苦讀書呢？」先生拒絕了商人伯父的規勸，結果因為支持復旦大學進步學生運動而再度入獄。1955年，他的朋友胡風等人被誣陷成反革命集團，先生又一次為朋友的牽連蒙受25年的不白之冤。今天，一個崇尚金錢萬能的人很難想像，像先生那樣一個人，一次次拒絕了命運本來給他安排好的外國名校文憑學歷、萬貫家產、高級白領、紅色教授的道路，卻投身到戰場、監獄、運動……當然這不是他的有意選擇，但是作為一個坦坦蕩蕩的人，在為國家盡忠誠，為知識分子尋理想，為朋友擔道義等大節上，他只能作出這樣的選擇。

我感到奇怪的是，有過這樣命運的老人，卻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難籠罩在他心裏的陰影。我不是說先生的心靈深處沒有這些苦難的陰影，但是他從未因為受了那些苦難而改變對生活的熱情和善意，比如說，對人的信任。先生這種性格特點在經歷過苦難的一代老人中是很少見的。我遇到過一件事：大約是1980年代中期，先生去蘇州大學開會，會上有位來自廣西的大學教師，回廣西途中需在上海中轉，他想在上海住幾天，有人就介紹他可以住在先生家裏，並且給先生作了說明。可是那次外出師母沒有陪

同，先生耳背，沒有聽清楚是怎麼回事，還以為那位教師是蘇州大學安排送他回上海的工作人員。就這樣那位教師心安理得地在先生家裏住了三天，先生也每天好煙好酒地招待，三天以後客人回了廣西，他才疑疑惑惑地問我：那位客人是什麼人？為什麼在他家裏住那麼久？這時候我才發現，先生根本連客人的名字、身份、緣由完全都不知道。這種事情在俗人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對於一個坦誠君子來說，卻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先生常常喜歡說一句江湖話：「出門靠朋友。」他說他十幾歲離開家，在社會上闖蕩大半輩子，靠的全是朋友的情誼和幫助，儘管「朋友」這層關係也給他帶來了災難，但這個責任不應該由朋友來承擔的。先生對「朋友」這個稱呼極為看重，如果誰被他稱為「我的朋友」，那就意味着他將與你肝膽相照，赤誠以待。

正因為先生是個坦蕩的人，所以他能夠通達地放得開自己所經受的苦難，放得開一生所經歷的大小恩怨故事，顧全大局，胸懷大的目標，從來不會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名利、面子、檔次等一般文人最喜歡糾纏的小節上計較是非。我聽說過一件事，先生陪幾位外賓去某地參加一個活動，開飯時，當地主辦單位的領導臨時趕到，聽說有外賓出席（1980年代外賓出席還是很少見的），就立刻安排另席招待，匆匆把幾位外賓請走了。因為那位領導不認識先生，就沒有順手邀請，旁人可能感到有些難堪，先生卻一點也不在乎，依然說說笑笑。一會兒，那位領導又匆匆趕來，原來他聽說了先生在場，連忙趕來道歉，再請先生也過去用餐。照一般人想，先生也許會生氣，拒絕參加，其實先生毫不介意，照樣開開心心地出席用餐了。那位領導才鬆了一口氣。事後，先生從未與我說起這件事，倒

是那位領導有一次感動地向我訴說了先生的高尚人品。我覺得，這就是先生的坦蕩之處，他從來沒有擺出老人的尊嚴，所以他精神始終年輕；他從來沒有擺出名流的架子，所以他的朋友遍天下；他從來沒有把自己曾經受過的苦難當作一種資本憤世嫉俗，所以他笑口常開，仁者長壽。

先生這樣的通達為人，絕不是鄉願處世的態度，經歷過如此大風大浪的人，他對於世態看得非常清楚，只是不該計較的事情他決不放在心上。我可以說出許多這樣的故事。如，他冤案平反不久，恢復了教授的身份，學校有關部門安排他去當圖書館館長。我本以為先生會拒絕這樣乏味的工作。因為聽先生說，老校長陳望道曾經公開說過，賈植芳是個「無政府主義」，上午讓他當官，晚上就要下台，但沒有想到「無政府主義」的先生還是接受了這項工作。我曾經表達了我的意思，先生笑着對我說，上面要落實政策嘛，就讓他們落實一下，不要讓他們為難了。他就認認真真地在館長的任上工作了幾年，還主持修建了文科圖書館大樓。過了一任，先生已經70歲，學校裏通知他要退休了。很多朋友為他抱不平，認為學校這樣對待他是不公正的，梅志先生特意來信，勸他在退休前爭取離休的待遇，還表示願意為他寫證明。先生也是笑了一笑，對我說：「這種『幹部檔次』，我要它幹啥？」於是就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級知識分子的標準退休了。這兩件事，看上去好像有相反的含義，但表現了先生對於名利、對於工作、對於個人的道德追求，完全是以一貫之的。先生善解人意，一般也不拒絕社會上對他的好意相助，但並不是沒有原則，對於社會上流行的一些特權，他非但不屑於計較，而且有時候會表現出非常的獨立性。

記得在幾年前師母病重期間，先生每天要把大量的錢花在醫藥費用上，可能感受到經濟上的壓力，但是他從來沒有向別人（包括他的學生）說過自己的困難，也從未怨天尤人地抱怨命運不公。（後來我忍不住內心的感動才寫了〈感天動地夫妻情〉一文，披露先生當時的困境）先生多次與周圍的人說過，他是手裏拿着幾個銅元，一捲鋪蓋進入上海的，現在成了有家業有房產的「有產階級」了，大不了自己可以再拿幾個銅元捲了鋪蓋回山西老家去終老。所以我想，當時先生不是沒有考慮過自己的經濟狀況，但他寧可準備賣房回老家來挽救師母的生命，也不願意伸手求助。他的赤誠之心，終於感動了上蒼，師母的生命竟奇跡般地延續了整整三年。當最危急的時期過去後，先生又恢復了自信。最近我讀了不少有關先生的文章，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潘真在《新民晚報》上發表的短文〈賈植芳先生的一輩子像一堂課〉，文章裏說：「我曾寫過報道〈資深望重的賈植芳月入僅二千，一批退休老教授渴望得到善待〉。沒想到見了面，賈先生竟安慰我，已經加了，他是復旦加得最多的，退休金加到 2,000 元，月收入有 3,500 元了。『任敏（陪他受苦受難一輩子的妻）也走了，不需要花錢了，夠了。』」儘管我不認識潘真，但她所寫的確確實實是先生說的話。先生的高貴和傲骨，就是這樣隱伏在他的坦蕩的襟懷裏。

先生一生最重視的是知識分子的稱號，這是他自覺履行「五四」新文學精神使命的最根本的動力。他所戚戚然的，總是天下的大事，而不是個人的命運。1996 年我陪先生去台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輪到先生上台作報告時，台灣政治大學教授、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尉天驄作講評，他手裏揮舞着先生的傳記，高聲讚美先生

苦難而高貴的人生，全場掌聲雷鳴，向先生致敬。先生耳聾聽不見尉先生的話，緊張地東顧西看，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等他一走下講壇，詩人羅門就跑去向他傾訴心裏的感動。先生才明白剛才會場裏的掌聲是怎麼回事。他鬆了口氣對羅門說，做個知識分子，總是要像耶穌那樣，一代一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說得非常平常，但又是那樣的沉重。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精神的準備，他才會這樣舉重若輕地對待人生——這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人生。



我已經記不起來，我第一次是怎麼與賈植芳先生見面的，但肯定是於 1978 年下半年在中文系資料室。那時中文系設在一個破舊木結構的樓房的二層，資料室設在走廊西端的一間大房間，平時老師們讀書、交流、開大會等，都在那房間裏。因為面積不大，看書閱報議論的人多，總是感到有些嘈雜。在那一片聲音裏，最引人注意的是先生的一口山西腔，總是高亢有力，不斷地指點學生，「你應該讀這本書、應該讀那本書。」旁邊年輕的周春東老師輕輕介紹，這位是賈植芳，著名的胡風分子，英文、日文都「來賽」（來賽，上海方言，了不起）。這是我第一次聽說「胡風分子」這個詞，也第一次知道這個詞與「地富反壞右」一樣，是打入另冊的。

當時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還沒有平反，但是思想解放運動的風已經微微地在吹動，或者說，即使沒有思想解放運動，經歷了「文革」盛衰的中國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早已厭倦了階級鬥爭的血腥味。當時的思想風氣推動着我們把立場轉向「文革」中（也包括 1950 年代以來所有）的政治受難者，

同情他們也讚美他們，所以賈植芳先生戴着胡風分子的政治帽子，並沒成為我們接近他的障礙。而賈先生似乎也沒有顧慮到他的政治身份和學生之間可能發生的麻煩（這些麻煩，在早幾年工農兵學員「上、管、改大學」的時候是十分普遍的）。他與我們的交流就是那麼樸素而簡單，那麼直截了當。我們是懷着神秘的好感去接近他，他也是懷着熱烈的情懷來接近我們，二十多年的高度壓抑使他滿腔的熱情、經驗、學問，都像火山爆發似的，迫不及待地要噴發出來。這樣，我們就成為最幸運的學生，談話通常是從我們向他請教開始，接着就是聽先生滔滔不絕地講，每一次都有新的收穫，引導我們一步步走進了現代文學史的堂奧。

後來我們知道，先生與我們交往其實還是有顧慮的。李輝在一篇文章裏說到，先生在那幾年日記裏，總是含糊其辭地記着小陳、小李，而不寫我們的名字，他這樣做是怕萬一有了政治風波會牽連我們。我想這是先生長期受迫害造成的心理陰影，只是平時被掩蓋在豪爽的熱情本能之下，我們察覺不出而已。聯想到後來又一個政治風波發生，先生直接就對我說，應該把一些會惹麻煩的書信日記都處理掉，他說他自己過去就是「小資產階級」情調太多，捨不得隨時處理一些不該留下的東西，才會在複雜的政治糾葛中一次次地罹禍。「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能活下來說說話就不容易，書信文稿什麼都是不重要的。」他親口這樣對我說。由於那次風波過程本身一波三折，呈現出複雜的局面，有許多人起先紛紛激烈表態支持學生運動，唯恐自己的名字不被人注意，後來風向逆轉，又慌了手腳，做了一些為人所詬的事情。學校裏一時議論紛紛，月旦四起，先生始終冷眼看着局勢，有一句話他在風波之前之後說過多

次，至今還有人在流傳。他說，武松打虎有兩種結果，一種是打死老虎，做英雄；還有一種是被老虎吃掉。你是武松就去打老虎，是武大郎就去賣燒餅。武大郎不能看武松很光彩也跟着去湊熱鬧打虎，只想做英雄不準備被老虎吃掉，那是不行的。

由於現實的教訓，晚年先生心底所埋藏的陰影有時在日常生活也會起着作用，左右着他的一些念頭，使他對於身邊發生的政治動盪不再有年輕人似的盲目和衝動，他對於政治的多變性與複雜性已經有太多的經驗。在他自己與客體世界的互動關係上，他有足夠的清醒認識。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一種對自由的理想、對友誼的信任，以及知識分子之間的相濡以沫的感情，卻始終蕩漾着，就像年輕人一樣的熱烈。譬如他對胡風及其他受難者，一直懷着難以抑制的熱情。1985年8月6日，在胡風去世後兩個月，胡風家屬決定辦理遺體火化，不開追悼會，也不舉行告別儀式。賈植芳、王戎先生從上海趕到北京，與在北京的朋友一起向胡風作最後告別。記者李輝在場，細膩地記下了這個時刻的賈植芳：

緊接着周穎之後的是賈植芳，年過古稀的他，一跨進門檻，就號啕大哭。所有人中，只有他如此不能自制，哭得那樣傷心。他的聲音很粗，「哇」的一聲哭叫，一下子使氣氛變得更為壓抑。他哭的時間很長，站在胡風的遺體面前，嘴裏不時叫一聲「老胡」，他好久也不願離開。沒有人來勸他，沒有人來拉他，任他放情地慟哭。他一邊哭，一邊朝梅志走去，梅志平靜依舊。

與別的在場人士的冷靜相比，賈先生的感情噴發出乎我的意外。我在先生身邊30年，沒有見過先生用這樣的方式放任自己的

悲痛，連在師母的告別儀式上也不曾見到。但我毫不猶豫地相信，先生面對他患難與共的朋友胡風的遺體，他會這樣表達自己。就如他在自己的回憶錄《獄裏獄外》所寫的法院宣讀判決的場景：

宣判會開始了，先是檢察員唸起訴書。當他唸到「首犯胡風，1965年11月26日經最高人民法院判決，該犯已認罪服法」時，我在緊張的狀態下，把「服法」聽成了「伏法」，腦子裏猛地飄過一個念頭：怪不得上次在監獄裏，那人說不會槍斃我，難道胡風被槍斃了？這麼一想，我腦子轟的一下昏起來，眼淚頓時模糊了一切。那個檢察員還在振振有詞，但似乎離得很遠，我根本聽不見了，我不知道起訴書和判決書的內容是什麼。

這就是賈先生的性格。在自己性命攸關的時刻，他誤以為胡風已經被害，悲慟之情使他聽不見自己的判決書。這都是他的熱情本能戰勝了殘酷政治鬥爭強加給他的心理陰影，露出了他率真性格的地方。

在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中，除了庚死獄中的阿壠，賈植芳先生不僅是被判得最重，而且是最遲解決冤案的。在1980年胡風冤案初次平反的文件上，別人都摘了帽子，唯獨對賈先生還留了個尾巴，就好像全國「反右運動」最後還留下了五個人墊底一樣，又過了兩年才最後解決。對這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首先，先生並不是文壇糾紛的中心人物，他因投稿結識胡風，把胡風視為引路人和朋友，但他不關心也不擅長胡風的文藝理論，不像阿壠、路翎那樣，一開始就陷入是非漩渦；其二，先生是一個三教九流都交往的人，沒有什麼明顯的宗派性，比如，他與當年魯迅的對手施

蟄存、韓侍桁、邵洵美都有很好的交往，又因為賈芝先生在延安方面有特殊的背景，多少也應該有些保護作用，不至於成為胡風集團裏的鐵杆分子，也不至於受到這麼寢皮食肉的仇恨和迫害；其三，我一直覺得，先生的思想譜系和社會經驗比較獨特，與胡風一派的主流思想有些距離，他是胡風朋友圈中的一個另類。1950年以後，胡風身陷北京屢戰屢敗，先生實心實意地勸胡風：「我們都不如魯迅先生，魯迅在二三十年代捲入政治漩渦，但他深深懂得中國的政治歷史和社會，他進得去出得來，始終有主動。而我們不行。你不懂政治卻偏偏往政治漩渦裏湊，那是太危險了。」他勸胡風放棄文藝思想爭論，埋頭翻譯阿拉伯神話《一千零一夜》。這當然不是胡風所願意接受的，賈先生對危險充滿警覺，胡風卻不以為然，結果還是攜手走進了一場大災難之中。

如此歸納起來，一、先生不是文壇糾紛的中心人物；二、有賈芝為背景；三、他對政治鬥爭有相當高的敏感。憑着這三點，先生就不應該成為胡風冤案裏最受累的「分子」。然而他卻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想這災難發生之前，胡風的對手們一定拉攏過賈先生，如果堡壘要從內部攻破的話，第一個缺口就應該從賈先生身上打開，而不是身處邊緣地帶、已經有辮子抓在對方手裏的舒蕪。進一步也可以這樣理解，賈植芳先生所拒絕的，也許正是舒蕪求之不得的機會。《獄裏獄外》裏有「京上陰雲」一節，先生回憶了當年何其芳通過賈芝找他談話的事，似乎是含有要他反戈一擊的意思。我後來就這個猜想請教過先生，先生默然。他卻說了另一件事，說1979年他還沒有完全平反，他去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參加一個現代文學資料叢書的編輯會議，輪到討論「胡風反革命集團批判」

的主題時，主持方安排先生主持會議。先生一言不發，只是讓與會者自由討論，什麼態度也不發表。這是先生告訴我的原話，但從先生的語氣裏可以感受，他對此事的理解是很情緒化的，他認為主持方是有意考察他對胡風冤案的看法，但先生不表態本身就是一種鮮明的態度。接着先生轉述了李何林先生對他說的話，說是：「你怎麼跑到周揚一幫去開會了？」這種懷疑色彩就更加明確了。所以先生的結論是：「我的態度讓他們知道，我還是以前的我。於是他們在我背後又來了這麼一下。」所謂「這麼一下」，先生指的就是1980年的平反文件裏對他的最後一擊。那個會議，還有1954年的那次何其芳談話，是否真含有這樣直接的政治目的，我還有些存疑。但是有一個現象可以比較，1955年先生是坦然陪着朋友走進了災難。當然舒蕪後來也走進了災難，但先生是沒有帶着任何恥辱走進災難的。在我看來，先生有許多時候都是處在為人豪爽的热情本能和無意識的心理陰影的夾纏之中，但是在人生的關鍵時刻，往往是前者佔了上風。

但也是有例外的時候。這裏就要牽涉到先生與舒蕪的關係了，近兩年，所謂「賈拒認舒」公案眾說紛紜，演義故事到處流傳，又有旁人的推測引申，事情搞得撲朔迷離。這個公案，因為先生在關於中國作家協會全國代表大會的日記裏沒有記錄，再加上另一個當事人的否認，造成了疑點重重，有人甚至推理出這是先生心裏想做而實際上沒有做的幻覺。但我很清楚，至少從先生那面而言是確有其事的。在先生剛從北京開完作代會回來時，他就告訴過我這件事。那時候還保持了新鮮的記憶，至少不會弄錯什麼細節的。關於賈、舒恩怨，議論者已經說了很多，我只想補充一些別人沒有說過的事情。

在此事發生前一兩年裏，賈、舒曾經有過一些來往：他們在北京見過面，吃過飯，同時還有過通信和互贈著作的交流，應該說關係是緩和的，那為什麼在作代會上會突然發生「拒認」的事件？

以我所知，這既有遠因，更有近因。遠因是在 1983 年 1 月 31 日舒蕪連同牛漢、綠原一起做東宴請賈先生夫婦以後。那次飯局後，他們同遊琉璃廠，舒蕪買了一本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就在書上題記：

1983 年 1 月，賈植芳兄偕夫人任敏來京，參加現代文學流派問題討論會，31 日午，與綠原、牛漢與余共酌植芳、任敏於前門飯店餐廳。飯後，皆遊琉璃廠中國書店購此，書頁猶多未裁，印成至今 50 年矣。燈下展現，略記今日之事，50 年後或有續記數行者乎！舒蕪。

我沒有看到這個題記的原件，以上這段話是舒蕪先生作為證據發表在《書友》雜誌、又由張業松轉引在〈「賈拒認舒」材料補〉一文中。我讀後心生一個疑點：這個題記究竟是舒蕪在當天晚上的燈下所寫，還是在琉璃廠中國書店買書的時候當場所寫？從現在公佈的內容來看，似乎是當天晚上補記白天的事情經過，所以其中有「燈下展現」云云。但就我所知，這題記是購書的當場所寫，因為先生回到上海就告訴我這件事，而且還說了題記的具體內容。先生沒有千里眼，也不會跟蹤到舒蕪家裏的「燈下」，唯一的解釋是，這段話的前半部分是舒蕪在琉璃廠購書後當場所題，而從「燈下展現……」起才是回家後補記。賈先生對舒蕪此舉非常警惕。他認為這是舒蕪宴請他們的真實目的，而且牛漢、綠原都被他矇騙過去

了。在他看來，舒蕪當場題記一事，目的很清楚，是要通過這一段文字留下證據，證明賈、牛、綠等這批胡風冤案的主要受難者已經原諒舒蕪，和好如初了。舒蕪的藏書、周作人的原版，都是會流傳後世的，那麼，舒蕪的題記在將來就會成為一種歷史證據。最近牛漢先生著文紀念先生，就寫到當時的情景：「賈先生來北京社科院參加學術會議，我們又見面了。這期間舒蕪請求我帶他去見賈先生。賈先生在舒蕪面前表現得很大氣，跟路翎不同，路翎堅決不理睬舒蕪。這是因為賈先生脾氣比路翎溫和，但溫和不等於軟弱。」可見這次賈、牛、綠、舒的聚餐對舒蕪是很重要的舉動，他作了精心準備。而賈先生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我查先生這段日記，除了吃飯、逛書店外，一字未提舒蕪購書題記的事情，而是特別記了如下一段話：「他這次很積極，牛漢說，這是向我們請罪了，眾人只是敷衍而已。」強調了「請罪」和「敷衍」兩個關鍵詞。後來事實證明，先生是有見地的，舒蕪那份題記還沒傳諸後世就開始派上用場了。

至於近因，那是在作代會期間。當時聽先生說，他是與耿庸住一個房間，許多「胡風分子」經常串門，自然也會說些閒話。在閒聊中有人講到舒蕪在以後歲月裏的一些事情，是先生以前不知道的。據先生當時告訴我，有一次那些朋友正在房間裏閒話，舒蕪敲門來訪，先生說，當時外面黑裏面亮，他本來就眼睛不怎麼認人，一下子沒有認出，就問你找誰？（這個情況先生在家裏也經常發生的）舒蕪說：「就找你啊。」於是先生接着說：「我不認識你。」據先生當時說，舒蕪見他不歡迎，就點點頭走了，先生才將門重重關上的。先生當時告訴我這事是很隨便地說出來，沒有立此存照的意

思。我也是漫不經心地聽過，沒有特別去記錄下來。但當時先生說「我不知道他後來還做過許多事」（大約是指「文革」時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些人事糾葛）的神情，我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我想先生大約與別人也說起這事，後來傳來傳去，就變成許多故事了。2004年李輝寫〈永遠尷尬着，或者隱痛——從舒燕與賈植芳的見面談起〉一文，解讀了他理解中的賈、舒關係，先生在讀李輝文後的日記裏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補充，那畢竟是20年後一個九十老人的追憶，何況有李輝的文章解讀在前，我覺得與我當時聽他說的情況還是有些出入的。我曾經試圖與先生核實當時的一些情況，如：當時房間裏還有誰在？他聽說的舒燕在其他運動中又做了什麼事？等等，但先生已經完全記不清了。

我前面說過，先生常常處於他豪爽的熱情本能和無意識的心理陰影夾纏之間，「賈拒認舒」公案是很典型的。以前已經有學者說過，先生在1947年被國民黨抓去監獄時，舒燕接濟過他們夫婦。患難中掙扎過來的先生對於別人給他的點滴幫助都是銘刻在心的，所以他不像路翎那樣拒絕舒燕，而是表現出溫情和大氣，甚至在1983年主動去看望舒燕，這是他的為人熱情本能所致。至於他看到舒燕住宅條件簡陋及獲知舒燕後來也被打成「右派」等遭遇，也不會幸災樂禍，他的感嘆還是從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着眼的，即便是當了猶大的知識分子，也沒有過上一天的好日子。但是，當他看到舒燕的購書題記的精心表演，無意識的心理陰影就出現了，他開始警惕了：這個人還在演戲，並沒有真實地懺悔。作代會期間胡風分子相聚甚歡，但是他再沒有主動去找舒燕。當他聽到了朋友間議論舒燕的是非，就更加證實了對舒燕的警惕。所謂「賈拒認舒」就

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那一次，從他開始沒有認出舒蕪到認出後頓增反感，再到拒絕舒蕪入內（房間裏正有一批議論舒蕪是非的朋友），我想是一個有系統的心理過程的。從此以後，賈、舒之間的往來確實再度中斷了。

還有一件事，也是發生在作代會上。當時周揚已經病重，不能出席大會。周揚本來是胡風派的死敵，也是許多在 1950 年代受到傷害的作家共同仇恨的官員。但是「文革」後，周揚表現出痛改前非，向許多被他傷害過的人道歉，作自我批評。他對於胡風事件也一樣，多次表述他雖然與胡風有宗派鬥爭，但要製造這麼一個大冤案，確實非他力所能及，也是出乎他意料的。這話自然是另有隱衷，但胡風一派的朋友對他過去的行為是很難原諒的。先生也是如此，記得中文系曾有一位教授去看先生，說了周揚的這個意思，先生立刻就反問：「是周揚派你來說的？」那位教授趕快否認。其不信任的心理陰影非常明顯。但是周揚晚年確實走上了思想解放的道路，尤其是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理解，惹出一場「清除精神污染」的風波。這場風波差點把當時任上海市宣傳部部長的王元化也捲了進去。周揚從此病倒，一蹶不振。但在廣大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中間卻贏得了很大的同情。在作代會上，作家李陀等人建議給周揚寫致敬信，寫成後貼在大門口徵求簽名。簽名的人愈來愈多，沒有想到，胡風分子賈先生也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個鐵杆的胡風分子，竟向周揚表示敬意，這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賈先生在為人豪爽的熱情本能下完全可能做這樣的事情。自從思想解放運動以來，先生本能地意識到這是中國思想界擺脫極「左」路線、向「五四」新文化傳統回歸的重要步驟。在我的印象

裏，先生非常關心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的風風雨雨，凡是有利於思想解放的學術觀點，不管是誰提出來的，他都會熱情支持；反之，對思想解放運動採取保守的、懷疑的態度，尤其是以大批判的方式來質疑思想解放運動的，他會反感。痛苦的歷史經驗和「五四」新文化傳統的薰陶，使他本能地作出這樣的抉擇。但是，他這樣做是會遇到一些壓力的，尤其是在他的受難的朋友裏，肯定會有人不理解。當時確有許多正直的知名作家，出於對周揚的歷史恩怨，凡是周揚做的事情都反對，可偏偏周揚永遠佔據了話語的主動權，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也被他緊緊地抓在手裏，他成了改革派；而許多反對他、受過苦難的作家反倒成了保守派，譬如丁玲。先生曾告訴過我，1980年胡風冤案平反文件裏給先生留了一條政治尾巴時，丁玲曾憤怒地對別人說：「他們怎麼還要迫害賈植芳啊？」先生對丁玲是心懷感激的。在這話語系統裏，「他們」、「我們」壁壘是多麼清楚！但是，在歷史進步的大是非上，先生還是在給周揚的致敬信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儘管後來先生曾有意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說他簽名是為了讓周揚看到，受過他迫害的賈植芳還活着呢。我覺得這只是事後的一種解釋而已，反映了埋藏在無意識中的心理陰影又冒出了頭。先生在整個思想解放運動中的思路非常明確，他甚至對自己終身不渝的患難朋友胡風的某些思想觀點，也進行過反思。李輝在《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裏曾記錄了先生的一段話：「胡風這個人有忠君思想，像晁錯一樣，想清君側，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寫三十萬言書，實際上和過去傳統的上萬言書差不多，應該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來看這段歷史。再說，我們的朋友中有些文藝

思想也很左的，不能容人。」他私下裏也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過類似的話：「胡風的文藝理論是當時歷史的產物，現在看來也有左的地方。」顯然，先生在這裏所說的「左」，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權力政治意義上的「左」，而是指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一個非常的複雜的歷史時期，人們為對抗更大的權力政治而踐行的過激行為。為此，他對胡風及其朋友在過去文章裏批判或者傷害過的唐湜、范泉等作家，都主動去道歉，為朋友胡風當時的處境作解釋，平息了一些不必要的誤解。

三

賈植芳先生去世後，我擬就一副輓聯來總結先生一生的成就，先在祭奠上用過一次，後幾經朋友的斟酌修改，定稿為：

從胡風追魯迅，橫眉冷對熱腸扶顛，聚傲骨良心悲智俠膽
為一腔正氣

由社會進書房，大寫做人中道敷文，融研究創作翻譯育人
開八面來風

我沒有把先生一生坎坷多次入獄的事跡寫入輓聯，其實這樣寫的作品不少，「牢獄人生」幾乎成了賈植芳先生在許多人心目中的關鍵詞。人們讚美先生在歷朝歷代出入於監獄而矢志不渝的高風亮節，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苦難中求索真理、實踐人格的高貴精神，卻有意無意忽略了先生在普通生活中辛勤勞作的價值，忽視了先生在知識分子崗位上對人文學術所作出的貢獻。先生多次說過這樣的話：「誰會想到命運把我送進監獄？我只是憑着一個知識分子

的良心生活，被中國多災多難的環境推着向前走，自己還以為這樣做是為國家效力，對社會進步作貢獻，哪裏會想到進監獄？」我想這是先生的大實話。1955年他被捕入獄，受審不肯承認自己「有罪」，辦案人員拍着桌子罵：「沒有罪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先生坦然地回答：「我好好的在學校裏教書，是你們把我弄來的，又不是我自己要來。」這當然也是大實話。像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更多的是要求有正常工作的權利，只要能夠擺脫監獄的魔影，他們立刻就坦然地生活，享受正常人在正常社會的正常權利，他們珍惜自由，珍惜思想，珍惜勞動，並以自己的創造性勞動索取生活資源而感到自豪。這是先生與某些有志於當職業革命者的人不太一樣的地方。賈植芳先生與他的哥哥賈芝先生就是一個有趣的對比。賈芝先生一生循規蹈矩，順應潮流，從北京校園詩人進入延安參加革命，最後成為一個老幹部；而賈植芳先生一生顛沛流離，他親自把嫂子李星華等人送去延安，把一些青年學生介紹去延安，而自己卻始終闖蕩在戰場、文壇和監獄內外，沒有一個安身立命的歸宿。其實，先生的心中是有歸宿的，有一樣東西是從「讀書」而來的，比一般的建功立業更為重要、更有價值，這個東西就是他可以賴以安身立命的歸宿。

那麼，這是什麼？

這似乎是很難理解的，先生也沒有自覺地闡述過真正驅使他一生追求的動力是什麼？他只是反覆地說，要把這個「人」字寫端正。但，怎麼樣的「人」字才是端正的呢？在20世紀的中國極為複雜的現實環境裏，什麼是知識分子追求目標的真正依據？什麼是現代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以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現代文學

史（或者說研究現代知識分子形成史或發展史）的學者苦苦思索的問題，也是我們進入研究現代文學史（及相關的現代史）的一把鑰匙。這不是僅靠接受一套概念就能夠解決的，也不是從時代的潮流中可以簡單獲得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是結合了自己一生的摸索經驗和實踐教訓，才能夠慢慢地去體會它和理解它。從 20 世紀初開始，從士大夫階級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有價值的行為都離不開探索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他們起先還想從重新整合學術傳統來調整自己的價值觀，辨析自己的道路——這是屬康有為、章太炎一代人做的工作；後來，在西學東漸的壓力下，知識分子開始實行改革，反思傳統，以求與浩浩蕩蕩的世界新潮取得一致的步伐——這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工作；再後來，隨着抗戰與以後一系列新的局勢變化，學術傳統逐漸成為知識分子個人情懷和寓志的寄放箱，與他們的實踐行為相分離——從這個時代開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就進入了一個漫長的黑暗隧道，他們在無枝可依的狀況下，個人的操守行為就變得愈發重要，幾乎是憑着一種本能的良知來抗衡類似中世紀宗教的時代主潮，這時候的學術傳統，已經退守為若隱若現的無意識，發揮出極微弱的作用。西方知識分子把本能的良知尊為良心，而我更願意稱它為一種德行——它無關乎現實行為中的具體道德準則，只是一種抽象的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肯定性前提。古人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從一個現代人的立場來理解：「立德」表現為一個人能否為周圍環境營造一種良好的氛圍，通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來影響他人，並有能力將這種原則貫穿到自己的日常行為中去；「立功」表現為一個人能夠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做出顯著的成績，並以這樣的成績有益於社會的良好風氣；至於「立言」，在我看來，不過是「德」與

「功」的註釋而已，並非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一個學術傳統與個人的社會行為相分離的時代。

在這個意義上探討賈植芳先生的貢獻，我以為他一生的追求和行為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個案。我這麼說，沒有要把先生塑造得很高大的意思，我只是說，他在他所生活的時代裏，成為一個比較典型的個案。譬如說，我不止一次聽到有人用嘆息的口氣說到先生：「假如他不是受了那麼多年的苦，將會有多少著述可以寫出來啊。」同樣的話可以從比較消極的意思去理解：他已經受了這麼多的苦，坐了那麼多年的牢，即使什麼著述也沒有寫出來，仍然是值得人們尊敬的。在先生剛去世的時候，我還接過一些媒體記者的電話，他們總是問：「賈先生在學術上的代表作是什麼？他與季羨林相比怎麼樣？與王元化相比怎麼樣？」大概他們以為，對一個人學術貢獻的估量，可以像在麥當勞買雞腿那樣，比一比哪一塊更大些。對於這樣的問題，我當然不予回答。但我現在想說的是，這個命題從最初的形成就包含了一個錯誤的前提：假如先生沒有在 1955 年到 1978 年那段時間中陷入空白，他是否有可能寫出許多有價值的著述？即使他寫了許多著述，能否就能證明他的學術貢獻？同樣的問題我在另一個場合也遇到過：在傅雷先生的百年誕辰紀念大會上，有一位發言者感慨地說，假如傅雷沒有被打成「右派」和在「文革」中自殺，那他現在肯定完成了巴爾扎克全集的翻譯，那將是多麼有價值的工作啊。當場一片唏噓。但我想告訴那位發言者，傅雷先生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翻譯巴爾扎克的全集，他認為巴爾扎克的許多小說是值得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的。這就是傅雷先生的精神所在。傅雷先生沒有翻譯巴爾扎克全集，他仍然不失為最優秀的知

識分子之一，因為他的「德行」的價值勝過了他的「言行」。知識分子與他的時代之關係，不能僅僅以「言」而論定他的價值，尤其是在一個話語權被高度集中並高度政治化的時代裏，或者是在現代媒體壟斷了社會輿論而造成普遍浮躁的時代裏，「立言」是微不足道的。這也是巴金晚年寫《隨想錄》懺悔的認識所在，也是沈從文後半生放棄創作而研究文物、服飾的價值所在。換句話說，賈先生有 25 年的「不言」，從學術與人格的意義上看未必就是他的「不幸」，而是讓他迴避了許多知識分子不得不承受人格分裂的遭遇，也迴避了許多知識分子不得不放棄寫作、改變專業、轉移興趣、用沉默來苟且性命的遭遇，這 25 年的災難也正是先生身上最寶貴的「德行」的培養時期。不同的人有不同培養「德行」的形式，巴金是在內心煎熬的懺悔中，沈從文是在鑼鑼罐罐的文物中，而賈先生，則是在不得不降志辱身的監獄裏。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德行」所依據的是什麼？它是屬倫理範疇還是學術範疇？我認為它是兩者兼而有之的。抗戰開始，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活動就失去了窗明几淨的實驗環境，他們所負載的學術傳統在實踐中——無論是炮火中流離失所，還是政治運動中經受考驗——遭遇無情的磨難，他們的社會實踐本身就成為對學術傳統（所謂「五四精神」）的守護與發展。抗戰以後的一代甚至幾代知識分子都是在難以想像的污泥濁水中掙扎、受難與昇華，並且以此作為理解傳統的出發點。賈先生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中成長，走進抗日的社會大戰場，他在實踐中隱隱約約感受到一種通過「讀書」而來的精神資源，推動着他的求索步伐。賈先生所讀的書，他提到過的，就有來自西方的

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尼采哲學、俄羅斯文學、日本文學，以及中國古代的歷史與文學，更為強烈而直接的，則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特別是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文學作品。如果在賈先生的知識譜系裏有個中樞點，那就是「五四」新文學的精神傳統。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都是通過「五四」新文學這個中樞來對他發揮影響，滋養他的精神。這是賈先生判斷所有的善惡倫理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培養他的德行的出發點。他之所以接近胡風，並結成了生死友誼，也是在認知「『五四』—魯迅」精神的譜系基礎上發生的，不是出於江湖義氣，而是出於對「『五四』—魯迅」精神的認同。所以，在我所撰寫的輓聯上聯裏，有意把關心社會的悲智、堅持正義的良知、不畏權勢的傲骨與生死不渝的俠膽，視為先生品質中最重要的四大特徵，都歸結為「『五四』—魯迅」精神傳統在先生個人身上的展現。

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裏，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可以來自各種文化資源，也可以綜合來自各種文化資源。賈先生的「德行」的來源也是如此，但其中最直接的是來自「五四」的新文學傳統，這是一種尚未定型，同時遭受着各種苦難考驗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傳統，需要在整個中國的進步發展的實踐中不斷獲得新的生命活力。這種傳統在賈植芳先生身上強烈地體現為兩個精神特徵：一是懷疑一切權威教宗，要求在人性的範圍——就是把「人」字寫端正——檢驗一切事物的真相；二是要有盡可能開放的視野來看世界，要接受世界上一切有價值的文化財富，不排斥異己，不唯祖宗為絕對之是。以這兩個精神特點來指導人生，便在立德；以這兩個精神特點來教書育人，便在立功。先生能夠在復旦大學原創性地建設了中國

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兩個學科，培養並影響了一大批學術梯隊，都是與這兩個精神特點的支撐分不開的。先生自己的著述也是如此，收錄在《賈植芳文集》裏的理論文章和大量序跋，基本上不脫離這兩個特點。

另外，先生的學術活動主要來自社會實踐，他帶着一個廣闊的社會背景進入高校擔任教職，所以他從來不是從書本到書本地教授知識。他在培養學生的時候，首先是讓學生看清了真正學問在於對中國社會有深刻的洞察力，有歷史感，還有就是參與熱情。他從來就不喜歡那些在書齋裏小心翼翼地尋章摘句、連點燃一枝煙也怕燒痛手指的學術庸人，更不喜歡那些熱衷於隨着政治風向轉、跟着社會傾向跑的呼風喚雨的活躍分子。在我跟隨先生步入學術研究的初期，先生着重要我做到兩點：一是從尋找真相出發，尊重歷史真實。當時他告誡我做作家研究一定要從讀原版本入手，從最初的文本來把握作家的真實的思想，然後再校勘後來版本中作家的修訂內容，從中來看時代對人格的某些影響。二是要多學幾門外語，要從世界的範圍來吸收新的思想資源和學術成果。他在 1980 年代復出後主持的工作，首先就是主編幾套大型的現代文學社團、思潮資料彙編和作家研究資料集，他一再強調要保證資料的完整性和真實性，要保留原始材料的真面目。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之一《巴金專集》時，他不但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資料，還主動把眼光放到國外的研究著作，從中來深入了解巴金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當時我和李輝還在唸本科，先生就交給我們一本美國學者奧爾格·朗（Olga Lang）的研究專著，要我們從中翻譯有關章節編入專集。我們之所以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與翻譯這本書直接有關，

我們從這部研究著作中看到了一個陌生的巴金文學世界。從閱讀巴金開始，我繼續閱讀了世界無政府主義的理論著作和俄羅斯民粹運動的論著，進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有了新的理解。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理解，最早是在 1970 年代系統閱讀了馬列原著，後來就是在研究巴金的過程中對照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又一次比較深入地重溫了社會主義思想學說，我的世界觀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裏形成的。後來我畢業留校，擔任了先生的工作助手。接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協助先生主編《外來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大型資料彙編，先生一再對我說，不但要收集當時翻譯到中國來的西方文學思潮流派的介紹，還要從外文專著中找到有關西方思潮的權威論述，要把這些資料翻譯過來，對照中國當時介紹西方思潮的實際狀況，注意研究兩者的差距。我們還閱讀了不少西方漢學家的研究著作，包括李歐梵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在內的一批著作，都是當時先生具體指導我閱讀，還進行試譯的。後來他把自己翻譯的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論文，以及我們學生翻譯並由他親自校對的相關論文，編成一部譯文集，幾經周折後在 1980 年代中期出版，書名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那時比較文學學科才剛剛興起，這在當時還是很新鮮的學術成果。

先生屬魅力型的教授，在他的身旁始終圍繞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子。先生的教育觀是有教無類的，只要有青年人登門造訪，無論親疏，也無論是為了個人目的求教求助，還是為了人生學問中的大疑惑，他都一視同仁，竭力相助，熱情對待，以熱情的性格和開闊的視野深深地影響學生。曾華鵬先生在 1950 年代是先生的受

業弟子，先生去世後他含着眼淚對我說：「當時中文系在課堂上最受歡迎的兩位教師，一位是劉大杰先生，一位就是賈植芳先生，劉先生能說會道，上課自然吸引學生；而賈先生一口山西土話很難讓人聽懂，怎麼也會吸引學生？」曾華鵬教授回憶說，賈先生上課沒有講稿，每次進課堂總是捧着一堆外文書，講到蘇俄的或者是某個西方作家的觀點，總是隨手取一本外文書，英文或者日文的，翻到某頁，邊翻譯邊講解，這種授課形式在 1950 年代就打動了學生的心，一下子把學生的求知慾擴大了。但我曾聽先生說過，他在 1950 年代總是夜裏準備第二天的講課內容，一般都不睡覺，直到第二天白天上完課了才回家睡覺。他精彩的課堂講授完全是建立在徹夜不眠的精心準備之上的。賈先生對學生的關心還遠遠不是在課堂裏，他總在課後把學生請到家裏，談天說地，將教學寓於日常生活之中。這一點我有深刻的體會。但我還是願意多講些別人的故事。施昌東教授，卓有成就的美學家，1980 年代中期因患癌症去世。先生對施昌東關愛有加，勝過親子。但我知道他與施昌東的緣分是從一次爭執開始的。當年施昌東還是一個學生，寫作課交了一份作業，是一篇小說創作。作為教師的先生為他批改，大約是批改的地方過多了，傷了學生的自尊心，施昌東氣呼呼去找先生爭辯。先生把他請到家裏，認真談了起來，漸漸地學生服氣了，從此就經常去先生家裏求教。1955 年發起批胡風的運動，先生的學生中間也產生了分歧，共產黨員的章培恆寫文章為胡風辯護，文章被退了回來；共青團員的施昌東寫了批判胡風的文章卻在雜誌上發表出來，先生深知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對施未有半句責備的話，只說以後你們自會了解真相的。結果運動深入，先生入獄，章培恆、施昌東雙雙被打成胡風影響分子，黨籍、團籍全都開除。25 年過去，

章培恆先生成為著名的文學史家，施昌東先生成為著名的美學家，曾華鵬、范伯群先生成為著名的現代文學研究學者。我在先生家裏看到 1980 年代初出版的《王魯彥評傳》，是曾、范兩位先生所著，扉頁上龍飛鳳舞的一行字是范先生的手跡，大概的意思是：「先生，二十五年前的作業我們今天來交卷了。」我記得我讀到這句話時眼睛當場就濕潤了。現在，大約又是 25 年過去，我也已經是年過半百。我，還有我的學生回憶起各自的成長經歷時，大約都有一份答卷交給了先生。學生的成長，不正是一個以教書育人為工作崗位的知識分子的最大榮耀，對社會對學術的無量功德嗎？

1980 年代中期，先生擔任了學校圖書館館長，同時還擔任了校務委員，院系的學術委員會成員等，工作漸漸地忙碌起來，身體也漸漸進入了衰老階段。好幾次我都對先生說，以先生豐富的閱歷和文學經驗，可以口授講解的形式著述一部文學史，我願意幫先生作記錄整理文稿，先生都不置可否。一次晚上，我坐在先生的書房裏聊天，又提起了這個話題，這次先生明確表示，他不喜歡寫文學史。他說這在他看來沒有意思，他一生只是在新文學的傳統裏尋求真理，結識了胡風、馮雪峰等朋友，理解了魯迅，也看到了許多文人的投機作派的嘴臉，人生經驗大於文學的意義，至於從文學角度論好壞，還是讓以後的人去議論吧。師母在旁邊說，先生本來就是作家，志在創作，命運竟安排他到大學來教書，從事研究，還惹出 1955 年的政治官司，都是非他所願的。先生現在年紀大了，精力有限，最想做的是寫一部回憶錄，把一生的經歷寫出來，留給後人。先生也點頭稱是。這，顯然是他們老夫婦倆反覆盤算過的計劃。就是說，在經歷了人生大起大落的命運考驗，在高校的崗

位上教書育人將近耄耋以後，先生才考慮「立言」了。這就是他在1990年代經口授錄音整理的回憶錄《獄裏獄外》的初衷，很可惜，這部回憶錄只出版了上卷，下卷因為涉及先生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大量口述資料還封塵在錄音帶上，不知道將來有否機會再見天日，不過，這對先生在天之靈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

第一部分寫於2008年5月31日

第二部分寫於2008年7月27日

第三部分寫於2008年7月30日

五年來的思念

賈植芳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已經五年。但我常常覺得，先生並沒有離開。因為，一個人的生命並不僅僅依賴肉身而存在，人的生命可以依託於三個層面：第一層當然是寄植於人的肉體，這是最物質的層面，通常唯物論者相信，人活着，生命就存在；人死了，生命也就隨肉身而消失。我是個唯物論者，我也從來不相信鬼神，但我還是認為，人的生命現象還遠不止那麼簡單。一個人雖然死了，他生前認識的、有過交往的人，他的愛人、親屬、子女、朋友、後輩，親疏不論，只要想起他來，音容笑貌歷歷在目，他的言論行為依然激勵他人，怎麼就能夠判斷他的生命已經不存在了呢？不是明明活在他人的記憶和思念中嗎？這就是生命所依存的第二個層面，屬虛幻的、感情的層面。不過，人事總有代謝，當那些保存生命信息的記憶、思念的擁有者也陸續逝去，疏遠的晚輩對他不再有回憶的時候，他也許就真正地消亡了，這是生命的再度消失。但是還有例外，那就是一部分人的生命信息通過某些物質——文字、圖像、聲音等，通過某種有形或無形的遺產，還能夠繼續被保存。譬如說，我們沒有見過魯迅，也沒有與他生活在同一時代，但是，我們讀魯迅的著作，看魯迅的照片，通過他人關於魯迅的回憶、研究、闡釋……慢慢地，魯迅在我們的心裏活了起來，他經常在我們的念想、議論之中。也許我們心中認定的那個魯迅，與真實的魯迅毫無關係，與魯迅親友們的回憶中的魯迅也沒有關係，只是我們由己

推人的模糊想像而已，但是魯迅的生命信息依然是存在的。賈植芳先生也沒有見過魯迅，但他可以通過魯迅親炙者胡風、馮雪峰，以及那個時代的信息，感受到魯迅在他心裏復活。即便如孔丘、嬴政之流，只要他們的名字、思想、事跡還在我們的關注之中，他們的生命信息還是會存在於當代。這是生命所依存的第三層：它是依附於某些物質媒介傳達到後世的一種信息，儘管這種信息可能是極其模糊的，但也可能因一人千形愈加豐富了。逝者的生命信息穿越時空，只要與另一個活着的生命相逢就有可能被激活，那是屬精神的層面。有時候，當我們走過墓園，望着無數墓碑上的名字、照片、碑文，我們會感受到某種生命信息的存在，精神的不朽是存在的。

由此想起古人所說的「三不朽」。我以前在紀念先生的文章裏分析過「三不朽」，那時候我僅僅是從一個人生前如何立德、立功、立言的關係上來認識，以為立德在於社會行為的表率性，立功在於崗位上的業績，而立言僅僅是前兩者的「註釋」。但是當我把思考轉向一個人死後的生命依託時，「不朽」的意義才真正地從三個層面顯現出來——人活着的時候，生命價值通過人生行為（尤其是崗位上的工作）所達到的業績來體現，是為「立功」（即「不朽」之基礎）；人在去世後，其生命依然保存在他人的記憶、思念中，是為「立德」（即「不朽」之可能）；而時過境遷，後世人仍然從閱讀逝者著作、感受逝者事跡中獲得鼓舞，其生命信息依然與後世的無數生命相逢、交流和溝通，產生出模模糊糊但又極有啟迪的效應，那是「立言」。立言是立功、立德的延伸，可以延續到不可知的未來世界，完成生命價值的最終「不朽」。而且，立言可以是生命主體之「言」，也可以是他人、後世的人們對逝者的生命信息之

所「言」。「立言」是一種集體性的行為，其容納的生命信息愈多，延續的時間也愈長，總體的生命能量會超過個體的生命信息，逝者的名字就成為一種集體性的符號。

我原先打算在賈植芳先生五周年忌日寫一篇先生對我教誨的文章，但不知為什麼，一敲鍵盤竟扯上生命不死的話題，也許，撇開這個詞含有「長生不死」的庸俗性，從純粹精神層面來說，它還包含了生命信息從一個生命傳遞到另一生命的無限性，世界上沒有永不腐朽的有機體生命，但是生命的繁殖本能抗衡了腐朽的宿命，生命不僅繁衍，而且在繁衍中延續、進化和變異，這種「傳」的意義便是不朽；精神現象也是一樣。世界上沒有一種精神理想會永遠不過時、不腐朽，只有當精神理想被後世不斷地闡釋修正，並在實踐中繼承發揚，才會成為一種精神傳統得以保存。我是 1977 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幸運者，但是我經常在想，假如我當時沒有考入復旦大學，也許我在以後的 30 年裏有很多種人生道路可以嘗試，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假如我當年沒有在中文系資料室遇到賈植芳教授，而是跟隨了別的導師，那我走的可能是不同的道路。一切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傳統還是制約個體生命的選擇。

記得在先生 90 誕辰的時候，復旦中文系辦過一個祝壽會，會上章培恆先生說了一段話，至今記憶猶新。章先生一口紹興話，「這個、這個」口音很重，現在根據他發言的整理稿，是這樣說的：「我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面，如果說能夠有一點成績的話，那麼跟我的古代文學的兩位老師蔣天樞先生和朱東潤先生的教導固然是分不開的，跟賈先生的教導同樣也是分不開的。賈先生所教給我的當然不是具體的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方法和路徑，他教給我的，是體現

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裏面，同時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非常需要的。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種指導，我當然還會做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但是跟現在的情況可能會很不一樣。——而這一種很不一樣在我來看並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應該說，正是我所害怕的。」這段話出自章培恆先生的內心所感，我禁不住想進一步深究，章先生感到害怕的、因為有了賈先生這位名師才得以避免的，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狀態？章先生接着說下去：「我在古代文學研究裏面，有人說我的功夫都是邪派武功——就是武俠小說裏面的邪派武功。換句話說，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裏面並不是正宗的，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正宗，實在是我很喜歡的，而這個不正宗也就是從賈先生的方法和路徑裏面所學到的。所以我想，賈先生對我的影響是一輩子的，既在做人方面，也在做學問方面。」我體會這段話裏兩個關鍵詞：一個是「不正宗」，另一個是「做人」。而那種「不正宗」的做學問的方法和路徑，恰恰是章先生為人所喜歡的，因為體現了他的人格的魅力；而所謂「正宗」的做學問的方法和路徑，是在當下教育體制內大多數人都在平平穩穩走着的治學道路，卻是章先生非但不為，反而感到「害怕」的。這就是做學問和做人結合起來的一種研究方法和路徑。那麼，賈先生到底教給了章先生什麼獨門秘籍？把這位學生時期就加入了中共地下黨、1950年代初院系調整後身為學生就擔任了復旦中文系第一任黨支部書記、後來成長為名重士林的古代文學專家——章培恆先生，變成了「邪派武功」的「高手」？章先生的學問之大之深，非我所能議論，章先生生前最後一本大書即他領銜完成的《中國文學史新著》（第二版增訂本），是耗盡他最後心血的一部新意迭出的文學史，在這部「新著」裏，他力圖再現人性發展與文學發展的同步歷史，強調文學內容的演進是通過文學形

式的演進而體現出來的，並且站在「五四」新文學的現代立場上重新審視、挑剔古代文學的精華與糟粕，批判了儒家正宗的倫理學說如何壓抑人性的自由表達，而又大力推舉人性如何衝破各種清規戒律，通過了「不正宗」的文學形式曲折地表達了覺醒的信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宗的主流文學史以文學反映社會矛盾為標準，而這部被稱為「石破天驚」的「新著」則高標人性的自由、感情的強烈為判斷文學是否優秀的標準，突破古代文學史研究領域的瓶頸，完成了「重寫文學史」的嘗試。我想，章先生要說的「正宗」與「不正宗」，大約就是指這些在文學史研究領域裏對主流的學術定論的大膽突破，另標新幟，在學術研究中體現出強烈的人性的力量。這種深得「五四」新文學的核心力量——從人性的視角來反觀古代文學研究，是章先生與主流學派的分界線，而這種特立獨行、反叛的批判精神，也許正是賈先生傳授給章先生最重要的人格的力量。

我們可以再看看賈先生的另外兩位弟子，他們都是研究現代文學的專家，一位是曾華鵬教授，一位是范伯群教授，他們都是復旦大學 1955 年屆的畢業生，那一年他們的老師因胡風冤案而罹難入獄，學生也受到牽連。但是他們兩人在艱難的環境中堅持合作研究現代文學，從作家論開始，在「雙百方針」臨近尾聲的 1957 年，竟然在《人民文學》發表了那個時候最有分量、也是「石破天驚」的《郁達夫論》，這篇專論與曾、范兩位前輩後來合著的一系列現代作家論著作，構成了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一道很特殊的「風景」。我在一篇文章裏說過這件事：「由於 1955 年政治風雲的摧殘，賈先生過早地被中斷了學術生涯，但是他的教學思想卻有他的學生繼

承和發揚，並在實踐中融化在現代作家論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義文學史理論中，作家被經典化的過程是嚴格經過政治意識形態的過濾而確立起來的，所謂魯、郭、茅、巴、老、曹加趙樹理（早期還加上瞿秋白）的作家排名模式，就是典型的例證。但是賈植芳先生卻給學生提供了另一個作家譜系，我聽說，當時賈先生為四位學生佈置了作家論的作業，要求他們每人寫一本作家研究的專著，並且聯繫了出版社，準備一起推出。被指定的四本作家論，據說是《冰心論》、《郁達夫論》、《王魯彥論》和《朱自清論》。我們可以從這兩個不同的作家譜系的比較看出，賈植芳先生更加重視的是一些在文學史上有創作實績的自由作家，而不是按照新民主主義革命地位的重要性來排名的經典模式。尤其可貴的是，王魯彥作為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曾經一度受到胡風等左翼作家的輕視和誤解。王魯彥英年早逝，已經無力再站出來為自己辯護，而作為胡風朋友的賈植芳先生卻一點也沒有受到自己朋友的影響，他毫不掩飾自己對魯彥鄉土小說的喜愛和重視，指導學生去研究魯彥，宣傳魯彥。假設一下，如果沒有 1955 年那場殘酷的文字獄，在 1950 年代中期學術界將整整齐齊地推出四種由年輕人書寫的有學術分量的現代作家論，將是給學術界帶來多大驚喜的收穫！」這種局面在當時雖然沒有出現，但經過兩位學者在逆境中的努力，終於在 1980 年代，他們的作家論、魯迅研究等著作噴薄而出，成為學術界一對引人矚目的「雙打冠軍」。進而，范伯群先生在年近七十時，被退休後獨自漂泊到復旦大學，在章培恆先生主持的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另闢蹊徑，展開了現代通俗文學的系統研究，終於在八十高齡的時候，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學術界的高度關注。他的學術

成果對於正宗的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思路、框架結構及其內涵，都產生了巨大的解構意義。這又是一種「重寫文學史」的實踐。

我不是故意把學生的學術成就完全歸功於老師。事實上，作為教師的賈植芳先生因為罹難而無法完成對學生學業上的完整指導，但是他慧眼識英才，把優秀學生的才華充分調整到了一個火山口，接下來就讓它自然地噴發了。而通往這個火山口的途徑，恰恰不是具體的學術方法，而是將自己置身於現代文學的傳統之流努力探索奮進的知識分子立場和精神，這種立場就是讓自己從正宗的、主流的傳統規範中走出來，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重新來審定自己的研究對象。因此，賈先生的做人道德和作文風格，都不是四平八穩、唯唯諾諾、在集體主義的傳統中把自己深深地埋藏起來的，而是相反，他的為人和文字裏處處能夠看得到傲骨在格崩崩地發出聲響。在做人方面，他在漫長的人生歲月裏相繼成為民國政府、日本憲兵隊及共和國的囚犯；在文學方面，他學習魯迅、追隨胡風、崇拜尼采、服膺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契訶夫，至死不渝。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尚未深入，知識分子在待人接物上還有許多顧慮。有一家刊物找人寫一篇台灣詩人覃子豪的小傳，找到了詩人當年的詩友賈芝先生，賈芝先生又把這個任務轉交給賈植芳先生，植芳先生寫了以後，文章轉送到刊物編輯部，編輯誤以為是賈芝先生寫的，最後送到主編手裏，那主編是賈氏兄弟的朋友，他一看就說，這篇稿子不像是賈芝風格，倒是像賈植芳的風格。顯然那位主編太熟悉賈先生的風格了，文字背後總是有一種桀驁不馴的人格力量。這種力量，在正宗的主流傳統看來只能說是「邪派武功」了。

從大的方面來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本身就是一場先鋒文學運動，是對兩千年來佔統治地位的儒學傳統進行比較徹底的批判和清算，進而形成了以西學（後來又具體為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新文化運動，與現代性的世界潮流接上了軌道。今天的人們已經很難理解當時新文學運動對傳統所採取的決絕的決裂態度，如魯迅，曾經公開號召青年人要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這個話，現在用在哪兒都會遭到恥笑，但是只要上網看一看，在 21 世紀已經過了 13 年，離《新青年》創辦（1915 年）已近百年的今天，竟然還有人鼓勵學生着古衣冠行跪拜禮，據說這樣可以對抗全球化及世風日下的社會，那你不難理解當年先驅們要反傳統所面臨的艱難和絕望了。傳統的生命就是要在自我的內在裂變中發展延續的，在這個意義上，20 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那場先鋒文學運動，正是擔當了正宗傳統的「邪派武功」，成為它的批判者和重寫者。而魯迅的精神，正是這場先鋒文藝運動的核心力量。

植芳先生對魯迅的仰慕是發自內心的，他與胡風的交往，緣於他對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傳統的傾心與嚮往。1937 年初，21 歲的賈植芳先生在東京留學，他在書店裏發現了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的頭兩輯，從它的編輯風格、撰稿人員陣容中，他驚喜地發現，「這是一個堅持和發揚魯迅的戰鬥文學傳統的嚴肅文學刊物。」他憑直覺認定，魯迅的生命在這個刊物裏復活了。於是就向刊物投稿，他不知道這個刊物的實際主編是胡風，也不認識胡風，僅僅是出於對心中認定的魯迅的信任，他就積極向胡風主編的刊物投稿，逐漸走上了文學創造的道路，成為文學史上稱作「七月派」作家的一員。顯然，賈植芳先生成為胡風的密友，最

初是出於對魯迅的認同，而胡風作為魯迅親炙的弟子，也一定會向植芳先生講述他心中的魯迅，於是，魯迅的生命再度、三度地復活於他們之間愈來愈深厚的友誼之中。但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政治黨派鬥爭中，魯迅是被捲進去了，隨着中共黨內的權威們不斷地關注魯迅、利用魯迅和詮釋魯迅，魯迅在左翼政治派系中的地位愈來愈高，成了代表某種政治力量的符號。而在這個被符號化的過程中，胡風又漸漸地被邊緣化，尤其是 1942 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到重慶以後，胡風的文藝思想和文藝理論，差不多也成了不正宗的「邪派武功」了。

「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一脈相傳，差不多有了近百年的歷史。到時候自然會有很多正宗、主流的權威出來寫紀念文章，四平八穩，中規中矩，長江後浪推前浪。而一部百年歷史對我來說，要記住的是：反叛者秋瑾女士犧牲於 1907 年 7 月 15 日，魯迅先生去世於 1936 年 10 月 19 日，胡風先生去世於 1985 年 6 月 8 日，賈植芳先生去世於 2008 年 4 月 24 日，章培恆先生去世於 2011 年 6 月 7 日，曾華鵬先生去世於 2013 年 1 月 27 日。這是一部文學史還是學術史？思想史？生命史？這並不重要，但是它在偏得中承傳知識分子的理想火種，在「不正宗」的艱難道路上磨煉人格，在一代一代的犧牲與傳承中獲得永生。

2013 年 7 月 2 日於魚焦了齋

章培恆先生



章培恆先生久病，今晨撒手。從醫院回到家已經凌晨，我卻毫無睡意，回想着先生彌留的一幕。手機裏有沈善增兄的短信，他說，昨天是芒種，拖到今天子時也許有轉機，現在看來還是不行。我知道章先生已拖過了零點，當時北京大學安平秋教授與另外三位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員會人員正乘飛機趕往上海，安教授獲知章先生病危，立即買了當夜 9 時的機票，沒想到這麼晚的飛機還是誤點，11 時，負責搶救病人的醫生說，大約還能拖一個小時。過了 12 時，病人艱難地喘息、掙扎，12 時 22 分，安教授匆匆趕到，頭髮被汗水沾濕了，趴在病人耳邊連連叫喚「培公」，就在這一分鐘，章先生停止了呼吸。這 22 分鐘，顯然是等待着他情重如山的朋友。我在燈下擬了一幅輓聯：

會稽性格，幾代學人，新松惡竹分明愛憎，從無奴顏和媚骨；
修水華章，再傳子弟，文史古今如此貫通，畢生心血付知行。

這兩句話包含了我對章先生的理解，不知道對與不對。章先生是紹興人，魯迅先生的同鄉，紹興人不僅僅有豪飲的傳統，更重要的是性格硬朗，不奴不媚，魯迅先生引明代王思任的話說，會稽乃

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污納垢之地。這個評價未必很準確，但用在章先生的性格裏是不錯的。報仇雪恥不過是一種借喻，這種性格表現出來的實質，恰恰是狹隘動機的「報仇雪恥」的反面，是一種以天下是非為一己是非的大愛憎、大襟懷，也未必唯紹興人才有這種品質，如湖北人胡風先生及山西人賈植芳先生，他們身上都具有這種嫉惡如仇、不屈不饒的凜然風骨。章先生是賈先生的學生，又是入黨較早、1950年代初擔任了復旦大學的中文系黨支部書記，1955年反胡風運動開始，他先寫了文章反駁批判胡風的論點，後來因為賈先生的冤案而受牽連，由此開始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世紀90年代，顧頡剛先生的日記出版，顧先生生前與魯迅有宿怨，有人利用這個機會重提舊事，為之辯護而攻擊魯迅，當時學術界也有一股貶低魯迅的思潮，似乎凡被魯迅罵過的人都在做翻案文章，我不知道當時魯迅研究界有沒有人站出來說話，而章先生挺身而出寫了長長的文章為魯迅辯護，語詞非常潑辣。我印象中，章先生的個性裏愛憎極為分明，就如杜甫詩中所說，「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樣的性格在一個鄉願之風盛行的時代裏可能會引起誤解，但從大是大非上看，我還是要忍不住說，這是我們這個缺鈣時代中難能可貴的性格，代表了知識分子的良知。

章先生在1955年因賈植芳先生的牽連而被開除黨籍、剝奪了教書的權利，蔣天樞先生收他為助理，指導他從經籍開始一步一步地讀書，章先生由此打下了扎實的學術基礎。這在章先生寫的《我跟隨蔣先生讀書》裏也有記載。蔣先生也是一個風骨朗朗的學人，他受業於清華國學院，對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有繼承。但我這裏要強調的是章先生從一個少年布爾什維克轉型成為古今貫通的學

者，蔣先生對他的影響不可忽視。1979年章先生作為「文革」後第一個去日本神戶大學任教的中國學者，人品學養在日本學界引起轟動。我聽過這樣一個故事，神戶大學的一位日本漢學家，每次聚在一起喝酒時，就對着章先生講《說文解字》，大有中國無人的意思。有次章先生借着酒意一口氣背誦了《說文解字》有關內容，那日本人不講《說文》，改講《爾雅》了，章先生又忍不住背誦了《爾雅》的數段內容，那位漢學家從此不復妄談中國學了。中國人在國際體育比賽中進一個球就大驚小怪，以為張揚了國威，而這樣的國學論壇的舌戰，倒不怎麼關注。我當年聽章先生這個故事也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場合，大約是我們新教師培訓，老學者要求我們多讀書多背書，夯實學術基礎時隨便引援的例子而已。章先生專攻古典文學，尤其在明清文學史領域有過重要的學術建樹，他是自覺地站在現代知識分子的立場上研究古典文學的，他的古代文學史研究特別有血有肉，甚至讓人感到鮮血淋淋。《中國文學史新著》中有關明代政治與文學的關係的相關段落，我讀之頓覺毛骨悚然，與一般冷漠地搬弄知識梳理教條的文學史教材有天壤之別。後來我把這種閱讀感覺告訴章先生，他很認真地說，他寫的時候也有這種感覺。正是這種現代人的襟懷，章先生的學術視野超出了自己所攻專業的視界，貫通了古今中外。在此基礎上，章先生開創了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博士點，並在此基礎上主編了以人性為核心的《中國文學史新著》。

復旦大學中文系是個有深厚根底的學術重鎮。賈植芳先生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學戰鬥傳統，給學生時期的章先生帶來了積極的社會責任感和現代知識分子的視野；蔣天樞先生所代表的國學主流

傳統，又把青年教師的章先生引入了學術的殿堂。我以為這兩種精神傳統構成了章先生作為知識分子的內在素質和特徵，兩者缺一不可。章先生有別於一般僅在書齋裏白首窮經的學者，有別於一般專業型的專家，他具有自覺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眼光，有傳統知識分子的深厚學養，也有「五四」以來現代知識分子的進取精神，所以他深深地吸引了復旦的學子。在我們的求學年代和「青椒」時期，章先生一直是我們的偶像，也是復旦大學裏一個被公開仰慕和悄悄流傳的神話。可以這麼說，復旦精神培育和塑造了章先生，章先生也成了復旦的驕傲。

我還想說一點我個人對章先生的感激。在我讀書的年代，章先生是復旦校園裏的一個明星，他剛剛從日本訪學回來，穿了筆挺的西裝、雪白的襯衣、配了醒目的領帶走進教室上古代文學的課程，他獨自在一學期開設四門課，一口紹興官話竟把枯燥的學問講得生動有趣，學生們聽得如痴如醉。有一年，他與外文系的夏仲翼先生聯袂開設中外文學比較的課程，兩大名家的同時站台，一段外國文學一段中國文學，邊講授邊討論，轟動了復旦校園。我去旁聽過一次，他們對談中國為什麼缺乏史詩，教室裏坐滿了學生，我實在擠進不去，就站在走廊的窗口邊上聽了兩節課。後來章先生主持中文系的工作，那正是撥亂反正時期，他不怕得罪人，堅決把一些教師調出復旦，有意識地留下或者引進了許多青年人才。為了培養青年教師，他特意為每個老教授配一個青年教師做助手，要求青年教師跟隨老教授近距離地學習。在他的努力下，中文系漸漸清除了「文革」時期留下的各種壞風氣並樹立了學術正氣，開始走上正軌。那個時期我與章先生接觸並不多，但我親身感受到他的工作改變了中

文系的風氣，而我正是在這種氛圍裏成長的。章先生的作為曾經引起過不少爭議，他的工作始終貫穿了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之光，抵制了社會上流行的市儈風氣，為復旦中文學科打下了發展的基石。

後來，章先生離開了中文系，擔任古籍所所長，又擔任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他是受了多少委屈離開中文系的，我不太清楚，我那時只是一個憤青，只知道批評各種不如意的現象，發發牢騷，並不關心中文系的工作。但我知道章先生雖然離開了中文系，卻從來沒有放棄對中文系的關注和熱愛。後來我自己也糊里糊塗地接下了矛盾重重的中文系主任之職，當時我很猶豫，章先生憂心忡忡地對我說：「依我看，全國的中文系這些年來都退步得厲害，你去當系主任要盡量讓復旦中文系退步得慢一些，就好了。」這句話，我一直牢牢記着，戰戰兢兢地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做事。幾年後，裘錫圭先生的古文字團隊加盟復旦，章先生高興地對我說：「前幾年我說中文系退步厲害，現在好了，可能還會稍微上升一點。」說明他是很認真地對我說這番話的。事實上，章先生直接指導了我許多工作，直接造福於復旦的中文學科建設。這些說來話長，暫時停住吧，以後我還可以繼續寫我心中的章先生。

二

七日凌晨，我從華山醫院回到家裏，毫無睡意，在燈下寫了《章培恆先生》的紀念文章，寫到 3,000 字左右自覺體力不濟，就停住了，但心中還有話在翻騰，於是，再寫下去吧，我要繼續談談章先生對復旦中文學科的關懷。

章先生是在中文系主任的任上組建古籍所。這期間陸樹命老師意外車禍身亡，陸老師本來是協助章先生組建古籍所的合適人選，他去世後，章先生肩上的壓力更重。那時發生很多人事糾紛，但我平時不關心這些事，只記得 1985 年，有一天章先生召開全系大會，宣佈古籍所成立，並且宣佈，凡到古籍所工作的成員不再兼任中文系的工作，於是，他辭去中文系主任的職務，擔任了古籍所所長。

這以後，中文系與古籍所兩家單位來往不多，但是章先生對賈植芳先生非常好，古籍所有一些重要的活動，都會邀請賈先生參加，在賈先生府上，也經常看到章先生的身影。我那時住在市區，平時很少去學校，上完課總是直接去賈先生家裏坐坐，所以，到先生家裏去的次數可能比去中文系多，換句話說，與章先生接觸的機會，也許比與中文系老師接觸的機會更加多。最記得有一次，古籍所同事在賈先生家的客廳裏大擺品酒會，13 種名酒一字排開（好像獨缺了五糧液），任你喝個暢快。章先生的好酒量，我也是在那次品酒會上見識的。不過，我總覺得章先生在那個時候情緒裏有些苦悶，尤其是在 1990 年以後，他喝酒也開始漸漸有醉的時候，這樣一晃就有很多年過去了。

我在 2001 年開始勉為其難地擔任了中文系主任。當時工作上存在着很多矛盾，我毫無經驗。那個時候章先生就對我說了我在前一節引過的那句話，那句話以後，他還說了這麼一種意思：「你要讓中文系不繼續退步下去，就必須大力提攜年輕人，但是你對年輕教師提攜多了，就會得罪其他的人，因為利益就這麼一點點。這是你要有思想準備的。」他接下去還說了他當年做系主任的教訓，他

說當時反對他的人都說他討好年輕人，但是，如果系主任只顧擺眼前的矛盾，就不利於未來的發展。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我一向知道章先生對自己學生的提攜關愛是出了名的，但我沒有想到，他對中文系青年教師也是那麼徹心徹肺地關心。我可以舉一個現成的例子。中文系邵毅平老師是蔣天樞先生的學生，不僅精通古代文學，還精通日本與韓國的語言和文學，邵老師調入中文系，章先生直接與我說，全國古代文學最缺的是先秦文學，邵老師在這方面多受蔣先生的指點，應該鼓勵他發揮這方面的作用。於是我把邵老師安排在古代文學教研組。過了幾年，章先生又對我說，他發現中文系比較文學整體情況比較弱，而邵老師近年著作的興趣似乎在東亞文學的比較研究，可以讓他發揮這方面的作用。於是，我徵得邵老師同意後請他去比較文學教研組，果然邵老師成為獨當一面的東亞文學比較研究專家。這些事邵老師原來都不知情，是我事後告訴他的，說明章先生一直在關注着邵老師的工作和著作情況。

後來，我愈來愈感受到，章先生的心從來沒有離開過中文系，他的愛愈深，期望愈切，有一種古道熱腸的俠義情懷。我們充分尊重他這份拳拳之心，才能獲得他滿腔熱情的支持。在中文系迎來裘錫圭先生團隊和其他一系列引進工作中，他都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引進劉曉南教授的過程中，他完全從支持中文語言學科建設的角度出發，同意邀請劉教授到古籍所去工作，為復旦語言學引進了古代音韻學方面的重要人才。當王水照先生年滿 65 歲時，也是章先生及時提醒我說，以前學校有傑出教授制度，對有重要學術貢獻的人文學者採用不退休制度，他讓我去找學校領導，能否讓王水照教授獲得同樣的待遇。他還明確地說，現在裘先生的引進為

我們重新開了一個口子，我們去做做看。我馬上彙報了學校領導，學校領導採納了這個建議，在人事方面啟動了資深教授機制，為復旦人文學科保住了一批重要的領軍人物。章培恆先生、裘錫圭先生、王水照先生，後來我們又引進了著名比較文學專家張漢良先生等，這個高齡學術群是復旦中文各大學科的煌煌泰山，他們崇高的學術聲望及至今還在研究發展的學術成果，保障了復旦中文學科的前沿地位。現在章先生離我而去，我再也得不到他的指導，但先生的睿智和深謀遠慮，將成為復旦人文學科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影響長遠。

復旦中文學科是由四家機構聯合組成：中文系、語文所、古籍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這四家機構，中文系歷史悠久，去年剛過八五大慶；語文所由國家教委批准建立於1981年，是由1950年代建立的語言研究室（陳望道先生領銜）和中國文學研究室（郭紹虞先生領銜）合併而成（最初由王運熙先生領銜）；古籍所正式建立於1985年（章培恆先生領銜）；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錫圭先生領銜）建立於2005年。百年校慶的時候，中文系正好建系80周年，我提出了用「中文學科」這個概念涵蓋中文系等四家學術機構，共同發展中文一級學科的建議，章先生欣然接受，他領導的古籍所參與了中文學科的所有活動，並且為中文系80周年的紀念冊作序，王水照先生在慶典會上作了復旦中文學科由「三足鼎立」到「四維並舉」的闡述，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枝節矛盾都化為春風，復旦中文學科進入了「風調雨順、蒸蒸日上」的發展階段。

三

2011年7月10日，為章先生忌日五七，9日，復旦大學舉辦先生學術思想紀念會，特獻詩一首，寄託哀思：

常記先生豪興至，攜來洋酒續尖莊。¹
千杯不醉朦朧眼，萬卷難容錦綉章。
昔有奇冤連十族，²今無酣墨動高唐。³
獻疑梨棗長生殿，⁴文史新編日月光。⁵

第一部分寫於2011年6月7日

第二部分寫於2011年6月8日

第三部分寫於2011年7月10日

-
1. 尖莊，即尖莊酒，1980年代四川出產的一種普通白酒。章先生寫過一篇題為《武俠小說與尖莊白酒》的文章（原載《新民晚報》，1990年10月31日）。先生善飲，中年時喜歡一場接一場喝不同的酒。
 2. 章先生是賈植芳先生的學生，1955年賈先生因為胡風冤案牽連入獄，章先生與胡風無關，僅因為與賈先生的師生關係，被開除黨籍，一度剝奪了教師資格。
 3. 章先生在1960年代初曾發表批評晚清譴責小說的論文，如《論李伯元作品的思想傾向》（原載《光明日報》，1965年6月6日）、《關於李伯元作品評價的幾個問題》（原載《光明日報》，1966年3月13日）等，批判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相傳曾受到毛澤東的關注和讚揚。
 4. 章先生有著作《獻疑集》、《災棗集》和《洪升年譜》。
 5. 章先生晚年最主要的工作是不斷修編《中國文學史》，並且在學術領域開創了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學科方向。

朱東潤先生

我進大學那一年，朱東潤先生已經 82 歲，還擔任着中文系的系主任。時間過得真快，記得第一次走到學校大門前，眼睛望着「復旦大學」四個毛體字，心裏不由得「格登」跳了一下。像是為了壯膽，我很記住自己邁入學校大門的那一刻心境。從這以後，我的生命旅程就一直走在復旦校園裏，平靜如水上課、下課……一晃竟 18 年過去，朱東潤先生今年是百歲誕辰了。

朱先生活着的時候，是中文系的靈魂；他死了，一股凜然正氣依然彌散在中文系的教師中間。現在 60 歲左右的一代，50 歲左右的一代，凡懷念中文系的舊歲月時，總會情不自禁地說：朱先生那個時候……就好像朱先生代表了一個時代，他的名字與中文系的某段歷史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在我進大學的時候，系裏七八十歲的老教授還有十多位，但是大多都不上課，像國寶似的，一般秘不示人。朱先生則不同，那時他還擔任了系主任的工作，比較容易見到。校慶 73 周年的時候，他還親自作學術報告，講梅堯臣的詩，講着講着，不知怎麼批評起郭沫若。旁邊有人悄悄告訴我，在 1950 年代初期，朱先生曾懷疑屈原實無其人，《離騷》是後人偽託的，結果被自比屈原的郭沫若狠狠批了一頓，所以至今不忘。事後我去查郭沫若的文章，果然有「資產階級怪教授」的說法，指的就是朱先生。

在我的記憶裏，朱先生不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他總是一本正經。我們做學生時，對他有點敬而遠之。那時中文系學生喜歡搞創作，常常缺課躲在寢室裏寫小說，朱先生知道後，跑到學生宿舍來與我們談話。他板着臉說話，大家縮着頭聽，他講了很多，大致的意思有兩點：一是中文系學生不要急着搞創作，更不要忙着給報刊雜誌寫文章，這些都不算成績的，做學生就應該老老實實讀書，打好基礎；二是中文系學生也要學好外語，否則不管什麼學問都做不好，做不大。說完，一個人，拿着一個手電，蹣跚地走了。他不要同學們送他，更不要別人攙扶他，我們送他到學生宿舍門口，望着他一個人消失在黑夜裏。現在想起來，他說的兩點意見真是金玉良言，可惜那時的學生，一個個大才子似的心比天高，能聽得進去的人實在很少。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朱先生是來講他寫人物傳記的創作體會，氣氛一定會熱烈得多。

朱先生早年在英國留學，聽說在武漢大學教書時，有些研究古代文學的老學究們瞧不起他，以為留洋學生不懂中國文化。他那時講中國文學批評史，故意用文言文編了一本講義，後來出版了，還是用的文言文。但他寫的人物傳記卻很有現代精神，特別是《張居正大傳》，直到前兩年，國內還有出版社在翻印這本書。朱先生對這部傳記也很自負，聽 1960 年代的學生說，朱先生那時做學術報告，講人物傳記，自認為世界上只有三部傳記是值得讀的：第一部是英國的《約翰遜傳》，第二部是法國的《貝多芬傳》，第三部就是中國的「拙作」《張居正大傳》。我雖沒有親耳聽朱先生這樣說過，但我相信他是會這麼說的，說實話，我很佩服這樣的學者，做學問本來就應該有這種與世界平等對話的自信。不像現在，中國的學者

研究中國學術問題，偏要從外國人或者跑到外國去的中國人那兒找理論依據。

朱先生是個儒家，研究學問和平時為人一樣，很講究入世。他寫的人物傳記，有張居正、梅堯臣、杜甫、陸游、陳子龍……一個個出將入相，忠肝義膽，都是錚錚鐵骨之輩。後來我讀他的遺著《李方舟傳》，裏面寫到自己的身世，倒也是很平常的一個書生。我猜想他年輕時一定有許多抱負，可惜知識分子的「廟堂」已經崩潰，他只能在自己的學術崗位上，做着經國濟世的夢。1960年代曾有出版社請他寫蘇東坡的傳記，他倒也認真地研究了一番，結果還是回絕了，理由是他不喜歡蘇東坡遊戲人生的世界觀。其實蘇東坡一生坎坷，又滿肚皮的不合時宜，若是不學點老莊人生觀，早就生癩死掉了，等不到他的政敵把他送到海南島。還有一件事也頗說明朱先生的個性。有一次在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學會上，朱先生講治學之道，講到了陳寅恪，朱先生說，寅恪先生學問雖然好，但晚年花了那麼多精力研究一個妓女，大可不必！這話惹翻了中文系的另一位名教授、陳寅恪先生的弟子蔣天樞先生，蔣先生竟當場拂袖而去，朱先生也氣得臉色發白。這件事後來傳出去，成為讚歎陳門弟子護師尊師的佳話，但朱先生的道德文章，也由此可見一斑。

我原先也沒有想到，一生為民族脊梁立傳的朱先生，最後一部傳記竟是寫他夫人的。我沒有見過朱夫人，聽說是個賢惠的家庭婦女，「文化大革命」中因朱先生的牽連而被批鬥，被強迫掃地，她忍受不了侮辱自殺了。朱先生前半生流離顛沛，與夫人離多聚少，後半生在復旦定居，才過了幾年的安定日子，不料又生出如此慘劇。那時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漫漫長夜裏，他不顧白天

被批鬥、被強迫勞動帶來的身心疲憊，偷偷地寫下了他夫人平凡而動人的一生。可惜這部《李方舟傳》在朱先生生前沒有出版。十多年前，一次校園裏遇見朱先生的高足陳尚君兄，他隨口告訴我，朱先生有一部傳記，是寫他夫人的，至今還鎖在抽屜裏。當時言者無心，聽者也無心，事情就過去了。直到去年我為上海遠東出版社策劃《火鳳凰文庫》時，突然記起了這件事，忙去找着朱先生的孫女朱邦薇小姐詢問，果然有這部書稿。現在，在朱小姐的支持下，《李方舟傳》終於問世。因為這部書稿是在沒有自由的歲月裏寫的，老人沒有寫到「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傳記的最後一章，寫他70歲生日那天，老夫婦同遊南翔鎮，無意中聽到一首騷體悲歌如天音般傳來，夫人聽了潸然淚下，預示了山雨欲來，恰似金本《水滸》裏「梁山泊英雄驚噩夢」的味道。

在讀這部書稿時，不知怎的，我想起蘇東坡「十年生死兩茫茫」的詞來，已經淡忘了的朱先生的形象慢慢地浮現在眼前。原先以為朱先生的凜然不可親近的感覺，現在消失得乾乾淨淨，倒分明覺得是一個面帶愁容、滿腹隱憂的老人，被知識分子傳統的入世精神驅趕着，吃力地跟着時代跑，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似乎也有着蘇東坡式的陰魂。這是他不願見到，更不願承認的。又聽說「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批鬥朱先生，朱先生不服罪，頭顱始終揚得高高的，所以紅衛兵貼出大標語，要「打斷朱東潤的反革命傲骨」。這遭遇使朱先生後來獲得人們普遍的尊敬。可是我現在才想到，在朱先生的身上，一根正氣凜然的「傲骨」顯而易見，還有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暗暗地支持着他的傲骨，唯有這兩者的結合，才更像朱東潤先生的真實面目。

關於朱先生，還有許多故事，我不想說下去了。我想起古人的一句話，正適合朱先生的一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1996 年 3 月 9 日寫於日本早稻田大學

楚狂陳子展

我要寫寫陳子展老人，這個想法似乎來自一種本能的衝動，一種對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狂狷」性格的迷醉，雖然這位老人已經去世兩年多，現在少有人再提起這個名字；雖然我與老人的緣分很淺，同住復旦校園十多個春秋，真正見上面的機會不過才四五次。恐怕老人到生命的最後也沒有弄清楚我是誰。

然而子展教授依然是我在復旦校園裏最敬仰的老人之一。這種敬仰，不完全是因為老人的學問、道德、聲望，以及一系列顯赫的人生履歷——光憑這些，老人自然也有足夠的資格令人敬重，但我覺得子展教授真正的魅力在於他那古怪的性格，或可說是一種稱得上「狂狷」的個性。這種性格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裏曾經有過悠長的歷史，現在的知識分子也有自我標榜「狂」的，那不過是自鳴清高，孤芳自賞，未免被人譏之為「酸」；或是佯作狂人，目空一切，到底還是一種薄相。然而子展老人的「狂狷」有着原汁原味。他的存在就是一個神話。記得有一次聽賈植芳教授聊天，賈先生人海沉浮，各色各樣的性格無不見識，不知怎的說起一位著名老教授曾自稱是「狂狷之士」，賈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他算什麼狂狷」，於是又講了一連串聽聽好笑、想想心酸的現代掌故。突然間先生換了一種口氣說：「要說狂狷，復旦還真有呢，陳子展先生才是一個狂狷之士。」這是我第一次明白，「狂狷」乃大勇者才所為。

在我剛進復旦中文系唸書的時候，校園裏百廢待興，知識分子開始由「臭老九」重新上升為學術明星，一時間對名流的崇拜，與今日歌星熱、球星熱相同。那時復旦中文系群星燦爛，七八十歲的老教授有十多位，郭紹虞、朱東潤、蔣天樞、陳子展、張世祿、吳文祺、趙景深等，有的健步在校園裏誨人不倦，受人敬重；有的深居簡出，讓人感到很神秘。有關他們過去的軼事、傳聞、怪癖，以至名人名言，常常在青年教師和學生中傳來傳去，作為時髦。其中傳得較多的，大約陳子展老人算是一個。那時我們都已經知道蔣天樞教授是清華國學研究院梁任公、王靜安、陳寅恪的傳人，至今還避諱師長的名字，而陳子展教授在東南大學教育系進修時雖聽過梁啟超的課，卻向不以梁先生為然；也知道「馬日事變」時期，陳子展與徐特立、謝覺哉等人同案，被通緝懸賞的價格與毛澤東一樣。還有一些傳說，說子展教授在 1950 年代初思想改造後曾一度要調離復旦，他把自己的藏書整本整本地送給一個校門口擺攤的小商販，讓他拆了紙包花生米，而自己則準備歸隱家鄉去釣魚；又說他住上海市中心，屬蘇州河南，復旦地處市郊東北，屬蘇州河北，1957 年被打成「右派」後，他留了長長的鬍子，發誓不給他平反就不過蘇州河，云云。總之，關於老人的傳說，都是很有趣味的事，又彷彿都與「狂狷」有點關係。

記得第一次見到子展教授時感覺很平常。那時中文系還設在一座古廟似的舊樓房裏。據說這樓有着 50 年的歷史，木頭樓梯搖搖晃晃，無論怎樣瘦弱的人踏上去都會咚咚一陣亂響。然而一天，一個老人突然出現在樓梯上，四周竟是一片寂靜，學生們站得遠遠的，神秘兮兮地傳遞着消息：「這就是陳子展……」老人正與一個

中年教師說着話，操着湖南音，聲音很高，不過一句也沒聽懂他說什麼，只覺得老人個兒矮小，黑黑的臉色，高高的顴骨，若是站在街頭曬太陽，與一般退休老伯伯沒什麼兩樣，只是一雙眼睛小而有神，有一股睿智的光彩。以後又見到老人幾次，都是在賈植芳先生府上。他給我的印象很奇怪，每次他與賈先生說話時，總是連珠炮似的又說又笑，而且笑聲又特別高。可是一旦我們年輕人介入說話，他就不大發聲了，只換一雙含着笑意的眼睛看着你，再一會兒就告辭走了。一次，賈先生說起子展教授，說他多年不與學生接觸，近年才招收過一個碩士研究生，後來也沒有繼續招收，過去政治運動的經驗使他對年輕人有戒心，無形中與社會隔絕了。賈先生說到後來，又加了一句：「其實子展先生也很寂寞。」

還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年，中文系要為三個老教授做壽，並紀念他們的教學業績。這三位教授都是德高望重名滿學苑：一位是《楚辭》專家蔣天樞教授，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著名導師的弟子；一位是語言學家吳文祺教授，為《辭通》主編朱起鳳先生後人；還有一位就是陳子展老人，學術上自成一派，自稱是「不京不海不江湖」。聽說那一次高高興興的紀念活動被子展教授拒絕了，他的理由是，他只是一個普通人，既無異人傳授，也無祖傳秘方，又何必去湊這個熱鬧呢？因為是轉聽來的故事，真偽姑且不論，這種語含譏刺、落落寡合的神情，倒是把子展教授的風貌展露無遺。不過言語裏，總還有一些沉重的成分，老人的寂寞恐怕也不僅僅是對青年人的隔膜所造成的吧。

後來，《詩經直解》、《楚辭直解》相繼出版了，這是凝聚了老人十幾年學術心血的兩部大書。《詩經》與《楚辭》是中國文學的

兩大源頭，向為治學者頂禮膜拜。老人「治《詩》五寫，治《騷》三寫」，十多年來，或作或輟，自謂「一生微尚所在，初亦唯此二書」，也算得上殫精竭慮。然而，老人始終沒有把這兩部著作看得神聖不可侵犯，或者故作神秘。這兩部「直解」雖是治上古文學之經典，但老人明明白白地標出了「厚今薄古」的原則。他特意在《楚辭直解凡例十則》中引了魯迅先生當年用白話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譯作「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的話，作為他「直解」《詩》、《騷》的原則，因此，在《睢鳩》篇譯文中，出現了這樣通俗好玩的句子：「關關地唱和的睢鳩，正在大河的沙洲。幽閒深居的好閨女，是君子的好配偶。參差不齊的荇絲菜，或左或右飄流它。幽閒深居的好閨女，醒呀睡呀追求她。追求她不得，醒呀睡呀相思更切。老想啣，老想啣，翻來覆去可睡不得……」

不知這樣零零星星地寫來，是否說清了子展教授的「狂狷」。孔子說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狂狷，其實是一對對立的統一，世人向來佯狂容易，要有所不為卻難。舉世滔滔，真正的狂狷之士，就應該是這樣一個處世獨立、落落寡合的大俗人。

子展教授有很多筆名，其中「楚狂老人」和「湖南牛」最傳神。他去世時 92 歲，曾留下遺言：死後不發訃文，不登報，不舉行任何形式的追悼會，骨灰讓兒子拋到海裏去，拉倒。

寫於 1992 年 12 月 31 日晚

世界盃還沒有結束，您怎麼就走了？

——告別潘旭瀾教授

這幾天，世界盃正進入高潮，每當深夜小區裏傳來觀球者激動喊叫和吵嚷的時候，總是想起潘旭瀾先生。潘先生是個資深球迷和業餘球評家，以前聽潘先生評論足球是人生一大快事。記得上一屆世界盃期間，我曾有事想去拜訪潘先生，於是先打電話過去問候，問他最近忙些什麼，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這期間主要的工作就是看足球，他說他要在門口掛一張牌子，寫上「看球期間，恕不接待」八個字。聽着潘先生孩子般的興奮聲音，我就打消了去拜訪他的念頭。雖然我知道潘先生極喜歡長時間地聊天，但是比起看球賽來，聊天還是要退居第二；如果在這期間去找他聊天，大約只能聽他聊足球了。這次世界盃開始時，潘先生已經病了，我去醫院裏看望他，特別注意到單人病房裏放着一台電視機，我有些安慰，心想潘先生仍然可以看球賽，他在病房中生活還不至於寂寞吧。可是昨天我接到李安東發來的短消息，先生已經於7月1日凌晨去世。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想大聲地對先生說：世界盃還沒有結束，您怎麼說走就走了呢？您走得很果斷、很匆忙。

然而我的聲音並沒有留住潘先生的腳步。我眼前彷彿走過潘先生高高瘦瘦的身影，匆匆忙忙，拂過復旦園的樹叢，拂過國福路的林蔭，拂過這個給他許多傷害但也激發了他的才華的世界，頭也

不回，一個勁地走向冥冥之中。潘先生望之儼然，其實內心非常天真，他對他所走過的人生道路，有一種近似傷感的委屈。這種委屈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內心裏，甚至被包裹在表面的自尊與孤傲裏。難忘有一年，我虛度五十，八二級學生為我做生，這本來純屬意外，我面對學生的盛情，很感動地吟了兩首小詩作為答謝。過了幾天，這兩首詩刊登在《新民晚報》上，沒有想到潘先生竟讀了它。當晚他就打了電話過來，那天時間已經很晚，潘先生在電話裏講了半個多小時，他期期艾艾，曲曲折折地講述他的大半生的人生遭遇，感慨他當年也是這樣充滿着人生抱負，可惜時代沒有給他這樣的發展機會。我從來沒有聽到潘先生以這種抒情的語調談論自己的人生，我隱隱約約地感受到一個飽受委屈的老知識分子的真實精神狀態，感受到一個老人渴望交流、渴望理解的焦灼心理。那一晚我翻來覆去睡不着。從此，潘先生沙啞的聲音就定格似的反覆出現在我的耳邊。

潘先生是我在專業上的啟蒙導師。我是在「文革」後第一批考進復旦大學的學生，現代文學史的課程是潘先生主持講授的。那時潘先生也只有四十多歲，但是看上去也是這樣的乾枯蒼老，他個子高，上課喜歡用兩手撐着講台的兩邊，微微地向前傾着身子，體形搭成一個大的三角形。說一句又說一句，語調非常緩慢。潘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這也許是他在文革後第一次正規地講授現代文學史，教室裏聽講的人擠得滿滿的，不僅有學生還有中青年教師，也有外校來進修的。記得他第一句話就說，這麼多人來聽課，我有些緊張啊。可是從他的臉上浮現的自信的微笑來看，其實他一點也不緊張，穩操勝券。可是潘先生這門課並沒有講完，不知什麼

緣故，講了一學期以後，就再也沒有講授過這門課。當時我是這門課的課代表，因此與潘先生有了直接的交往。潘先生幾次與我說起我並不認識的鮑正鵠先生，他告訴我鮑先生講授現代文學課的時候，他是鮑先生的課代表，後來又成了鮑先生的工作助手。我從潘先生的話語裏感到一種人際的溫情，這也是大學裏特有的薪盡火傳的一種形式。1982年初我留系作教師，與潘先生的交往更加多了。就在那一年五月，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在海南島（當時還沒有建省）召開第二屆年會。潘先生是上海的理事，他不去參加會議，卻安排我代他去。當時我還不是這個學會的會員，他就寫了一封信給馬良春先生，說明我是代表他參加會議的，並指定要我代表他旁聽理事會。現在的青年人很難想像二十幾年前的情況，當時外出參加全國性學術會議的機會是極為難得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席高規格的學術會議，第一次見到仰慕已久的王瑤、李何林、唐弢、許杰、盧鴻基等老一輩先生，見到了本專業的許多專家名流及同輩的青年學人，有些朋友之間的友好關係就從此延續下來，二十多年也沒有變。但是更是讓我打開眼界的，還是在我回來以後。我到潘先生家裏去彙報會議情況，順便講了一些會議發言討論中我感興趣的問題。潘先生那天的興致也極好，我每講一個問題他都有插話，講述他自己的觀點。他對現代文學專業的知識廣博得驚人，所有的問題他都能引經據典，滔滔不絕地講出自己的看法，許多不很有名的詩人的詩作，他能如數家珍地背誦，在我面前第一次顯現了一個現代文學領域專家的權威風貌。潘先生當時說過他的治學方法，一是要跟蹤式地研究作家，要讀完作家的全部著述才能夠下結論。他笑着說：「我臉皮薄，如果這個作家的書還有一本沒有念過，就不敢隨便寫研究文章，怕被人提出質疑啊。」二要認真備課講課，當時

青年教師上課的工作量是八比一，即上一小時的課，算作八小時的工作量。潘先生對我說，八小時準備一節課怎麼夠？他當年是以30小時準備一節課的工作量來備課的。潘先生的這些話我都牢牢地記在心裏，並落實在我自己的研究教學工作中。我現在也經常以這樣的標準來要求我的學生和青年朋友，潘先生是我心目中的一杆標稱。

也許正是過於刻苦勞累，潘先生的身體早就受到摧殘。這也是他感到生不逢時的原因之一，正當在學術上要再展宏圖時，他明顯感到了自己的體力不支。由於他對學術的嚴謹方正和從不苟且的態度，他付出比別人多幾倍的精力去從事寫作和研究，體力的透支就更加突出。潘先生是屬1950年代培養起來的一代正直的知識分子，他關心現實，關心政治，嫉惡如仇，對於社會的進步懷有強烈的使命感。他本來飽讀現代文學，但是後來愈來愈覺得當下的文學更加刺激他，吸引他，就轉向了對當下文學現狀的研究。他一再強調自己是「當代文學」專業的教授和導師，這裏所指的「當代文學」不是指所謂「文革」前的17年文學，而是「文革」後的當下的文學，他願意自己投入到當下的文學潮流裏再搏風浪，推波助瀾。但這就要求他付出更大的體力和精力。我後來不止一次聽他抱怨自己：「我跟不動了，我沒有力氣追蹤了。」也就是說，他已經明顯感到自己沒有足夠的體力去做他的全景式、跟蹤式的當下文學研究了。這時候，潘先生才毅然放棄了對當代文學的跟蹤，再一次的轉向，開始了散文創作和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潘先生從現代文學轉向當代文學，從當代文學再轉向散文和歷史隨筆的寫作，都有其不得不轉向的理由，但從他的學術道路和學術追求來說，是有其內在一

致性的。這才使他在每一次學術轉向時都毅然決斷，毫不留戀，大踏步地前去。他晚年關於太平天國的歷史隨筆中所展示的錚錚風骨，以及一鞭一道血痕的藝術力度，正是他在長期研究現代文學、當下文學時想表達的思想和想傾吐的感情，終於在歷史領域和隨筆寫作裏恰如其分地噴發出來了。

我前面所說，潘先生望之儼然，其實內心非常天真，這是我與潘先生長期交往中的切實感受。因為望之儼然，為人方正，給人一種不苟且、難通融的印象，這使不了解潘先生的人會感到壓力，疏離者更加疏離；因為內心天真，他常常會毫不設防地把自信、自尊、孤傲的心理都溢於言表，這在平庸的社會環境裏很容易犯大忌，現實的環境使他與周圍的人無意間隔離開來。尤其是在退休以後，他甚至把自己名下的研究生轉到了我的名下，很多社會活動也都推辭了。那時候大概最使他開心的，就是有他所信任的朋友和學生來他家裏聊天了。不管是多麼年輕的朋友進入家門，他總是要取出一個鐵盒子，裏面存放着家鄉點心，還有好煙好茶，聊得快活時，他還會取出一瓶洋酒，淺酌深談，這是最令人神往的時候。潘先生是值得驕傲的，他是全國最早的當代文學專業的博士生導師之一，他培養的博士生已經有許多是學術領域名聲卓著的青年學者和博士生導師，活躍在全國各大名校學府。這次他生病住院期間，學生們不論名聲地位，自覺輪流在病床前盡力照顧，執弟子禮，為世人所稱道。這也是一個從事教學工作的知識分子的最高榮耀。潘先生的性格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可能各人在他身邊的感受並不一樣。但在我看來，潘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

世界盃球賽還在進行中，社會上各路英雄逐鹿，名利場各種明爭暗鬥，學術界各家觀點爭鳴，都還在進行中，然而潘先生突然撒手，把一切一切，都丟在身後。我聽到這消息時人不在上海，臨時先擬了一幅輓聯傳去，作為告別：

初旭雖隱終有餘輝掃妖氛

微瀾不興可慰後浪逐前波

關於潘先生，我還有許多話要說，以後再寫吧。

寫於 2006 年 7 月 5 日杭州

第二輯



我心中的巴金先生



我不是一個愛做筆記的人。有許多事情，當年仗着年輕記性好，好像什麼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腦子裏，但最近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比如，我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謁見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為在 1980 年的秋天，因為那一年我與李輝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於《文學評論》（大約是五月份），還得到過巴金先生的首肯，於是我記憶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與李輝上門拜訪的。那時候沒有拍照留念，記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藍布中山裝，似乎是天氣轉涼的時候。我一直這麼記着，還寫進了一些文章裏。但是最近問及李輝，他查了當年日記，竟是 1982 年 1 月 7 日，那時候我們已經畢業，馬上要各奔東西了，李輝被分在北京工作，想在臨行前見一次巴金。於是，由李小棠兄安排（我們都是同班同學），我倆才第一次走進武康路 113 號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們與巴金先生說了些什麼？我沒有記錄，李輝是有的，他如果回憶起這難忘的一幕，一定會有重要的細節披露。但我卻沒有太具體的印象，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體不好，似乎是感冒了，還有些發燒，我們談話中，有人進來為巴金先生注射針藥，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廳外面的過道裏去了一會，又進來與我們繼

續說話。那時候巴金先生已經是 78 歲的老人了。我們的探望是早幾天就約好的，並不知道那天他會感冒發燒。但巴金先生沒有因而拒絕兩個陌生的年輕人上門打擾，小棠兄也沒有告訴我們。所以當他走出客廳打針的時候，我倆惶恐的心情可想而知。

記得我們說起了無政府主義。那時候離「文革」還不遠，巴金在「文革」中被批鬥的主要罪名，就是無政府主義。「文革」有一段時期為了制止群眾武鬥、派仗和打砸搶等失控局面，《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社論要批判「無政府主義」，那時人們認為無政府主義就是打砸搶和武鬥。後來林彪倒台了，「四人幫」倒台了，批判他們極「左」路線時也總要聯繫他們「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的罪行。所以，直到「文革」結束「抓綱治國」的年代，無政府主義仍然是作為敵對的反動思潮看待的。有的學者寫文章為巴金辯護，認為巴金一生追求反帝反封建，與無政府主義無關；說巴金是「無政府主義者」，那是「四人幫」對巴金的陷害。我們那時正在研讀巴金的著作，在賈植芳教授的指導下，不僅讀到了巴金早期許多與無政府主義相關的文獻，還直接閱讀了克魯泡特金等人的無政府主義著作，才弄明白了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潮，它以激進的姿態反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在理論上反對一切國家形式的強權和專制，認為國家只能是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群眾的工具（階級鬥爭的工具），它的基本立場是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作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翼，曾經促使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進步。這樣理解無政府主義，比較貼近當時的真實情況，也可以與巴金一生追求進步的寫作活動聯繫起來了。我們堅持這樣的觀點，巴金先生也是認可的。那天我們也談到了這些想

法。但巴金先生顯然不願意就這個話題深入談下去，他有點激憤地揮着手，說：「這別去管它，他們要批判一個對象總是要把無政府主義拖去『陪綁』的，這個問題以後再說，現在說不清楚。」

巴金先生對無政府主義的這個態度，似乎一直沒有變，他始終以沉默對待自己曾經的信仰。有一年，我參與了巴金先生的全集的編輯工作。我向他建議，把他早年編譯的一本理論著作《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收入全集，他猶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稿子送到出版社後，還是被責任編輯撤了下來。記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訴我這件事，眼睛裏含着揶揄的微笑，輕輕地說：「還是他（指責任編輯）比我們有經驗，我們太書生氣了。」那時候我的感覺是，巴金先生寫《隨想錄》也好，編全集也好，他對於自己的責任的理解，能夠做什麼和不能夠做什麼，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觀火。他對現實世界一點僥幸心理都沒有，不會因為一些表面的榮譽和聲望就忘掉身處的環境。他全力以赴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並且力圖做得更好，但是不抱一點不切合實際的幻想。

二

巴金先生平時話不多，隨着年歲增高，還有健康的關係，他說話的聲音愈來愈低，有時候聽起來有些含糊不清。而且我也深深理解，像巴金先生那樣的高齡和健康狀況，他還肩負着沉重的寫作任務，還要應付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實在是不堪負擔。所以，我雖然住在上海，但有事情一般是通過小林、小棠轉達請示，盡量不去打擾他。1989年11月，巴金先生85誕辰，復旦大學和上海作家協會在青浦舉辦第一屆巴金學術研討會，來自各地的代表有五六十

人。我參與了會務。巴金先生當時身體已經很差了，心情也不好。他表示，除了個別老朋友外，他就不接待與會代表了，要我盡量阻止代表們上門看望。我把這個意思轉達給會議主持者，在會上也不斷宣傳，果然沒有代表在會議期間私自去見巴金先生。可是到了會議的最後一天，有一位代表聲淚俱下地站起來呼籲：「我們既然到了上海，就是到了巴老的家門口了，我們為什麼不能去見見巴老？」當時群情激奮，我再也無法阻攔大家去見巴金先生的願望，於是就把大家的意願轉告小林。小林徵求過巴金先生的同意，請與會代表集體去武康路巴金府上。我感到自己沒有完成巴金先生交給我的任務，很慚愧，就沒有跟隨大家一起去。後來聽說，那天巴金先生坐在客廳裏，一個一個與大家握手、合影，折騰了整整半天。大家的願望是滿足了，但我想，巴金先生肯定是很累很累。

巴金先生的身體愈來愈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療養，冬天則回到上海，直接住進華東醫院，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裏。我去看望他都是到華東醫院，那段時間（大約是 1990 年代初期），他的身體比較穩定，親自讀《巴金全集》和《巴金譯文全集》的校樣，堅持為每卷寫跋，還斷斷續續地寫一些懷念老朋友的短文章。其中就有寫他早年從事無政府主義運動時的好朋友衛惠林和吳克剛。1994 年前後，我正在籌備「火鳳凰」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想學習巴金先生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叢書的經驗，通過出版活動來踐行知識分子人文精神。我就此請教過巴金先生，他很支持我的行動，跟我分享當年他編輯文化生活叢書的經驗，還用患了帕金森症的手顫抖地寫下「火鳳凰」三個字，作為火鳳凰系列叢書的題詞。我策劃的「火鳳凰文庫」，第一本就是巴金先生在《隨想錄》之

後陸續寫成的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巴金先生欣然為它取名《再思錄》。等編完以後，我又覺得薄薄的一本，印出來有些草率。就與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書的代序。沒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來電話說，巴金先生已經寫好了《再思錄》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這樣幾句話：

躺在病床上，無法拿筆，講話無聲，似乎前途渺茫。聽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樂，想起他的話，他說過：「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歡樂，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會相信在苦難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歡樂。」他講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讀者。這個時候，我要對他們說的，也就是這幾句話。

我再說一次，這並不是最後的話。我相信，我還有機會拿起筆。

1995年1月12日¹

小林在電話裏給我唸了這篇文章後，還擔心裏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話是否有誤，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譯文中的「如果」記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當時巴金先生患了壓縮性骨折，痛苦萬分，曾提出要「安樂死」。可是在這篇出口成章的短文裏，他竟談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間尋找歡樂的話。可以想像，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樣寬廣。

1. 巴金：《再思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頁1。

也就在他患着壓縮性骨折，渾身疼痛無法站立起來的時候，中國作家協會要準備開代表大會了。也不知道出於什麼考慮，九十多歲身患重病的巴金先生依然被安排繼續當作協主席，主席團會議也被安排到上海來舉行。於是，巴金先生不得不穿上了硬塑背心，坐了輪椅，硬撐出席了會議，又一次滿足了大家的要求。會場上少不了一一握手，應答許多問候，據說巴金先生準備了發言稿，只是低聲唸了一段，就交給身邊的王蒙先生繼續唸下去。但在會議結束後，他就血壓升高，昏厥了幾次。病，更加重了。

三

巴金先生還沒有長期住院的時候，他對外界的信息是非常關注的，甚至也關心到我的寫作活動。有一次，為了《圍城》匯校本是否侵權的問題引起了爭論，《圍城》的出版單位認為匯校本侵犯了原著版權，代表作者起訴出版匯校本的出版社，並且請了一些大家寫文章幫腔。這事本來與我無關，只是偶爾看到一篇幫腔文章說，「匯校本」沒有被列入目前的出版權法，這是中國「著作權法」不夠完善的地方，但又「決不容許有人趁此機會，鑽法律的空子。」於是就有了一點想法，竊以為，既然法律有不完善之處，就應該先修訂法律，不能在法律以外另設標準來論罪。這個想法與匯校本爭論沒有多大關係，只是看多了「文革」前和「文革」中法治觀念混亂，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而引起的感想。誰知文章剛發表，馬上引來了一位前輩的批評，說我慫恿盜版書；我當然回應了。再過不久，巴金先生讓小林給我電話約我面談。他直截了當對我說，不要寫文章了，版權的事，侵權總是不好。我有點疑心是打官司的一方

找了巴金先生告狀，也可能是老人讀到了我的文章而想勸我息事寧人。於是我就把我的意見，包括匯校本引起爭論的來龍去脈仔細向老人講述了一遍，我以為我的文章沒有錯。巴金先生聽了我的話以後，猶猶豫豫地告訴我，出版社確有人讓他寫文章就這個匯校本表態，他說：「我寫是寫了一點，主要是談保護版權的，不過我對他們說了，不要發表，只是表示我的態度。」接着他又連連說：「讓他們不要發表，不發表的。」我知道巴金先生在《隨想錄》裏寫過保護版權的文章，強調作家對自己作品有權處置發表或者不發表，與眼下的匯校本官司沒有什麼關係。現在他又（應人之邀）寫了關於版權的文章，卻不讓公開發表，也許是怕傷害了當事的年輕人吧。我不知道這篇文章（可能是通信）今天是否還保存在出版社的某位編輯手裏。時過境遷，如果能夠找出來收入修訂中的《巴金全集》，也是一件功德。

巴金先生很早就關心過我和李輝在大學期間撰寫的《巴金論稿》的系列論文，那時候我們莽撞無知，把寫了或者發表了的論文託小棠兄轉給巴金先生過目。我手頭還保存了巴金先生親筆改過幾個字的油印文稿，是一篇論巴金文藝思想的文章。至於巴金先生為什麼會修改這篇文章，現在已經記不清了。我後來寫巴金傳記《人格的發展》，寫到抗戰勝利巴金創作《寒夜》為止，不再寫下去。書出版後，巴金先生在病床上聽人讀完了這部書，約我去談了一次。他談話時拿出一張練習簿的紙，上面記了好幾個問題，一一解答我在書裏寫到過的疑問。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他翻譯蒲魯東的《何謂財產》的下落。這是一部無政府主義理論經典，巴金在1930年全部譯完後交給了商務印書館，但沒有出版，巴金先生也沒有再提

起這本書。我在傳記裏說，這部書稿送出版社後就「不知下落了」，巴金先生就告訴我，出版社收到書稿後擱着沒有安排出版，後來遇到「一二八」戰事，書稿大約就此毀滅了。其他還有一些問題，都是他在聽人讀這本書時陸續發現的，就記下來告訴了我。他還問起為什麼不寫下卷，我主要是感到資料不足，但還有一個顧慮沒有說出來，巴金先生還健在，我覺得就寫完他的傳記，似乎有點冒昧。就這樣把這事拖了下來。有一年我曾經打算把下卷續完，還告訴了巴金先生，他很快就將這個事情告訴了他老弟李濟生先生，李濟生先生遇到我時還特意誇獎了我，鼓勵我趕快寫出來。但是，做事拖拉的作風使我遲遲沒有提起神來，終於辜負了巴金先生的期望。

四

要說到辜負巴金先生的期望，我還想說一件難以啟齒的事情。這件事我至今想起來還是非常心痛。巴金先生在《全集》第 20 卷的跋裏寫了這麼一段話：

樹基：

《炸不斷的橋》的目錄已在六六年日記中查出，抄給你看。

目次

並肩前進（代序）

美國飛賊們的下場

越南青年女民兵

炸不斷的橋

重訪十七度線
一塊頭巾
明亮的星星
向勝利的旅行
紅緞盒
見聞・感想・印象
附錄：春天的來信
後記

〈明亮的星星〉五篇給丟失了，〈春天的來信〉的改定稿也丟失了，不過江南的原信還登在《人民文學》三月號上。這個集子的〈後記〉是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寫成的，第二天我就把集子編好託濟生轉給上海文藝出版社。

沒有想到不久我就進了「牛棚」，待到十年夢醒，手稿回到身邊，一放就是幾年，我連翻看它們的興趣也沒有。後來編印《全集》，找出舊稿拿去複印，終於丟失，彷彿命中註定，我毫不惋惜，倒覺得心上一塊石頭給搬開了。欠債的感覺少一些，心裏也輕鬆些……

這裏所說的《炸不斷的橋》中五篇稿子「複印終於丟失」，是我造成的嚴重事故。當時巴金先生在編全集的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幾卷，我和李存光分頭幫他搜集和影印相關文獻。一天巴金先生把兩部舊稿交給我，一部是中篇小說《三同志》，是以朝鮮戰爭為題材，另一部就是散文集《炸不斷的橋》，以越南戰爭為題材，都是手稿，交給我去複印，準備編入全集。關於《三同志》，巴金先生還特意寫了一個紙條，上面寫了：

廢品，《三同志》，1961年寫成，我寫了自己不熟習的人和事，所以失敗了。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巴金

1990年1月8日

我拿到稿子，馬上去學校複印了。但是這個時候我正在搬家，忙着整理東西，我怕一些珍貴東西丟失，就特意把這兩部手稿連同複印件，還有一些其他待印的舊刊物、舊稿，還有我導師賈植芳先生準備整理回憶錄的文獻資料，這些我所有家當中最最重要的東西，都集中在一個袋子裏，專門放開來。結果真「彷彿命中註定」，等搬完家，什麼東西都沒有丟，偏偏這個最重要的袋子找不到了。當時我的絕望和沮喪是他人難以想像的。記得那天我在荒蕪的馬路邊倉皇奔走，天色一點點暗下來，彷彿要壓下來似的，真是欲哭無淚。我無法面對我人生道路上最最重要的兩位老人，也無法彌補那些丟失的文獻資料和手稿。不幸中的萬幸是我影印了《三同志》以後，把複印件放在身邊閱讀，總算沒有丟失。《炸不斷的橋》裏的散文作品，有六篇曾經發表過，剩下的四篇散文和一篇後記，由於我的失誤，永遠地消失了。

我不知道如何向老人交代這個事情。無奈中我找了陸谷葦先生，與他商量。谷葦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提攜過我的師長，一直關心我的成長，他也是長期關注和報道巴金先生的著名記者，發表過許多重要的報道。如巴金先生完成最後七篇《隨想錄》的消息就是他首先報道的。谷葦先生竭力安慰我，鼓勵我先去找李小林商量，請小林尋機會轉告巴老，認為這樣比較穩妥。我採納了他的建議，第二天就去找了小林，難以啟齒的事情終於向小林吐露了。我在這

裏真心讚美巴金先生樹立的良好家風，小林聽了我的陳述以後，一句責備話都沒有，反而要我安心，讓我寫一封信把情況說明一下，由她交給巴金先生。過了幾天她又打電話來，要我去家裏。我知道巴金先生已經原諒我了，但還是毫無自信地走進了武康路 113 號。那天小林和李濟生先生都在場，巴金先生坐在沙發上，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樣的事情都會發生的。不要緊。」接着，老人用安慰的口氣說，他有日記，記下了《炸不斷的橋》的篇目，可以把篇目保存下來。一場對我來說是天大的災難，也是心靈上一道被重重撕裂的傷口，就這樣被老人輕輕地撫平了。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恩師賈植芳先生家裏，當我把丟失資料的事告訴了先生的養女賈英，再由賈英告訴先生，那天我去先生家，先生、師母和賈英都圍坐在客廳裏，先生就對我說：「搬家就等於失一場火，總是要損失的。只要人沒有事，健健康康的，就好。」

這個事件，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傷，但老人的高風亮節，對我如何做人的教育，是一種極大的提升。我從此養成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做事習慣，努力克服內心的驕傲及自以為是的惡習。尤其是與巴金先生和賈植芳先生兩位老人有關的工作，我確是容不得再發生一絲一毫的差錯。有些不了解我的年輕人常會抱怨，以為我做事過於較真，對沒有事必躬躬的事情總是不順眼、不放心。那就是因為——只有我自己明白——即使獻出我的全部生命，我也難以報答老人的知遇之恩。

2014 年 9 月 27 日

寫於巴金先生誕辰 110 周年前夕

初見冰心

第一次去見冰心，是在 1990 年的夏天，一個陽光很充足的上午。在我的印象中，老太太坐着的那個房間特別明亮，她穩穩地坐在一張大寫字桌旁，窗明几淨，桌上有書有花，還有文房四寶，一切都有條不紊。陽光從窗口瀉入，罩在老人的臉上和身上，氣色比我想像中要好得多，眉宇間彌散着一股清泰祥和之氣。這神態氣象，我想凡是初見者都會為之感動。我一時無法品味出內心的強烈衝動，回到滬上，憶之再三，也無法說清當時的感受。後來我請教一位朋友，他學識淵博，立時找出一段《莊子》中形容老子的話給我看，書上這樣寫着：「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皤然似非人。」他說這是徐梵澄先生用來形容他接觸晚年魯迅時的感受。他還告訴我，他曾去北京拜訪過梁漱溟先生，面聆時也生出類似的聯想。——這種純屬私人的感覺扯開去會變得很神秘，不說也罷。但冰心的祥和，正與巴金的沉鬱相同，能生出一種極大的魅力。

前些年我幾乎每年都要去北京，但因為沒有特別的事情，不曾找機會去拜訪老太太。這回去見她是為了兩件事，一是感謝她曾為我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一書題詞，二是我正準備寫《巴金傳》，想聽聽她的想法。我與冰心本來不熟，《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在台灣出版增訂本時，請了李輝兄代為求字，不到一星期，李輝就寄來老太太親筆寫的書名。這回到了北京，就想順便去當面表示謝意。

不過她似已忘了題詞那回事；我寄給她的書倒是收到的，不久她就轉送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了。直到我們說起寫《巴金傳》的事，她才漸漸地興奮起來。李輝陪同我去，他在一邊問：「您認為巴金身上哪些品質最可貴？」冰心幾乎不加思索就回答：「是他對感情的專一和執着。」我至今很清楚地記得冰心說到這個話題時，臉上浮現出活潑的神情。她笑着說：「我告訴你們一個笑話。我小時候，父親是個海軍軍官，經常公務在外，我母親就說：『我們的女兒長大了可不要嫁給軍人。』後來我父親在北京當官，看到了官場的無聊，他加了一句說：『我們的女兒也不嫁給做官的。』再後來我長大了，又給自己加了一條：我不嫁給文人。我是說我不嫁給弄文舞墨的人。」說到這兒，冰心的臉更加清朗了，她固執地加了一句：「在那時的文人，差不多都有點風流，巴金是嚴肅的，你們看他對蕭珊的那種深情……」

冰心老人的這段「笑話」，我在關於她的傳記裏也讀過，想來不止說過一次了。但在這天的話題中，這個「笑話」顯得特別有氣氛。接着老太太一一批評了幾個文壇上很顯赫的名字，不屑地說：「文藝界的誘惑太多，用情就不會專一，那些人都是好人，與他們做朋友是可以的，但要嫁給他們，那可不行。」我知道冰心一生的感情生活相當幸福，她與吳文藻教授自 1923 年赴美途中相識，1929 年在燕京校園築起「愛巢」，從此，比翼雙飛半個多世紀，無論戰亂，無論浩劫。我過去讀冰心的詩和散文，文字間總是洋溢着一股涓涓的愛：對母親的、對孩子的、對同胞的、對祖國的，甚至對春天的愛……卻很少讀到她對於異性的愛。也許是她在現實生活中享有了最滿足的愛，才不需要訴諸筆端了吧。這一點，與她同時代的女作家廬隱，稍晚一些的蕭紅與丁玲，都相反。

我想 1985 年吳文藻教授的去世一定對冰心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老太太的溫馨寧靜頓時失去了依存的對象，儘管她寫過這樣漂亮的句子：「快樂是一抹微雲，痛苦是壓城的烏雲，這不同的雲彩，在你生命的天邊重疊着，……給你造成一個美麗的黃昏。」但痛苦畢竟是臨頭了，它淨化了一生浸泡在幸福的氤氳之氣中的冰心，她對生命意義的感知有了新的昇華。於是，冰心老人的書桌上多了一枚「為是賊」的閒章，作為自警。也就在那以後，我們有幸讀到了老太太的〈我請求〉、〈萬般皆上品〉、〈介紹三篇小說和三篇散文〉、〈《孩子心中的文革》序〉……這樣一些膾炙人口的好文章。那時人們都說，冰心變了，她的愛的哲學裏迸發了恨的火花。也如蕭乾所說的，只有真的愛了，才能痛恨。

那時，上海有一家刊物出終刊號，編輯部約請冰心寫文章。一次我偶然與那個刊物的一位編輯相遇，他告訴我說，老太太寄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只是結尾時有兩句話：「冬天既然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他們的主編覺得有些燙手，想把它刪去。我聽了這話，忽然想起不久前北京一家報紙刪節冰心的文章，巴金老人為之呼籲的事情，忙勸那位編輯對老太太的文章千萬慎重。後來，好像那篇文章沒有發出來。那次去看冰心，我順便問起了那篇文章，她淡然地說，他們既然有顧慮，不發也罷了。不過，老太太又重重地重複地問：「春天真的還會遠嗎？」

冰心說話吐字清楚，反應敏捷，完全不似九十高齡的人。聽說那一年的秋天，冰心在寓所裏過九十壽辰，各界人士都送來了壽桃、花籃、字畫等禮物，老太太也特別興奮，當場吟詩品花，語中藏鋒，機智與敏捷，都為年輕人所不及。凡在場者都留下了極其深

刻的印象，一時成為文人間的話題。可惜的是，至今未見有人能把那場景如實地描摹出來。記得經常與冰心在一起的李輝也說過，寫冰心的傳記就應該好好寫她的晚年，老人的生命中突然迸發了燦爛的火花，她的晚年就似輝煌如火的晚霞。可惜，這樣的傳記至今也未能見到。……一晃快三年了，今天回憶起初見冰心的那一幕，我願粗粗地寫下幾個場景與心境，或似燭火，能為瀟天晚霞增一分色彩。

寫於 1993 年 2 月 25 日

忠厚長者許杰

1990年，上海作家協會為五位90歲以上的老作家做壽，很熱鬧。三年過去，五位老人只剩下一位了，那就是華東師範大學的許杰教授。當年的文學研究會成員今還健在的已經不多，北京的冰心，上海的許杰，可算是南北相對的老壽星。

初次見到許杰先生是1982年，我剛剛大學畢業，第一次出遠門到海南島參加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許杰先生也來參加會議，與我編在一個小組裏。那時許先生已經八十多歲，斯斯文文的舉止，說起話來慢聲慢氣，有抑揚頓挫的調門。別人參加小組討論，他也參加，而且還總是爭取發言；別人去旅遊活動，他也跟着去。一次在三亞的「天涯海角」，年輕人都光着膀子下海鬧水，許杰先生也去了，還是穿得整整齐齊，手裏舉着一把蒲扇。別人見老人在沙灘上散步，都有點緊張，想去阻止他，他卻連連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這時，有些年輕人乾脆起哄：「許先生，你也下水來吧。」沒想到許先生還真的點點頭，慢慢地朝海水裏踏過去，嚇得旁邊的幾個中年人連忙扶着他。海水一直淹沒了他的小腿，老人才悠然自得地停住腳步，高興地看着周圍的人。

那天正值下午，太陽西斜，瀉在海面上的陽光特別亮，天空藍，海水也藍，一頭銀髮的許杰雙足插在淺水裏，悠悠地搖着蒲扇，周圍全是赤膊短褲的青年人，一幅老少無忌的嬉水圖。不知當

時有沒有人為許先生照過相，這個鏡頭一直印在我的腦子裏。那次海南島會議上老人很多，年紀最大的就數許先生，其次是李何林先生，也是鶴髮童顏，學者派頭十足，還有唐弢先生、盧鴻基先生、王瑤先生、陳瘦竹先生……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李何林先生以降的老一輩學者名流，幾乎都已作古，連中年一代的馬良春先生也「英年早逝」了。我彷彿記得，那幾位老人當時沒有一個敢下海的，唯有許杰，如一棵並不怎麼嬌貴的海南椰樹，隨隨便便地屹立在青年人中間。

也有許杰先生不參加的活動。會議進入尾聲，開始醞釀選舉理事名單了，會議氣氛有些兩樣，有的組討論到深更半夜，還是沒有議出結果。我那時還不是這個學會的會員，也不在意這些，一天晚上在院子裏閒步，在一個堆放着菠蘿的小房間裏，看見許杰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與幾個當地的小青年聊天，說着南洋的水果。我停下來，聽老人講關於榴槤的來歷，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南方有一種奇臭無比的水果，叫做榴槤，是鄭和下西洋時用大便哺育出來的……幾年以後，我在香港的水果店裏看到這種奇異的水果，笨笨的，雖然也有人推薦說不妨嘗嘗，但每每想起許杰老先生講的故事，就自動打消了嘗試的勇氣，不過那次我覺得許先生的舉動有點奇怪，就問：「許先生怎麼不去參加會議？」依我當時幼稚的想法，憑德高望重的資歷，許先生理當是學會的理事或是顧問。老人卻輕輕地搖了搖蒲扇：「我不是代表，我啥也不是，我只是來玩的。」說着又哈哈笑了。

以後的十年裏，我在上海文學界的許多場合都遇到許杰先生，不過通常是在座談會和娛樂性的場合，老人總是一團和氣，與世無

爭的模樣，每逢該說話的時候，就說幾句；該熱鬧的時候，就哈哈笑笑，什麼是非也沒有。直到今日，我仍然不知道許先生除了華東師大的教授以外，還有哪些榮譽性的頭銜和社會職務。90 歲的老人，理應是把世界看得淡了。

不過有一件事情，許杰老人不但看不開，而且異常地執着。這就是關於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發明權。1928 年上半年，許先生（用張子三的筆名）出版了一本文藝論著叫《明日的文學》，是郁達夫介紹到現代書局出版的，書中大致的觀點是，今日反映時代主流的文學是革命文學，明日的文學將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儘管後來「革命文學論爭」甚囂塵上，創造社與太陽社為了爭這個口號的首創權爭得不可開交，但許先生依然固執地寫文章，並在各種場合發言，強調他是最早提出這個口號的人。直到最近的一個座談會上，老人又一次提出了這個問題。我當時注意了一下四周的情況，似乎並沒有誰在關心這個話題，各人在做各人的事情，任憑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在一旁絮絮叨叨地說着。

許杰先生再度成為新聞人物是在 1990 年。那一年老人 89 歲，按做「九」不做「十」的習慣，華東師大中文系要為老人做生日，並且舉行「從事教育、寫作工作七十周年」紀念活動。許杰先生有一本散文集在出版社壓着，一直未能開印，這回老人開了口，希望他的書能在做壽之前印出。當時他的散文集徵訂數只有 600 本，出版社出於對老人的敬重，還是搶先印了出來。共印了 2,000 本，除去 600 本外，出版社留下了 400 本，1,000 本折成稿費送到了許先生的府上，堆得滿屋都是，可以當作一道「書牆」。老人正望着這一大堆書束手無措，忽而又收到了稅務局的單子，要老人上交所得

稅。後來聽說讓出版社取走一百多本書來「折算」，抵得上稅，餘下幾百本書依然躺在老人的屋子裏一籌莫展。那是 1989 年，「出書難」的呼聲已經很響了，有些作者靠上櫃檯簽名或擺攤等辦法來推銷自己的著作，但是要讓 90 歲的老人去擺攤賣書，也真太難為他了。於是老人寫了一篇文章，叫〈我新近出了本散文選集〉，在報紙上發表，訴說了出書給他帶來的煩惱。這篇文章多少觸動了知識分子委屈已久的心理，一時間眾說紛紜，在社會上成了一個熱門話題。許多名流都寫了文章，有的發感慨，有的出主意，也有的求書店，不過待牢騷建議過去後，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聽說老人家裏的走道上，現在還堆着那些書。

這以後，許杰先生真正地讓人感到有點「老」了。因為年紀大，一般湊熱鬧的活動也不常見他參加了。直到前不久，浙江文藝出版社在上海舉行一個研討會，老人也被請來，稍稍坐了一會兒，就讓人照料着走了。他看上去明顯地消瘦了，神情也有些呆滯。別人讓他第一個發言，他不推辭，開口就說：「我來參加會，主要是想告訴大家，我還活着……」

是的，許杰先生還活着。¹

寫於 1993 年 1 月 1 日

1. 許杰先生於 1993 年 9 月 25 日因腦溢血去世。在他生前住院時，曾讀到本章，並寫信給我的一個朋友，信中說：「我不認識陳思和同志。但對我形象卻寫得生動親切，你如碰到，請代我致意。」（2 月 24 日）——特加此註，以表示我對老人的哀悼。

瀟灑老人施蟄存

好多年前，我還是一個非常崇拜名人的年輕人，我常常希望賈植芳先生引我去拜訪一些上海的文化老人。賈先生總是扳着手指計算着：哪天天氣好，我們找一輛車子，到市裏去看看韓侍桁先生、看看師陀先生、看看施蟄存先生……可是後來總因為忙，或者是各種各樣的緣故，一直沒有去成。幾年以後，韓侍桁先生作古了，賈先生懊惱一陣，後悔沒能早去看看他。又過一些日子，師陀也去世了。賈先生這才着急起來，他又扳着手指說：「趕快去看看施蟄存先生，再拖下去，朋友都沒啦。」

於是我陪着先生和師母到了上海西區愚園路的一家郵局樓上，那已經是 1990 年夏初的某一天了。這以前，我曾見過一次施蟄存先生，那是在一個書店舉行的會議上，那次到會的人很多，都是文化名流。施先生來得晚，由兩個青年人扶着，慢慢地走到沙發前，坐下。旁人告訴我，施先生剛開過大刀，身上還掛着人造肛。那天的會上，有人說起了上海書店約請專家主編《近代文學大系》的事情，施先生負責主編其中的「翻譯文學卷」，他講了一些關於編輯的想法，就起身告辭了，還是由人扶着慢慢地離去……過去在魯迅的文章裏知道中國《莊子》與《文選》的論爭，以為提倡青年從古文中打好語文基礎的施蟄存，一定是位學究式的老先生；後來讀了《將軍底頭》、《石秀》等小說，又覺得作為 1980 年代意識流小

說先驅者的施蛰存，應該是個思想新潮、洋派十足的「現代派」作家。現在當施先生就坐在我的眼前，我才發現他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只是一個普普通通、整潔潔、白臉無鬚、大病初癒、帶着助聽器和人工肛、眼睛不大卻時時閃爍着一絲狡黠的笑意、八十多歲卻看上去精神很好的老人。

當我靜靜地聽着兩位老人親熱地說話時，我還發現，八十多歲的施蛰存先生豈止看上去精神，他說話時談吐之清晰、思路之敏捷，都讓人吃驚。進門不久，賈先生就把我介紹給施先生，不知怎麼說到了那時正爭論得很起勁的「重寫文學史」的事，施先生馬上眼睛一亮，提高嗓音說：「噢，照我的看法，現在完全沒有必要提『重寫文學史』噢，這種爭論沒有意思的。」他看我很認真地聽着，像是滿足了什麼似的，突然「噗哧」一笑，歪過臉湊着賈先生耳邊，一邊用手捂着嘴作悄悄語狀，一邊又把聲音提得高高的，說：「我說最好是什麼也別爭，自己埋頭去寫一本新的文學史出來。」笑容裏彌散着頑童似的神情。接着他又轉過來問我：「你認識某某嗎？」他說了一個名字，這是我的一個朋友，我當然認識。施先生接着說：「他現在在中文系資料室裏工作，前兩天他來看我，我對他說，你是步了我的後塵……」我知道施先生 1957 年以後，也有過很長一段時間在資料室裏工作。但他談起這些歷史來，就像在說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那次說到了施蛰存先生的住房。賈植芳先生感慨的是，他有一次去施蛰存先生家吃飯，還是 1950 年代初，為了給調往北京工作的翻譯家孫用錢行。那時施先生租了整幢樓居住，一共有三層，就在底樓客廳裏設宴。後來不久，因為沿馬路要設立郵局，把客廳

徵用了。再不久，「反右」開始，施先生被錯劃「右派」，房管所又把三樓給收回了，到了「文革」，二層前樓也沒收了，一家人連同書，都擠在小小的一間亭子間裏。文革後，經過多方奔走、上訴、交涉，才將二層前樓還給施先生居住。望着這間混合着臥室、書房、會客廳多功能的房間和堆滿了書的走道樓梯，我心裏實在不是滋味，不由地問：「施先生，難道華師大不能另外安排住房給你嗎？」「不！我哪兒也不要去。」施先生的語調突然嚴肅起來，「他們曾經說過，安排我到『部長樓』裏去住，我不去，那兒是官住的，萬一我死了，我的兒子還得搬出來。我們老百姓，還是租房子住，心安理得。可是，我1957年成了『右派』，我租房子仍然是月月付錢的，他們有什麼理由要沒收呢？」老人又天真了，他只認准了付租金住房的道理，怎麼就不理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呢？後來老人們又把話題轉到了那次送別孫用的宴會，施先生變得瀟灑起來，他雙手一攤，連連說：「沒了，孫用沒了，劉大杰沒了，韓侍桁也沒了，那會兒喝酒的人都沒了。喝酒的客廳也沒了，現在連茅台酒也沒了，你今天來，我只好用雀巢咖啡來招待啦。」說着，自己先笑了起來。

施先生的瀟灑，與陳子展老人的狂狷一樣，能給一個乍見面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過若細細比較起來，還是有些不同。陳老人的狂狷幾乎出自天性，而施老人的瀟灑，似有一絲苦澀的痕跡。記得有一次，我在香港小住，有朋友寫了一篇介紹施先生的散文，託我轉交《大公報》發表，文章寫得很有趣，題目是施蟄存先生的「東南西北四扇窗」，指的是施先生的四種著作：「東」指的是《唐詩百話》，唐詩自然是東方文學的瑰寶；「南」指的是他的小說集，

施先生為浙江人，自稱南方楚人，他的小說代表着南方的文學傳統；「西」指的是譯文集《域外詩抄》；而「北」則是指他的《水經注碑錄》和《北山集古錄》，這四種著作當時正先後問世，展現了老人一生多方面的成果，真是四面來風，難怪老人要自鳴得意。那篇文章的結尾處，有一段議論，大致意思是說施先生沒有像有些人那樣靠寫回憶錄吃老本，他精神不老，還求前進，不斷以自己新的學術成果，顯示出自己的力量。其實這段議論並沒有非議回憶錄的意思，只不過是從施先生晚年的學術碩果中生出的一些感嘆。但後來那朋友給我一份這文章的影印件，施先生讀了這段議論，在後面加了批註說：「過頭了，那些人又何罪之有？也很重要麼！否則我們還弄什麼現代文學？」很顯然老人把意思理解差了，不過瞧這又是問號又是感嘆號，我又覺得老人的瀟灑裏還有很認真、很嚴肅的一面。

近一年來，施先生的筆頭更勤了，在報刊上發表許多短小文章，語詞用得尖銳、俏皮，都讓人讀了開心。還有不少見解，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也早在他的學生圈裏傳開去，膾炙人口。今年聽說施先生要過 90 歲大壽了，但最近讀到他的一篇文章，竟還在認認真真地向讀者推薦他主編的《詞學》叢刊，以期能增加訂數。真不知這是老人的太瀟灑，還是不夠瀟灑。

定稿於 1993 年 1 月 13 日

康乃馨不再飄香

——懷念王瑤教授

已經一個月了，我總感到在我周圍不遠的哪一處陰影裏，有一雙睿智而黯淡的眼睛幽幽地朝我看着，它本該是明亮的，現在卻被人世間的陰影遮住了光彩，不能不變得黯淡，甚至絕望。我相信是我該償還一筆心債的時候了，可是，我那枝蒼白的筆怎麼寫得出那雙眼睛背後隱藏着的一切？我不能說我對那雙眼睛有多少了解，即使寫了出來，也必定是浮光掠影，然而我又明明感受到了那眼睛、那光、那影的存在，它似乎是一種呼喚、一種宣言，它在咻咻地對我說：「看，我還不會離開這個世界，還沒有到那個時間……」

是的，您還沒有到那個時間，您才 75 歲，您的身體狀況不壞，就在您離開這個世界的前一個月中，您由北方到南方，奔波、開會、發言，處處能聽到您的笑聲、話音與喉嚨裏的喘氣聲，直到您住進上海華東醫院，鼻子裏插着輸氧管的時候，您還笑呵呵地說：「想不到我會跑到你們上海來出個洋相。」您想不到，我們也想不到，這個洋相竟引來了殘忍的死神，奪走連您自己也不曾設防的生命。

昨天，收到北京一位朋友的信，他在信中的第一句就說：「真沒想到，你親自聯繫的華東醫院會成為王先生最後的歸宿地。」一句話就說得我心裏發痛。本來，這次聽說王瑤先生能夠來上海開

會，並應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章培恆教授的邀請，在復旦小住一段時間講學與休息，我心中自然高興，因為不但有了機會能當面聆聽王先生的教誨，更有了一種責任，使老人寂寞的晚年多添幾分溫馨。事實上，這一段時間王先生的名字經常掛在上海同仁們的嘴上，大家對他都懷着一種說不出的惦念。記得曾有一度誤傳先生的噩耗，許多同仁都流了眼淚，以致華東師範大學的錢谷融教授也相信了，後來在一個會議上他突然看到王先生，竟激動地迎上去當眾緊緊擁抱。錢先生為人最淡泊，居然也因意外的喜悅而忘形至此，上海同仁對王先生的情誼可想而知。這次王先生南下，上海學界各方都伸出了歡迎的手，復旦大學賈植芳教授率先發出邀請，請王先生夫婦來滬講學，王元化、章培恆，以及上海作家協會也先後提出邀請，並相爭提供川資。可是誰又能想到，上海，華東醫院，竟成了先生的最後歸宿地。

王先生這次南下，先去蘇州主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四屆二次理事會，住在蘇州大學。我也陪同賈植芳教授參加了這個會議，這是我第一次與王先生有了直接接觸。在這以前，我總共只見過先生二次。第一次是1982年，我剛剛大學畢業，留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當助教，正逢現代文學研究學會在海南島開第二屆年會，因為路太遠，教研室沒有人想參加，於是我自告奮勇地去了。說也慚愧，我對開會一向無甚興趣，更吸引我的是去海南見識熱帶風光，那時海南尚未建省，也不是特區，在內地人心目中有一種蠻荒神秘之感，所以我去到了那裏，一切都感到新鮮，而獨獨於人事無緣，依稀記得那次會議有許多學術界前輩參加，王瑤、李何林、唐弢、許杰、盧鴻基等，但因年輕，我未曾想到去單獨拜訪他們。王瑤先生在會上留給我的印象，一個是不停地抽着煙斗，另一個是滿口山西

話很難聽懂。最近讀了一篇悼念文章，才知道王先生除了不停抽煙外，還有一個不停喝茶的習慣，故有整天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自我解嘲。那回我沒有去拜訪王先生，但王先生那雙明亮的眼睛卻似乎已經注意到我了，後來聽說，他曾向一位復旦的教授抱怨，為什麼這麼重要的年會復旦只派一個年輕助教來參加。——可見那次我年輕與漫不經心的態度可能給先生留下了不佳的印象。我第二次見到先生是 1985 年在北京萬壽寺參加現代文學創新座談會的時候，王先生當時正在住院，他那天穿着醫院裏的病人衣服跑到會場，給我們作了一次報告。因為山西話不易懂，內容仍未聽進去，但王先生談笑風生的模樣和不斷喘息的聲調，都使我感到親切。再接下來就是在蘇州參加理事會，我才算第一次正式謁見王先生。

如果說，第一次在海南會議我遠遠地看着王先生時還持對權威敬而遠之的態度，第二次在萬壽寺會議聽王先生作報告時心裏充滿對前輩的尊重，那麼這一次，我的心情要複雜得多，有尊敬、有感激，還有一種隱隱的同情，我甚至感覺他更像一個年邁的父親。特別是在一年之前，我與王曉明兄聯袂在上海一家理論刊物上主持一個「重寫文學史」專欄，發表了一系列重新討論以往文學史定論的文章，這本意是衝擊一下沉悶的學術空氣，以推動文學史研究工作的進展。可是專欄文章陸續發表後，受到了社會上不同反響，支持的、反對的都有，這本是很正常的事。刊物編輯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特地去北京開了一個聽取意見的座談會。我們事先以為王先生不會來參加會議，因為一，這專欄是兩個年輕人搞的，雖然引起了理論界的興趣，但未必會影響學術界，更未必會引起王先生的注意；因為二，王先生是中國新文學史著作的第一個撰寫者，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至今仍是國內學習現代文學史的重要讀本。

我們貿然提出「重寫文學史」，能得到他的諒解麼？可是沒想到，王瑤先生居然參加了這個座談會，而且在會上發表了題為「文學史著作要後來居上」的熱情講話。他說：「文學作品不能隨着時代的發展而任意改動，但文學史學科總要發展，要突破過去，要後來居上，每個時代的文學史都應該達到自己時代的高度。」他還呼籲：「我們正處在一個重新思考的時代，已經到了重新審視我們走過的道路，重新來研究文學史學科如何發展的時候了。」這種發展整個學科建設的深遠眼光及對後輩學子的殷切期望，不能不讓我們受到了深深的震動。後來我們又知道，王先生不但以他在現代文學界的崇高聲望有力地支持了我們的工作，還頂住了一些壓力來全力保護我們。所以當我和曉明兄在蘇州去拜見他時，內心充滿着感激之情。

果然，剛見了面，王先生就問起了「重寫文學史」的工作，他開口就鼓勵我們：「搞學術研究，就是要實事求是，不要隨風向轉，過去的教訓已經夠多了。」說着，他笑了，聲音宏亮，兩眼炯炯有神，絲毫沒有老人常有的倦意，只是嘴唇上端新留的花白鬚鬚，看上去顯得有些蒼老。倒是王師母臉色發黃、清癯，默默無言地伴坐一旁。話題剛剛展開，本想問問先生在蘇州理事會結束後去上海居住有什麼事需要操辦，可是不斷有人進來，邀請王先生去樓下商量什麼事情。我們也就告辭出來。以後幾天裏，我只是在會上聽王先生不斷插話，幽默風趣的語言惹起會場上一陣陣笑聲，但在會後，拜訪先生的人極多，看他忙於應酬，也就不再去打擾他了。

這次參加會議的有不少我的朋友，他們有的遠居京城，久不見面，有的雖同在一個城市，卻因忙，平時也很少暢聊。這次蘇州

會議大家相聚一堂，總有說不完的話，每天聊到子夜過了方休。是時 1989 年 11 月中，正有一股北方寒流南下，天正冷，風亦緊，但居室裏卻融融暖意，談興正濃，竟也沒有想到利用這難得也是唯一的機會，多去聆聽王先生的教誨，現在想來悔也無及了。不過那次理事會開得很好，王先生在開幕式上提出：要把這次會議的學術氣氛搞得濃濃的。他親自參加了每一場會議和每一次活動。這次會議完全按照王先生的總設計進行着，會開得很順利，可是先生卻病倒了。

聽說，王先生這次離開北京前，相繼去過山東和內蒙，不安定的漂遊生活使老人原來一向很好的體質突然下降了，離京時他去醫院作過一次檢查，醫生查出他有心臟病，勸他慎行，但他卻表示這是他最後一次參加理事會了，下屆年會上他將辭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的職務。於是，他急着要南下。聽王先生身邊的一位研究生說，先生對這次南下十分操心，連買車票的事都一連催了好幾回，真不知他內心是否有預感，冥冥之中，一種力量召喚着要他到南方來終結自己的一生。

蘇州會議結束後，他就趕着來上海青浦縣參加全國首屆巴金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是由復旦大學中文系主辦，賈植芳教授主其事，早就邀請了王瑤先生夫婦參加，並說好會後將請他們到復旦講學小住。20 日早晨，王瑤先生偕夫人一併抵滬，我在車站接了他，看他精神尚好，當下便派車把他送到賈植芳先生家裏。因那天是研討會的報到日，事情特別多，一直忙到晚上才趕回青浦賓館，這時才聽賈先生說，王瑤先生在蘇州時着涼感冒，一到青浦就體力不支，早早躺下睡了，晚飯也沒有吃。到了第二天一早，遇見王師

母，說先生精神已好轉，決定參加開幕式。會議開幕時，因賓客來了許多，把一間可容納二三百人的會議室擠得滿滿的。王先生也由人扶着來了，坐在主持會議的賈植芳先生身旁，這兩位山西老鄉並排坐着，面對着近 200 名來自各地的現代文學研究工作者。當賈先生宣佈請王瑤先生講話時，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王先生操着那濃濃的山西口音，作了他生平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他的話很短，而且因喘氣而聲音顫抖，他抱歉地說，他因病無法在開幕式上說長時間的話，希望等休息兩天，身體好轉了，爭取在會議代表討論時再作發言。說完話後，他就喘得坐不住了，由他的學生吳福輝陪着直接送入青浦醫院。

當天晚上，我聽說王先生被診斷是急性肺炎，心不由得緊抽一下，待趕到醫院，只見空空的病房裏擺着四張床，先生一人睡在最裏面的一張床上，不停地大聲喘氣。他發着燒，臉色通紅，一邊吊着靜脈注射，一邊插着輸氧管。但他神志清楚，見到我還打招呼。不知怎麼的，我心頭就掠過一陣不祥的預感，想到了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事。1910 年 11 月 7 日，托爾斯泰在離開了妻子與女兒，孤身一人出走途中，因患肺炎而去世。雖然這個念頭瞬間地閃過，我卻被它嚇住了，我不願再想下去，只覺得應該盡快聯繫市級大醫院，讓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療。當晚從青浦電告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徐俊西先生，徐先生當下就明確地說，王先生是我們請來的客人，要盡快接回上海治療。在徐先生的安排下，我當夜與上海市華東醫院取得聯繫，第二天一清早就用救護車把王先生送走了。臨行前，先生熱度稍退，人也略精神，由師母和學生陪同離開青浦。事後我聽說，徐俊西在當天委派了一名市委宣

傳部辦公室主任，特地在華東醫院待了一整天組織人救護，調集上海最好的專家進行會診，並給病人以專門的護理。

王先生的病情時好時壞，在華東醫院住了二十多天，我在青浦開會期間，曾陪賈植芳先生去醫院看望他，他那天十分精神，鼻子裏插着氧氣管，卻不停地說話。那天病床邊上還有他的學生數人，他一看到賈先生就笑着說：「這回我準備在上海長住下去了，出院後到復旦大學住些日子，等病徹底養好了再走，免得回北京還要住院。」賈先生看他精神好，也很高興，真誠地說：「王先生，俺們都是鄉親，你在上海，二話不用說就來投奔俺，俺以後到北京，也去投奔你。」王先生連連說：「好，好，好。」我記得那天他說得很多，像是要把一生中最後的話全部說盡似的，他講這次病的經過，講了現代文學研究的現狀，忽而還問一些上海報刊雜誌的情況。我們看他說得興奮，怕他累着，就告辭出來。王瑤先生病房的對面還住着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展老人，九十多歲了。賈植芳先生順道進去看望，老人雖年事高了，但反應很快，聽賈先生說王瑤病了，他沉吟良久，感慨地說了一句：「1949年北京開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時，王瑤和胡曉玲是兩名最年輕的代表，想不到現在也住進來了。」聽老人這麼一說，賓主都有些淒涼。後來聽說，那天王瑤先生在我們走後並沒有休息，還與他的學生講着話，當晚，他的病情惡化了，呼吸困難，被切開氣管搶救，他那覆蓋着濃濃上髯的嘴永遠也不會再發出聲來了。

在這段日子裏，王瑤先生病重住院的消息已經傳開了。《文匯報》在青浦會議的頭一天就發出「王瑤教授不遠千里抱病與會」的消息，從北京、從廣州、從全國各地，每天都有他的學生、朋友、

親屬發來信件和電報，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兩名博士研究生和一名碩士研究生輪流陪在他的病房前，直到他的家屬來到。上海的作家、學者、文學研究者都紛紛前往醫院看望。85歲高齡的巴金，也由女兒扶着顛巍巍地來到華東醫院，到了樓下，因腿病無法上樓，只好讓女兒小林上去致意。本來，王瑤是中國第一代巴金作品的研究者，還擔任着不定期學術刊物《巴金研究論集》的主編，他這次風塵僕僕來到上海參加學術討論會，還準備參加為巴金85歲生辰舉辦的一系列活動，想不到竟中途病倒。這兩位老人，年紀相差整整十歲，卻都已經風燭殘年，一個懷着一片友情由北京趕到上海，如今已無法說話躺在醫院裏；另一個也懷着一片友情從家裏趕到醫院，卻因病上不了樓，他們無法交流彼此的感情，只能默默地以心相對。

一次，我去醫院，順道買了一束鮮花。賣花女問我買花作何用途，我說是看望病人，她說，就買康乃馨吧，祝病人盡快康復。我就捧了一束康乃馨送到先生病房，先生臉上微微笑着，流露出喜歡的神情，王師母把花送至先生面前，高興地說：「看，鮮花，北京能有這麼好的花嗎？」旁邊的護士小姐也快活起來，忙着找瓶子，插花，並商量着放在病床的哪一邊最合適，看着這束給病房帶來春意的花，我默默地祈禱：康乃馨，康乃馨，但願先生康復，願你更加馨香。送花的翌日，我有事去了浙江紹興、富陽和杭州等地，一周後回來，聽到的竟是先生去世的噩耗。

康乃馨，康乃馨，你從此再也不要飄香了。

聽先生彌留時一直守在旁邊的趙圓說，先生在最後幾天突然急躁起來，被病魔折磨得極度虛弱的身體再也無法抗住特殊治療過

程帶來的痛苦，他有一天突然在紙上寫了幾條要求，希望讓他自己起來吃東西，並轉入一般性治療護理。對於他的第一條要求，醫生同意了，那天他自己起來吃了幾個小餛飩，不料當天病情又重了，彌留期間，他神志十分清醒，先在他的學生趙圓手心上寫了半個「受」字，趙圓知其受不了，連忙安慰他，但這已經無濟於事，他又緩緩地在女兒王超冰手掌裏寫了一個「死」字，這，就是這位寫了一輩子書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絕筆。1989年12月13日晚8時40分，王瑤先生終於閉上了他那雙明亮的眼睛。

那天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回來，我什麼事都不想做，也做不成。我又翻開艾爾默·莫德的《托爾斯泰傳》，想着在青浦時的那個不祥念頭。莫德在書中這樣寫另一位老人的彌留：「尼基京醫生來後給病人作了檢查，診斷為左肺發炎，但並不嚴重，托爾斯泰的真正死因，似乎是神經方面的衰竭。……」讀至此，我真想拿起筆來寫些什麼，但思緒紛亂，只塗了一張白紙，就寫不下去了。這塗成的短文，後來以〈站在王瑤先生的身後〉為題，與曉明兄聯名刊登在《上海文論》上，但因為短，因為倉促混舌，許多話都言不盡意。這份心債，直至今日才算完畢。

願王瑤先生在天之靈能夠得到安寧。

1990年1月17日改畢

懷念畢修勺先生

有幸結識畢修勺先生完全是一個偶然的機會。那個時候我考上復旦大學中文系，開始研究巴金的著作。一天，有個親戚患病住院，我去看望，就在病房裏高談闊論，這也是少年輕狂之表現。過後，同病房的一位姓陳的老先生問我親戚：「剛才聽你們在講巴金什麼的，我有一個好朋友，叫畢修勺，是巴金的好朋友，巴金去法國的船票，還有兌換法郎，都是他代辦的，你們要不要認識他？我可以介紹。」親戚轉告後，我是喜出望外，當下就去拜訪了那位陳先生。於是，拿了陳先生的介紹信，我和李輝就登門拜訪畢修勺先生了。

畢先生住在長樂路底的一條舊式弄堂裏，那時已經快 80 高齡了，但是身體非常健朗。因為人的高大，書房就顯得窄小，一面牆上掛着吳稚輝、李石曾手書的對聯，另一面牆邊是小書桌，書桌前面牆上釘了一個布袋，專門存放信件。書桌上攤開着外文書籍。這時候我們才知道畢先生是翻譯家，以翻譯左拉的小說著名。這時候我才知道我以前讀過的一部譯者署名為華素的左拉小說《崩潰》出自畢先生的手筆。

那天的談話情景，現在回想起來還恍如昨天。說到我們正在研究巴金，準備撰寫論文的時候，畢先生坦率地告訴我們：他與巴金有過交往，他們青年時都信仰無政府主義，但是走的路不同。他比

較靠攏吳稚輝、李石曾一派的無政府主義，參與了創辦勞動大學、主編《革命周報》等活動，而巴金則有更加激進的立場，兩人的觀點有分歧。他回憶了自己與巴金的兩次衝突：第一次是在 1927 年國共分裂之時，巴金出於抗議國民黨大屠殺的義憤，（這場大屠殺是從擔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吳稚輝、李石曾、張靜江等元老彈劾共產黨開始的），遷怒於李石曾出錢創辦的《革命周報》的主編畢修勺。但是畢先生認為，巴金不完全是出於這個原因，他說，巴金罵李石曾的錢是臭的，可是巴金回國以後參與了自由書店的活動，還主編了《自由月刊》，自由書店也是李石曾出的錢，為什麼他不嫌臭了呢？這場衝突後來經馬宗融從中做調解而平息，兩人重歸於好。第二次衝突是發生在 1949 年以後，巴金、吳朗西、朱洗、畢修勺和章靳以五人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董事，期間發生了人事糾紛，巴金與吳朗西分道揚鑣，巴金退出文化生活出版社另辦平明出版社，而畢修勺和朱洗都站在吳朗西的一邊。這場矛盾主要是巴、吳之間發生的，但隨着公私合營、政治運動不間斷地發生，兩人再無機會重新合作。我記得很清楚，畢先生說完他和巴金的恩怨滄桑以後，就說，我不能陪你們去看望巴金，但我可以介紹你們去看看吳朗西，他可是個大好人呵。說着，就拿起司的克（手杖），站起身來，馬上就要陪我們去吳朗西先生的家。

畢先生住在長樂路的西頭，華山路附近，吳先生住在長樂路的東頭，重慶南路附近，中間大約是公交車三站路程。畢先生與我們邊走邊聊，毫無倦意，司的克掛在他手臂上，也沒有當作手杖用。一路上，畢先生講了他與吳稚輝、李石曾（兩個「老頭子」）的關係，他追隨他們，對他們充滿了敬意和懷念。他帶着感情地說：「當年我與他們在一起時，就像你們現在這樣的年紀，我與他們經

常在斜橋一帶，邊走邊聊天。」他對吳稚輝特別尊敬，說吳的生活非常樸素，就像一般平民那樣，在重慶時，吳的住宅邊上就是陰溝，發散着臭味，但他毫無怨言。還說了一件逸事：1943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蔣介石有意讓吳稚輝接任主席之位，當時夏天，吳稚輝體胖怕熱，渾身脫得只剩下圍在腰間的一塊布，這樣出來接見民國要人，說我這個樣子去當政府主席，你們不願意，如果我穿戴得整整齊齊出入辦公，我就不得自由，恐怕你們又要忙着公祭了。這樣怪話連篇就把主席的職務推辭了。畢先生感嘆着說，連國家主席都不要當的人，才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我理解畢修勺先生安貧樂居，不求聞達的一生，那就是有着信仰做底子，高尚人格作榜樣的。他後來被「肅反」、「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所累，受盡迫害，生死一線，但是他活得坦坦蕩蕩，胸無芥蒂，就是因為他心底裏有着吳稚輝、李石曾作為榜樣，做人非常有原則有追求。所以，當我再次問他對無政府主義的看法時，他毫不猶豫朗聲宣佈：「我始終信仰無政府主義！」

且不說我們那天見到吳朗西先生和夫人柳靜女士的情況，我還是把話題集中在畢先生的印象之上。這以後，我漸漸地與畢先生成了忘年交，經常到他府上去聊天，知道了他埋首於左拉作品的翻譯，也知道了他已經譯出多種左拉作品的譯稿，還不斷地在修訂舊譯，開拓新譯。八十多歲的老人有一種時不我待的急迫感，有一次他指着《巴斯加醫生》的譯稿說，這是左拉的《盧貢—馬卡爾家族》中的最後一本，也是最難翻譯的一本，裏面涉及到多種語言。他說，他怕自己年紀大了，來不及譯完左拉的全部作品，就挑最難譯的這本先譯出來的。畢先生翻譯的舊稿，我都看過，他是託人認真抄寫一遍，然後又在抄稿上逐句訂正。畢修勺先生的翻譯有着鮮明

的特色和追求，他尊重原著，採用直譯的方法，逐字逐句地對應翻譯。這在今天流行的翻譯界大約是很不討好的，所以他的譯稿一再被出版社退回來。但是他非常自信，堅信自己翻譯的方法是有價值的，曾經有好幾家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他的翻譯著作，只是需要找人潤色一下，但畢先生堅決不同意別人隨意改動譯稿。記得有一次某出版社要出版《人獸》，畢先生要我寫一篇導讀，我寫了以後，他表示滿意，並且同意我對譯稿做些修辭上的修訂，我不懂法語，也只能在語法上稍微順一順，但是只改了第一章，畢先生看了以後就收回去了。後來也不見這本譯著的出版。

不過，畢先生在晚年畢竟看到了一本舊著的再版。那是左拉的《勞動》，由黃河文藝出版社出版。記得那天畢先生一大早就走到我家，敲了門，親手送給我新書，還邀請我和吳基民一起在紅房子西餐館吃法國餐。吳基民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畢業後分配在上海文史館工作，畢先生被聘為文史館員。吳基民寫過一篇報告文學，題目叫《左拉淚》，表彰畢先生的翻譯事跡。我們在紅房子餐廳裏頻頻舉杯，把《勞動》的出版看作一個好兆頭，祝願以後能夠順利出版畢譯左拉全集。《勞動》體現了左拉的社會主義理想，這個理想來自歐洲空想社會主義三大代表之一傅立葉的思想理論。傅立葉主義還影響過著名的無政府主義理想家蒲魯東，因此也有人把傅立葉理論看作是無政府主義的源頭之一。左拉在多部小說裏描寫過無政府主義者，多數是負面的形象，但《勞動》中描寫的社會主義理想卻非常詩意，也最有震撼力。我曾經請教過畢先生，左拉是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畢先生說不是的，左拉是傅立葉主義者。我想，左拉作為一個法蘭西民族的良心，民主主義的鬥士，能夠被畢修勺服膺終身，追隨終身，他們之間的默契也應該是歐洲社會主義思想的薪

火傳承。這樣，我們在畢修勺的精神世界裏除了找到吳稚輝、李石曾的無政府主義道德人格榜樣以外，還有就是左拉的歐洲知識分子的戰鬥傳統。

但是，畢先生終究沒有等到他的譯著全部出版，抱憾離開了這個世界。在他身後的二十幾年裏，中國社會愈來愈富裕，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文化進步，在畢先生哲嗣畢克魯先生的多年努力下，畢譯左拉著作集終於獲得了全部出版，真是功德無量！畢先生的其他譯著如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等也相繼出版。現在我又讀到了畢先生的女婿趙興華先生編撰的《畢修勺畫傳》¹，不由得喜淚漣漣，書裏收集的一幅幅珍貴照片，大多數我都看到過，我又一次重溫了無政府主義老戰士、理想主義者、翻譯家畢修勺先生的一生坎坷經歷，在我耳邊又響起畢先生當年對我和李輝說的話：「我與他們（吳稚輝、李石曾）在一起時，就像你們現在這樣的年紀……」一晃三十多年過去，我和李輝也都過了耳順之年。在理想主義變得稀有罕見的當今社會，我確實時時生出「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的心情。今天我向讀者推薦這本畫冊，絕不僅僅把它看作是對一個我所尊敬的老人的紀念，這一本薄薄的畫冊，承載着的是巨大的理想主義的傳統和力量。

寫於 2016 年 9 月 15 日

1. 趙興華、畢克魯、陳思和主編：《翻譯家畢修勺》（海口：海南出版社，2018）。本章為該書所做的序言。

永遠的浪漫

——懷念吳朗西先生

接到了吳朗西先生的訃文，似乎是在意料之中，又確確實實地驚詫於天地之無情。吳先生以 89 高齡辭世，自然也可列入長壽，何況又有久治不癒的病。

老人去世前不過一個月，我曾陪同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師生倆去拜訪。那天我們三人冒着隆冬的寒冷，擠車到閘北的一套單元裏，屋裏生着爐子，暖融融的，吳先生被安置在一張有靠背的椅子上，身上緊緊地裹着毯子，只露出一個頭。我的第一印象是：先生返老還童了。老人的臉有點浮腫，也可能是熱的關係，臉上的皮膚特別紅潤光潔，看到客人進來，他的嘴唇久久地動着，卻發不出一點聲音。吳老太太在一旁張羅，回答客人提出的問題，言談中依然是一派健朗。我趁着老太太陪客人說話，便上前告訴吳先生一些事情：一是自己新近出了一本《巴金傳》，裏面多次談到吳先生及其創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我把書拿給吳先生看，心想他一定會喜歡；二是有兩年多未去看望老人了，總想跟他聊些閒話。雖然吳先生說話不方便，不過他很注意地聽着。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告訴他，日本學者坂井洋史新近從泉州回來，說遇到了隨兒子在那裏定居的衛惠林先生，吳先生突然從嘴裏發出一聲響亮的「噢」——，以致滿屋子的人都停下說話，驚訝地朝他看去，我心裏明白，這些朋友間

的事情，是老人最關心，也是最有興趣的；從這一聲意外的「噢」裏，我一下子體會到了老人內心深處的一股滾燙的感情。它幫助我記憶起許許多多的往事。

我與老年人結交的機會並不很多，特別是文化界的前輩人物。因為生性拘謹，又常訥於言，坐在老人面前總感到有點不知所措。但只有幾位老人，因為是頻繁交往而不知不覺忘掉了拘束，其中有一位就是吳朗西先生。第一次去拜訪先生，我還是個學生，正做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個案研究。吳先生的家，正是當年文生社的社址，那排狹長的石庫門弄堂房子，曾經出入過文壇上顯赫的人物，一本本新文學史上的名作也由此編成問世；這裏也發生過一樁血腥的事件，優秀的散文家陸蠡因為出版進步書籍而被捕，最終消失在日本憲兵隊的監牢裏。當我初次走進這幢充滿歷史感的老房子時，我曾想像着那屋子的主人一定是飽經風霜，充滿了傳奇色彩。可是第一眼看見吳先生的身影，完全出乎意料：竟是一個平平常常、病病歪歪的老人。因為帕金森症，他的嘴唇、手、腳都抖動着，說話有些困難，再加上濃重的四川口音，我開初總聽不明白他的話，需要吳老太太在一旁翻譯，但多次接觸以後，漸漸地，我不再是為了寫文章才去採訪，他也不是為了回答問題才接待我，我們的話題愈扯愈遠。我才發現，我眼前的這對樸素老夫婦，真正是來自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傳奇世界。

我們現在的人或許無法理解上一代人的浪漫精神。譬如說，1920年代末吳先生在日本上智大學攻讀德國文學，並在國內翻譯出版了一些文藝著作，本來，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他會成為一個很出色的文學翻譯家與德國文學研究者。可是「九·一八」的炮聲

一響，他毅然放棄了差幾個月就獲得的畢業文憑，與友人相約回國抗日。但是一踏入國門，才知道不但報國無門，連謀一大學教職也因為沒有文憑而受挫。但是，精力充沛的青年吳朗西並不以此為憾，他放棄了正規學業，轉而投入出版事業，在短短的兩年中，先後參與創辦了《美術生活》、《漫畫生活》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前兩個是美術刊物，後一個則在文學史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吳先生起先打算把文生社搬到內地，未成，便獨自去了福建，與黎烈文一起創辦改進出版社，而他的妻子柳靜赤手空拳在重慶沙坪壩辦起了一家書店，為了紀念友人匡互生，特取名曰「互生書店」。抗戰後期，吳先生轉入商界，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徒手辦起了理想型的消費合作社，使經濟學家馬寅初驚訝不已。後來他又入銀行界，成為四川一財團駐日本代表，把福建的生漆工藝傳入日本，至今在日本名留青史。直到1949年以後，他重回出版界，主持文生社工作，1950年代「公私合營」，文生社併入新文藝出版社，從此，吳先生便重新做起了翻譯工作。我過去讀過德國漫畫家奧納夫·古爾布蘭生（Olaf Gulbransson）的自傳《童年與故鄉》（原著名為 *Es Wareinmal*），這是一部文圖並茂的傳記作品，由吳朗西先生翻譯，豐子愷先生手書全文，並配以古爾布蘭生自己創作的一幅幅精美圖畫，雖是1950年代出版的圖書，至今仍未能忘懷。

吳先生從攻讀德國文學開始了他的人生事業，以翻譯德國文學為其晚年的主要工作，但在其間，他屢屢改行，或可把他稱作出版家、實業家、商人、銀行職員、中日友好使者……但這些稱呼都不能準確地概括吳先生的為人：永遠的不滿足現狀，永遠的不安分，總希望在新的領域裏有所開拓，有所創造……恰當的稱號，

應該說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或用他自己晚年多次對我所說的話來描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最可說明這種理想主義的，是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這間出版社規模雖然不大，但無論在現代文學史還是出版史上都有着特殊的價值，因為它是某種理想的產物。吳先生曾向我介紹過文生社的經營方式：從 1935 年到 1954 年公私合營近 20 年，從未發過股息紅利，文生社的股東都不過掛名而已。股東們只是對它盡義務，卻不取任何報酬，它的主要成員除了吳朗西夫婦外，還有巴金、麗尼、朱洗、伍禪等，他們都有其他方面的收入，連文生社的工資都不拿。所以它不是個人出資獨家企業，也不是吸收若干外股的公司組織，它僅僅是在中國出版業極不景氣的情況下，靠幾個書生的義務勞動白手起家辦起的一個出版社，尤其是在它最初成立的兩年裏，真是有一種人格的光輝籠罩在這個小小的文化事業中。記得我在 10 年前一次採訪中曾問過吳先生，當年文生社同仁為什麼能夠以這種崇高的精神來經營這個文化事業，吳先生平靜地回答我：「那時，我們都有信仰。」說這話的時候，他那浮腫的臉龐舒展開來，細長的眼睛也放出了光彩，我頓時感受到一種人格的力量彌漫在破舊的屋內。吳先生的話提醒了我，這種只講奉獻，不計報酬的人格原則，正是巴金、吳朗西和他們的朋友們終生信仰的正義、互助、自我犧牲三大倫理原則在具體工作中的一個體現。儘管這已經是快 50 年以前的舊聞了，但我今天重寫這段歷史時，心裏不能不充滿了感動。

我在寫《巴金傳》的時候，曾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和泉州黎明高中都看作是 1930 年代一群知識分子對自己理想與信仰的實踐

方式。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不外是改變中國的命運，這當然是有多種實踐方式，按儒家的話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從事出版和教育的這群有着堅定人生信仰的知識分子，正是在兩者之間走出了第三種道路，他們把理想之路歸諸足下，一步一步腳印地在佈滿荊棘的中國大地上實踐着……

不過令我感受最深的，還不是這些往事。因為舊房拆遷，吳先生老夫婦倆搬到閩北女兒家居住，路隔得遠了，我也疏於問候。過了一年，記得是 1989 年，突然收到吳老太太的來信，說吳先生找我商量事情。我記得那時外面形勢正亂，交通也異常擁擠，待我趕到吳老家裏，只見他坐在正播放着新聞的電視機前，哆哆嗦嗦地向我訴說他內心的激動。因為怕表達不清，他用做手勢幫助表達，結果把桌上的茶杯也差點碰翻。這時我發現，吳先生的帕金森病症更嚴重了，要聽懂他的話真有點困難，吳老太太在一旁又是勸他慢慢說，又是幫着翻譯，這才使我明白，原來吳先生近年來深居簡出，一直在思考一個社會問題：在改革開放的新經濟體制下，老年人（包括退休工人）目前面臨經濟上和心理上的種種壓力。他過去曾對我說過這樣的想法：今後老年人不能靠國家照顧了，應該由自己來解決自己的困難。如果能設立一個老年人福利基金會，讓人們從中年，甚至青年時代就參加積累資金，用以興辦醫院、養老院等老年服務設施，或能解決老有所託的衣食問題。這個想法他醞釀許久，也曾多次對我及其他年輕朋友說過，但在 1989 年，也許是他預感到自己生命無多，突然有點迫不及待了。他找我商量這個理想實施的可能性，並說他的朋友吳克剛可能要回國定居，他希望吳克剛也能幫他一把。我當時一邊聽着老人的敘述，一邊盤算着怎樣安

慰他。我明明知道，不依靠國家而靠自己的努力去解決社會問題，是老人終生的信仰，如果倒退 50 年，就像當年搞文化生活出版社和消費合作社一樣，他或許會成功，但在今天，一個病病歪歪的老人要想靠個人奉獻和理想去辦這麼一件事業，真有點勉為其難了。面對老人火熱的語言，我實在是無言以對……我只記得那天臨別時，老人還興致勃勃地說：「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我一生都充滿幻想，創辦老年人福利基金會，是最後一次幻想了……」說完這話，他緊抿着厚厚的嘴唇，露出了天真得近似兒童的微笑。

這以後，我很少再去看望老人，對老人最後所託的心願，我只能心存愧疚。不知老人在生命最後的歲月裏，還念叨這個夢想否。

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舊址已拆，那兒矗立起一幢高層樓房。創辦文生社的吳先生也亡故了，但他的崇高的理想、浪漫的精神和人格的原則，能否也像這新建的建築那樣，在當代人心裏豎起一座紀念碑呢？

寫於 1992 年 5 月 20 日

為自由而抗爭的靈魂 ——懷念無名氏先生

牆上掛着無名氏先生手書的條幅，上面是他的一首舊詩，吟誦那杭州的湖光水色；桌上放着無名氏先生親手整理的舊作，厚厚的五十萬字，準備作為我主編的「潛在寫作文叢」的第一部書稿；耳邊響着無名氏先生在電話裏滔滔不絕的雄辯聲，談他在內地的種種計劃：出版舊著啊、改編影視啊、巡迴講演啊，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精力，越洋電話一打就是半個多小時，聲音震得耳膜發痛，有時不得不要把話筒放得離耳朵遠一些。可是，彷彿鐘錶在一瞬間停止了轉動，萬籟俱寂，一切憧憬與宏圖都變得毫無意義。他老是在電話裏對我說，他的什麼什麼書就要出版了，叮囑我要為這些出版物寫些短文章作點宣傳，他一點也不忌諱他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增加書的銷路，經常直言不諱地囑咐，要說說好話噢，先打開銷路噢，以後再作學術探討吧……我對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如此計較功利感到不解也感到可笑，於是總像安慰老小孩那樣應付他，總是漫聲應道：好的好的，空一些就寫吧，空一些就寫吧。可是又好像總是沒有空一些的時候，現在，已經沒有微波起瀾，他再也不會來催促我為他寫文章了，可是我卻要為他寫下一篇他已經不能讀到的文章——無名氏的悼文。

無名氏在中國文學史上淹沒無名，以致人們對他的記憶僅僅是1940年代的暢銷書《北極風情畫》和《塔裏的女人》，這兩部現代言情小說在被禁毀20年後居然奇蹟般地復活在最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最初讀到《塔裏的女人》的版本就是一部手抄本，當初的感覺也不是很好，可小說裏濃得化不開的語言和感情，總讓人難忘，於是就記住了「無名氏」三個字。現代文學史上還有一位作家自稱「廢名」，其實他的名字也傳得很遠，現在還有不少人尊他為小說大師。廢名以淡泊清拙的語言風格出了名，而無名氏卻是廢名的反面，他的小說、散文、詩歌，甚至理論和書信，都是濃妝豔彩，氣勢磅礴，我想，凡讀過他的心血巨著《無名書》者，一定會對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國的現代文學裏，我們還找不到一個作家像無名氏那樣，持之以恆地堅持十幾年的蟄居生涯，完成一部人生大書，不僅是篇幅上達到二百多萬字，而且在內涵上一以貫之地堅持探索人生真諦，探索宇宙真理。如果從內涵上說，這是一部浮士德式的人生史詩，但從文學風格來說，西方的浮士德最終擺脫不了上帝魔鬼為之預設的宿命，而《無名書》裏的印蒂，不管他多麼幼稚、多麼狂妄，無名氏先生給他的使命是自覺地走上了探索宇宙真理的不歸路，他的探索發自內心的呼喚，他的一次次遭遇艱難厄運也都是處於自覺的省悟與人生的參透。早在半個世紀之前，無名氏已經敏感到中國傳統文化之困境與西方文化之虛無，他想在全球性的西方文化泛濫中浮現一艘挪亞方舟來拯救現代人類，而這艘方舟既來自宇宙星光的空間裏，也來自民族的意識與道德中。正因為無名氏的精神世界早已經跳出三界，所以他對現實的凡塵俗情是那麼的不堪想像，他一遍又一遍地書寫着精神領域的神奇瑰麗，也一遍又一遍地詛咒着現實生活中不能忍受的庸俗。

精神世界的神引導着他，無名氏一生都走在孤注一擲式的懸崖峭壁上。他高中時代恃才傲物拒絕考試，開始了闖蕩社會的傳奇。他的兄長卜少夫在國民黨南京政府任職，而他卻以原始正義與救亡之心參與韓國流亡政府的復國大業，以洶湧才思與澎湃文字為安身立命之本，不但未涉足政界，反而在創作中對社會黑暗進行了透徹的批判。當他的兩本暢銷書紅遍大後方，利潤滾滾而來的時候，他不像今人那樣忙着辦公司炒作自己，反而抽身退出名利場，隱居西子湖畔研究哲學歷史和文學，立志寫出宇宙大書《無名書》；1950年代以後，從「肅反」到「文革」災禍迭起，如沉重的刀劍，每一次都可能砍在他的頭上，可是他依然鎮靜自如，潛心創作，在驚恐、在饑餓、在困乏、在誘惑中，他毫不動搖地如期完成六卷《無名書》，為中國的潛在寫作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而在劫難過去，重見天日之時，他居然奇蹟般地将二百萬字的創作分散成幾千封信寄往海外正式問世，而且他自己也奇蹟般地顯身於海外，並以一段忘年之戀情重新成為新聞媒體的大紅人。在他晚年，命運又一次向他挑戰：國民黨在台灣失勢以後，台獨勢力無意再為他提供經濟上的資助，而他個人的家庭生活也陷於困境，梨花海棠終於分道，這時候他又一次以敏捷的思維能力重新選擇內地為他最後的棲身之地。近年來他奔走內地，為了擴大在內地青年讀者中的影響，他不顧八十多歲的殘朽之年，去學校作演講，去出版社談版權，積極推動影視界人士來改編他的作品。他多次與我談起他在台灣的經濟窘狀，有一次我委婉地流露出對他如此謀求功利表示不解的意思，他直爽地說，唉，我是晚年衣食無着落啊，如果有個安定的生活，我何苦這樣奔波？

其實奔波也是一種天意，就像是西緒福斯那樣終身勞苦地推動巨石，每一次他走下山去重新推石頭時，他總是滿懷信心，在勞苦中感受到一種人的本來的價值。無名氏天生的不安定的靈魂，決定了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奇的刺激，追逐特立獨行的名聲，學問、政治、金錢、世俗幸福，甚至是老夫少妻的溫柔鄉，都沒有使他駐足長留，他一直在向前探索，儘管有時候他以最世俗的自我標榜來宣傳自己的成就，以最功利的態度來取捨他的政治主張，以最浪漫的風情來表達他的嚴肅的人生追求，甚至，以他所特有的追逐時髦、故弄玄虛與花裏胡哨的文風，來裝飾唯美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藝術情懷，但我還是想說，他的精神世界裏仍然保持着一種童心似的純粹和知識分子的浪漫，一種浮士德似的不滿足、一種唐吉訶德似的老天真。不停地奔波和不停地追求是無名氏的宿命，動盪不安的生活方式已經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但他依然精力充沛、聲音洪亮，充滿着對未來的想像，如果世界文化上真有浮士德式的浪漫主義傳統，那麼，無名氏先生就是一個典型的浪漫主義騎士和英雄。

但終於，一顆浪漫的心終止了它的追求與搏動，10月6日晚上他吐血入院，11日不治而亡，在他的簡陋的房間裏，桌上堆滿了他正在修訂的無名書稿，安放着他準備於14日動身去內地簽訂拍攝《塔裏的女人》的計劃。尉天驄教授在《記無名氏的逝前日子》中，忠實記錄了無名氏生命的最後日子裏如何在貧病交加中掙扎的慘狀，但是在旁人未及嘆息時，無名氏已經發出了爽朗的笑聲，他去世前還在病榻上與朋友大談王陽明和王船山如何在困居中著書立說，他還對尉天驄教授說到了藝術大師林風眠，他說，一個人要自持尊嚴，第一要耐得住窮，第二要一切都放得開。林風眠曾經為

了保持尊嚴而辭去一切社會職務，退出名利場，隱居杭州鄉下。當年無名氏去看望他，只見到一間小小農舍，一床一桌一椅，自己撿柴燒飯，而不以為苦。這種情況下他的畫愈來愈單純，單純到只剩下一些線條與水墨，幾乎沒有多少色彩，然而就在這單純中，他感到那麼有勁、那麼平實、那麼和諧的生命力。「文革」時，林風眠面對着紅衛兵燒毀他的一千多幅藝術品時，才顯現得那麼寬容和不在乎。我不知道無名氏在病中描述的林風眠是不是一個真實的林風眠，無名氏過去寫過一篇有名的散文《豹籠大師》，記敘林風眠在「文革」中精神分裂的慘像，猶如裏爾克筆下的那頭豹子：「他的視力因柵木晃來晃去／而困乏，什麼再也看不見。」我以為在這時候無名氏重新解釋林風眠，是把自己也放入「籠中豹」的行列，把他自己生命的最後的搏動，不自覺地融入了羅丹、裏爾克、林風眠等藝術大師們的偉大旋律。

無名氏先生在生前一直希望我為他寫點文章，其實我是寫過的。1998年秋天我在韓國漢城大學任教，又一次通讀六卷《無名書》，為他寫過一篇萬餘字的論《無名書》的文章，對於峻峭奇異的風格作了很高的評價。至今為止我仍然自以為對無名氏的創作風格與藝術體驗是理解的，並在評論中融入了我自己對生命的理解。文章寫成後在內地和台灣都發表過，但無名氏似乎並不滿意，於是他希望我重新再寫，並且多次與我討論我在文章裏關於他的語言風格、烏托邦理想等問題的評價。現在先生已經遠離我而去，我寫再多紀念他的文章，他也不會再讀、再與我爭辯了。但無論如何，我覺得無名氏先生是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的一個奇人，他的《無名書》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會愈來愈公

正地意識到這一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去認真地做。

2002 年 12 月 4 日於黑水齋

獨秀峰下的風景

——告別鄭超麟先生

98歲的鄭超麟老人去世了，上海又少了一道文化的風景線。當然，用風景來形容老人的存在未必妥當，他本來就像一棵參天的大樹，以枝繁葉茂的光合作用，清潔着這個城市的空氣。

我所居住的上海，每天都有新的高樓落成，一些繁華的地區和馬路，只要半年不去走走，就會生出「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幻覺。可是光靠摩天樓和交易所，支撐不起一個國際大都市的文化形象；而且，標誌一個城市文化風景的，也不僅僅是一些廣場建築和歌劇院，真正的文化風景應該是看這個城市曾經擁有過怎樣的文化人物。我走在日本東京的街上，常常看到一些並不起眼的建築物前豎着一塊木牌，上面告訴你這是夏目漱石或者國木田獨步的舊居，讓你頓時眼睛一亮，彷彿是走在一條樸素的地毯上，上面卻嵌滿了名貴的珠寶。一個城市的建築是可以用錢來修建的，但文化人物的擁有，卻是需要天然而成。國內外的遊客來到這個城市，想到的是能夠拜訪、瞻仰某些文化人物，或者滿懷敬意地為自己走在自己所敬仰的人所居住的城市裏而充滿自豪，這樣的城市，才是真的讓人羨慕的城市，才當得起文化名城的稱號。

鄭超麟老人曾經是上海的一道令人敬慕的文化風景。這不僅僅是他活到高齡，而是他身上有着一種為信仰而獻身的革命氣質。他

為這座城市流過血，坐過牢，監獄生涯長達 34 年，比世界著名的革命家布朗基的坐牢史還多了一年，但在 19 年前他平反出獄後，仍然懷着一個革命家「走出監獄便入研究室」的理想，馬上就着手撰寫有關中國革命史的回憶錄和長篇學術論文，以求正本清源。我第一次接觸鄭老的文章，是在 1989 年初，那時我在《上海文論》上主持「重寫文學史」專欄，有人轉給我一篇鄭老的文章，是討論瞿秋白與托洛茨基思想的關係，思路清晰，引經據典，長達一萬六七千字。除了字跡顫抖，根本看不出是一個近 90 歲高齡的老人所寫。當時我極想發表這篇稿子，但送審時終因我們欄目是「重寫文學史」而非重寫黨史，未能面世。但這篇論文的磅礴氣勢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雖然我對這位老人充滿敬意，但在幫助他發表文稿方面卻無能為力。還有一次是我在主編《火鳳凰文庫》的時候，鄭老的侄孫女曾與我聯繫，想出版老人的回憶錄，這時我已經不像當年主持「重寫文學史」專欄時那樣天真和以善良看世了，我主動提出可以出版老人的書，但希望是文學方面的文字，不要涉及政治。我說出這話時充滿羞愧，但也悄悄希望老人能理解我的准風月談之意，可是過幾天得到回音，鄭老說他只有政治方面的著作，所以也就作罷了。之後，鄭老的回憶錄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還在海外譯成各種文字，我又開始天真地想讓自己在上海也為老人出版一部著作，洗刷一下這座城市在文化領域的平庸之恥，可是，老人突然去世了，他對他所居住的城市連眼珠也不想轉過來。

我只見過老人一面，是與寫作《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的作者王觀泉先生一起去的，同去的好像還有幾位年輕朋友。那時老人住在普陀區的一套小居室裏，我們敲了半天的門，竟無人

開門，直到他的侄孫女回來，才把我們迎進去。原來老人的耳朵幾乎全聾，怎麼敲門也聽不見。我第一次與老人見面了，報出了自己的名字，沒想到老人的眼睛立刻亮起來，彷彿見着老熟人一樣，嘴裏吐出一個字：「周——」，我立刻明白，幾年前將《翟秋白與托洛茨基》的稿子轉交給我的正是一位姓周的朋友，他向老人說起過我。那天主要是王觀泉先生與老人談話，我只是在一旁靜聽，我還為老人照了一張照片，後來發表在台灣業強版的《陳獨秀傳》上，他們如此親密地交談，彷彿是兩個革命家在密謀一場革命。

這位老人晚年的日子好過了一些，因為 1997 年中央電視台拍攝一部鄧小平的傳記片，要找當年與鄧小平一起留法勤工儉學的同行，大約老人是碩果僅存了。電視不但採訪了老人，出現了他的回憶鏡頭，而且聽說還由他提供線索找到了當年鄧小平在上海的辦公地點。這以後，老人的名字似乎被這個城市接納了。第一個信號是，他被安排搬到了比較好的居所，但還沒有來得及看到第二個信號，老人便與世長辭了。

老人的追悼會因日期突然被人為地提前，我未能前去參加，特地撰寫了一副輓聯送去：

身隱獨秀山峰仰俯天堂人世皆無私自愧
心念共產事業存亡監獄書齋盡是託孤心

這副輓聯起初寫的時候未經推敲，字句與上面的有些不同，但送去後據說不讓掛出來，所以等於沒有發表，現在經修改後抄在這裏，也算是我對老人的一點紀念。

從此，我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會覺得少了一點什麼，但又會感到滿足，因為又一個英魂與這個城市同在了。

1998 年 8 月 5 日於黑水齋

紀念柯靈先生



柯靈先生駕鶴西行不覺已近周年。春節前，上海書店出版社鄭曉方女士來電，說書店有意出版一本柯靈先生生平畫冊，¹柯夫人病在醫院，囑我來做一些構思與文字工作。我當然不能推辭。回想起來，雖然柯靈先生是我私心仰慕的世紀老人之一，柯靈先生的晚年散文也是我反覆閱讀的藝術珍品；雖然我與柯靈先生同住上海，經常會匆匆走過復興西路的柯府門前，卻，因為怕無端驚動老人的安靜生活而不敢輕易登門。只有一次，為了籌備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事，才與幾位籌辦人一起登門拜見老人，也是小坐即起。柯靈先生德高望重，對後輩青年的提攜極為熱忱，若有所求，總是竭力相助唯恐不能盡心，像這樣的老人，平時要去拜見並不困難，只是我私自拘謹才失去了親聆長者坐而論道、以沐春風夏雨的機會。老人仙去以後，我一直在尋求某種補償的方式，以期能進一步發揚老人一生為之奮鬥不止的精神傳統，所以，承擔這部畫傳的文字工作，正是我所渴望的。

1. 陳思和編：《墨磨人生——柯靈畫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本文為畫傳的編後記。

說起來也覺得羞辱。我最早知道柯靈先生的名字，正是他編劇的電影《不夜城》遭受野蠻批判的時候。中國內地的電影發展到五六十年代之交時，有一批好作品問世，雖難免有意識形態的污染，但藝術上的醇厚精緻陶醉了一大批電影愛好者。比如《林家鋪子》、《早春二月》、《青春之歌》、《不夜城》、《舞台姐妹》等，名編名導名演雲集，至今看來也是中國電影史上不可抹殺的經典。可惜當時文藝界極「左」思潮已經是群魔亂舞，「兩個批示」如烏雲壓頂，許多藝術家良知未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好不容易拍出一流的好作品，剛出籠就遭滅頂之災，有些甚至尚在剪輯中就已經被責令送審批判，作反面教材。但我不知道是誰出的主意，「文革」初期的上海，就在摧殘文藝最瘋狂的時候，突然流行起看批判電影的熱潮，凡是報紙上被點名批判的電影作品，輪流在電影院裏放映，放映時有畫外音，每遇到被認為有「問題」的鏡頭，就用粗俗不堪的大批判來「消毒」。這樣一來，雖然有些煞風景，總算讓觀眾開了眼，原來毒草電影都有那麼高的藝術水平，有那麼多優秀藝術家的精湛表演。那時候的上海，沒有股票可炒，沒有網絡可上，沒有麥當勞可吃，也沒有什麼「吧」可泡，轟隆隆的樣板戲又像隔夜餛飩飯小菜令人倒足胃口，結果是，街上流行看批判電影。上海人向來喜歡苦中作樂，倒賣、交換批判電影票也流行一時，像交換毛澤東像章一樣熱鬧非凡。我那時不過十三四歲，一次次幸福地在電影院裏流連忘返，欣賞到趙丹、孫道臨、顧也魯、謝芳、康泰、吳茵、謝添等名演員的風采，台上的畫外音哇哇亂叫，周圍的觀眾卻

在私下裏嘖嘖讚賞不已，同時我也就記住了炮製「大毒草」《不夜城》的柯靈先生的名字。

這樣一個「文革」現象到現在還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文藝界的政治大批判對作家藝術家來說固然殘酷之極，許多人為此家破人亡；但從中國民間的立場來說，老百姓向來有自己的判斷，即使在報紙上點名批判，作家藝術家在民間受到的尊敬並沒有消失，只是曲折地、變相地存在而已。但很奇怪的是，看了別的批判電影我一般只記住了演員和導演的名字，唯獨在看了《不夜城》後，編劇柯靈先生的名字牢牢楔入了我的腦子，也許是批判《不夜城》時柯靈先生受害最烈，但更主要的是，《不夜城》一劇在階級鬥爭穢氣沖天時刻宛如一道清風拂面溫馨誘人，讓人感受到烏托邦理想的可愛之處（儘管理想本身已經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

「文革」以後，柯靈先生的文章達到了峰巒之巔，一是文字的精緻清雅，二是立意的高調登極。近 20 年中國內地的散文泛濫，往往大而化之，名家是涉筆成趣，但隨筆卻成了隨便下筆；更有流行於網絡的痞子文風，語不成語，句不成句，都成了一時的風氣。然而柯靈先生卻以精雕細琢的態度來鍛文煉句，幾乎每一句出，均有千錘百煉之功，他自稱文字生涯為「煮字」為「墨磨人」，一個「煮」字一個「磨」字，均有辛苦道出。柯夫人曾介紹柯靈先生為寫影評，在電影院裏打着手電記錄劇情的動人細節。我親身所感的是，有一年我為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策劃《巴金對你說》畫冊，曾請柯靈先生作序，我本人未登門，是出版社的編輯去請求的，柯老一口答應，不久就寫了一篇序文。我編那本畫冊也是花了大力氣，透過圖片和說明文字，熔鑄了我對巴金老人的獨特理解，等美編與

我一起拿出了最後的圖稿和清樣後，又一次送到柯靈先生的面前，他認真看後竟提出要收回原來寫的序文，因為畫冊的構思與意境激發了他新的創意，結果他幾乎將序文全部重寫，成就了一篇情思並茂的美文絕唱。

一般來講，講究雕琢的文章格局總是嫌小，而柯靈先生的文字是天地立心之言，精美中見宇宙般的浩大。那就是立意的高，品格的高。「文革」剛過，他握筆著文，一篇《阿波羅降臨人世》的鴻文，以大自然四季運作起興，以歌德的詩歌終結，從希臘神話講到人類歷史，從法西斯狂瀾聯想到「文革」浩劫，真是氣象萬千，似真似幻，放在批判「文革」的血淚文字中，幾乎是奇文又是美文，獨一無二。再讀他的那篇《促膝閒話鍾書君》，論的是文化崑崙錢鍾書，卻是從一代知識分子與時代的關係說起，講世界性政治地圖重分，講核子時代的物質文明燦爛，看似閒草野花，然而把一個書齋裏的錢鍾書有血有肉地放到了時代的大背景中加以評騭，錢氏學問的意義有了新的光彩。我覺得錢氏身後謬托知己的文章多如牛毛，至今也沒有一篇能超過柯靈先生的這篇文章。

品格之高不僅僅表現在柯靈先生獨上層樓的境界，還在於他晚年的人格裏自覺迸發出知識分子的良知火花。柯靈先生從1930年代起就在上海生活，長期活躍在左翼文化的邊緣地帶，歷經影劇、編輯、文學三棲生涯，市樓獨唱，直面了上海的繁華頹靡，在溝通左翼思想與市民精神方面起到了非其莫屬的重要作用。上海淪陷期間，柯靈先生以一份市民文學雜誌《萬象》崛起於民間，巧妙利用大眾品味，發表進步作家作品，伸張淪陷區裏的正氣，在抗日與事偽之間開闢出一片文化的中間地帶，使民間土壤滋生了一批極為優

秀的作家和優美的文學作品。經過「文革」滄桑，他率先反省左翼思潮的歷史偏見，第一次客觀評價張愛玲、梁實秋等流亡海外作家的功過是非，為他們遭到的歪曲與冷遇伸張正義，還他們在文學史上的應有地位，可以說是扭轉了一個時代的風氣。在上海，人們心目中的柯靈先生的地位僅次於巴金老人。當巴金老人晚年大聲疾呼反思慘史，上海的老一輩知識分子中，柯靈先生、西彥先生是響應最熱烈的兩位，他倆一個寫精美散文，一個寫悲壯回憶，可以說是《隨想錄》的交響樂。柯靈先生的《回看血淚相和流》與巴金老人的《懷念蕭珊》一樣，是不朽的血淚文字。他的許多雜文和散文中，處處閃爍了對《隨想錄》的應和。在對待世界的態度上，西彥先生冷峻嚴厲，常以達世抗世情；而柯靈先生溫和圓通，他孜孜不倦地為社會公益作出奉獻，從而得到過社會回報的各種榮譽。但我想，如果認真閱讀柯靈先生的散文，最感人的還是他對社會的那份真正的憂患意識與批判意識，這是一個在「五四」傳統照耀下的中國知識分子最不能少的高貴品格。

三

關於《墨磨人生——柯靈畫傳》的編輯工作，本來我是應該做一份約五萬字的柯靈傳記，配以二百多幅反映柯老生平的圖片。但就我現在所掌握的傳記資料和擁有的時間來看，顯然是無法寫出比較全面的柯靈先生的評傳。幸好這項工作已經有前輩在做，即將問世。所以我在徵得柯夫人的同意後，從柯靈先生的作品中，輯錄出有關生平故事語錄數萬言，構成一部「柯靈自述」，分《鄉土情結》、《銀海浮沉》、《煮字生涯》、《民主呼聲》、《阿波羅來去》、

《長相思》、《結緣》、《屐齒留痕》八輯，囊括柯老生平與創作兩個方面。老人的人生是錚錚鐵骨的人生，老人的文字是美輪美奐的文字，我從中發揮的僅是裁縫做百衲衣的拼接技術，但也容納了我對柯靈先生的真實感受和理解，希望這樣的闡釋沒有離開老人在廣大讀者心目中的形象太遠。

2001年4月14日於黑水齋

傅雷的精神遺產

今年是傅雷先生的百年誕辰，我首先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傅雷先生留給今天的我們究竟是一份怎樣的精神遺產？我是 1950 年代出生的，並且親身經歷過讓我們失去傅雷先生的那一個特別的年代。與我年齡相近的這一代人，或者比我更年輕的一代人，大約都知道傅雷先生這個名字，因為我們讀過傅雷先生翻譯的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作品。我們讀過許多優秀外國文學作品，往往記住了作家的名字而忘記了譯者，可是我們都不會忘記傅雷，這個名字與巴爾扎克、羅曼·羅蘭在中國引起的感動緊緊聯繫在一起。不僅如此，當時代變化得更加年輕的一代人已經不流行閱讀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的時候，他們還是知道傅雷這個名字，他們從一本非常流行的讀物《傅雷家書》中認識了傅雷先生，那些不熟悉或者不喜歡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的青年人，卻不能不感動於《傅雷家書》裏那些充滿藝術靈動的修身養性的教導。

我沒有幸運見過傅雷先生，大概比我年輕的人都沒有見過傅雷。但是我們這代人聽到這個名字時心靈都會震動。上海作家陳村

* 本章是 2008 年 4 月 8 日在傅雷百年誕辰紀念大會上的發言，後根據錄音整理成文。

在二十多年前寫過一篇小說，題目叫做《死》，他以非常個人化的方式召喚了傅雷先生的亡靈，作家與亡靈進行艱難的對話，他用責問亡靈的形式來探討傅雷先生為什麼會如此決絕地放棄他一生摯愛的藝術。小說裏的亡靈始終沉默不語，但作家卻由此感悟到：「先生善良但遠不弱小，那燦爛輝煌的死，使活着的人覺得生的暗淡。」我今天又一次想到了這句讓人刻骨銘心的話。我們都是活着的人，但是正直而善良、崇高而堅強的傅雷先生的決絕選擇，逼着我們所有的人每想起此都會陷於嚴肅的反省：人生為什麼會如此暗淡？

但畢竟還是有比這個答案更加積極的含義。首先，傅雷先生是一個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翻譯的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約翰·克利斯朵夫》，都是充滿了英雄主義的偉大信念，羅曼·羅蘭認為：所謂英雄，並非是以思想或強力稱雄的人，而只是心靈偉大的人。英雄的個人生涯，幾乎都是一種長期的受難歷程，是悲慘的命運把他們的靈魂在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中折磨，在貧窮與疾病的鐵砧上鍛煉，或者目擊同胞受着無名的羞辱與劫難，生活為之戮害，內心為之破裂。他們永遠過着磨難的日子，他們固然由於毅力而成為偉大，可是也由於災患而成為偉大。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的思想，完全是針對了19世紀末歐洲的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高度發展造成的物質膨脹而精神缺失的普遍現象。所以他在《貝多芬傳》裏用黃鐘大呂的聲音呼喊：「打開窗子吧！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呼吸一下英雄們的氣息！」這一激動人心的呼喊，是通過傅雷先生的流暢的譯筆傳入了中國，在中國青年中間同樣引起了激動人心的迴響。

應該指出的是，傅雷先生是一個對待人生非常嚴肅的人。他始終認為，一個優秀的翻譯家必須選擇適合自己的作品來翻譯，這個「譯者選擇論」保證了中國譯者與西方作家之間的同構性和互補性。傅雷一生以翻譯巴爾扎克聞名於譯壇，但是他從巴爾扎克的一百多種《人間喜劇》裏僅僅選擇了 15 部作品，推薦給中國的讀者，其餘的作品他都認為不合適介紹到中國來。儘管傅雷先生的這種選擇論在當時和現在都引起過爭議，他還是真誠地表達了一個翻譯工作者的人生與藝術高度統一的責任感。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的呼喚，理解為傅雷先生對中國青年人所發出的真誠的精神呼喚。羅曼·羅蘭的聲音也就是傅雷的聲音。所以，當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等西方英雄深深激動了大批中國青年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是傅雷先生的神聖而莊嚴的工作，激動了大批的中國青年。而且，這樣一種崇尚偉大心靈的精神，也是傅雷先生嚴於律己的標準之一。我讀傅雷先生給遠在異國的兒子傅聰的信件裏就有這樣的話：「生活中崇高的事物，一旦出自庸人之口，也可變得俗不堪的。」對於藝術，他強調要有赤子之心：「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獨的。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創造許多心靈的朋友！永遠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會落伍，永遠能夠與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藝術表現的動人，一定是從心靈的純潔來的！」我之所以要引用這麼長的一些話，因為我堅信，即使在今天的環境裏，傅雷先生所強調的英雄精神，仍然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貴的。

其次，傅雷先生對中國現代文藝的建設與貢獻是多方面的，雖然他以翻譯法國文學而著名，但是他的藝術修養和人格修養都是多

方面的。1928年傅雷到法國留學，主修西方美術史，他拜訪過法國野獸派代表畫家馬蒂斯（Henri Matisse）和阿爾培·裴那，研究過著名藝術家塞尚（Paul Cézanne）、羅丹（Auguste Rodin）、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後來他受羅曼·羅蘭影響，對西方音樂產生濃厚的興趣，對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音樂大師的作品都有精深研究；他翻譯的法國文學史家丹納（Hippolyte Taine）的《藝術哲學》，幾乎涉及到全面的西方藝術門類，顯示了譯者多方面的修養；中年以後，傅雷有機會接觸當代老畫家黃賓虹先生的作品，非常喜歡，遂與畫家結成忘年之交，他對黃賓虹的藝術作品作了極為精湛的解讀。傅雷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厚積薄發，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的當代文學藝術大師，我想是當之無愧的；更何況，傅雷先生還是一個熱烈的愛國者，他對風雨飄搖中的中國局勢、政治變動，以及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感，似乎方方面面都努力去關心、去發言，盡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儘管他在這方面做得不十分理想和圓滿，但他確實是盡了力，並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首先是完成了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格，然後才去培養各種各樣的興趣，從事各種各樣的研究和工作，這樣，他才可能在從事每一件工作時都認真地投入自己的生命信息，並且做出出色的成績。所以，我想，稱傅雷先生是一個偉大的翻譯家不夠全面，正如他教導他的兒子所說的：「先為人，次為藝術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我們對傅雷先生的認識，應該是：「先為人，次為知識分子，再為藝術家，終為翻譯家。」大寫的人格，始終是傅雷先生做人立德的標誌。

傅雷先生的胸襟非常寬闊，他一生中遇到過兩次大逆境，第一次是 1939 年到 1945 年間，他蟄居在抗戰時期的孤島與淪陷的上海，閉門不出，埋頭譯書，完成了《約翰·克利斯朵夫》等巨著的翻譯；第二次是 1958 年到 1962 年，他深居簡出，逆境譯書，在並無希望出版的情況下，完成了一大批巴爾扎克的作品及丹納《藝術哲學》翻譯，迎來了生命晚期的一個創造高峰。但這並不是說，傅雷先生是一個不問天下事、埋頭於藝術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始終把藝術創造看作民族復興大事業的人，即使在逆境來臨的時候，有了這樣的大胸懷大志業，他才會無所畏懼，從容不迫，仍然把自己的生命與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聯繫在一起，履行自己的使命。他曾經用詩一樣的語言教育自己的孩子：「河，萊因，江聲浩蕩……鐘聲複起，天已黎明……中國正到了『復旦』的黎明時期，但願你做中國的——新中國的——鐘聲，響遍世界，響遍每個人的心！滔滔不絕的流水，流到每個人的心坎裏去，把大家都帶着，跟你一塊到無邊無岸的音響的海洋中去吧！」

在這詩的語言中，傅雷先生把音樂、世界、中國、歐洲、人和人心，都如同滔滔大海漫瀾於天地，形成了浩浩蕩蕩的人類文化的奇景，給人振奮與向上。我想，這應該是傅雷先生留給我們的真正的精神遺產。

第三輯



沈謙先生

元旦才過了兩天，早上突然接到許俊雅教授的來電，先是驚訝她的嗓音完全沙啞，還未及作新年問候，就更驚愕於她的直言相告，沈謙先生於前天去世。一時無言。我與許教授的認識，緣於沈先生的介紹，也許她也想到了這一層意思，才一大早用電話把噩耗告訴我。一時忙亂。原來的計劃全部打亂了，忽而想起沈謙先生的什麼著述，找了半天，找出來隨便翻兩頁也無心再讀，忽而又想起當年沈謙陪我參觀林語堂故居時送我的演講錄音帶，東翻西尋，就是不見了，真是物隨人去。那是他在林語堂故居的一份演講，講的是林語堂的幽默，講到結束時引用了林的原話，說精彩的演講要像女人的裙子，愈短愈好，就此結束。人生豈不也是如此，精彩的人生總是很短促、很性感，像女人的裙子。沈謙先生，享年 58 歲，在新年元旦的晚上倒下。

午飯過後，才想起忙亂了一上午的意圖，是為了寫一些紀念沈謙的文字。近日來興意闌珊，恍恍惚惚的，原來打算要做的事情一件也沒有做完，總是提不起寫字作文的興趣。可是聽到了早上這個電話卻突然有了寫作的衝動，關於沈謙，我是有許多話可以說的。前面說過我在上午翻閱了他的書，是一本講修辭學的著作，厚厚的一大本，打開第一頁就有他的妙語：

曾經與朋友討論：

中華民族是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這個問題很耐人尋味，也很難回答。但是我們卻可以說：

中華民族是不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我們不知道，因為沒有經過客觀的研究，分析，比較，不可能達成一致的結論。但是，無可置疑的，中華民族有兩樣絕活——美食和美辭，被公認為世界第一，卻是不爭的事實！

至於中華民族的優點是否為美辭與美食，我也無從談起，但這份「兼美」在沈謙先生的身上卻是不爭的事實。我結識他，還是在八年前，他在台灣空中大學任教的時候，一開始就被他說話的熱情、詞章的華麗、知識的淵博所折服，他平時講話就妙語如珠，講起課來更是大珠小珠落玉盤，天女散花，滿堂彌香。記得有一次他來復旦參加研究生的論文答辯，日程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上午是論文答辯，下午五點多的飛機回台灣；中午宴請的時候，我臨時知道沈先生下午還加出一場對學生的公開演講，我大吃一驚，建議他取消演講，下午可以輕鬆休息，但他還是願意去演講，並且從二點講到三點半，一個半鐘點，教室裏笑聲不斷，效果最佳時猛然剎車，再取了行李直奔機場，學生們可能還沉醉在餘韻繞梁的精神享受之際，他已經在天上飛行了。這是何等的瀟灑！

沈謙的美辭，有著述為證，毋須我的贅述。但他的美食，曾賜以我私人的實惠，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沈謙自言出身微寒，青年時代食物並不豐盛，所以人及中年以後，偏喜好美食，配以妙語連珠的素養，美食成為他的一種文化上的炫耀，也是人生的一大賞心樂事。相傳他一次回內地探親，在蘇州品嚐到陽澄湖的無腸公子

大閘蟹，愛不釋手，特地託朋友煮熟了十多隻，薑酒調料，一併攜帶回台灣準備犒勞家人。不料在台北機場入境時被海關卡住，熟食照例是不能過關的，他一時性起，在機場入關口地鋪一張報紙，取出蟹、酒、調料，罵罵咧咧，借酒消愁，一氣居然把清蒸大閘蟹全部吃到肚子裏去了。在我的食物觀念裏，大閘蟹是高蛋白食物，一隻足以夠味，兩隻已經滿腹，曾聽說友人在香港能一連吃四隻大閘蟹，驚得咋舌，但自從有了沈謙先生海關大戰群蟹之舉，人類在美食領域的一切奇蹟都不稱奇。可惜我與他相熟時，他似乎患了痛風病（或是高血脂，我記不清了），不能多吃海鮮等食品，無法窺見當年的豪情壯舉了。一次他在台北請我去一家很考究的海鮮酒家品嚐鮑魚，但他自己不能吃，他說每個月總要請他太太來這裏品嚐一次，順便也詳細介紹了鮑魚的品種及與台灣政要的關係等，繪聲繪色的神態我至今不忘。那個時候，沈謙先生儼然成了一位品味專業的美食家。

我有一種偏見，所謂美食家，固然是饕餮之徒，固然與饑和貪吃分不開，不饑不貪，僅僅以生存、果腹、營養、健康為吃食宗旨的人，不可能領會美味佳餚的好處。但美食家也不應該僅僅是一個好胃口的人，像樊噲之流，只能算一個會吃能吃的人，但與美食家無涉。真正的美食家是用他的精神舌蕾和藝術想像來領會美食的精妙絕倫，這才算得上食文化。古希臘的聖人在會飲盛宴時，不談食神談愛神，可謂是食色融為一體，也稱一奇；而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卻是將食色並舉，為人性的至要，但美食與性感一樣，不是以生理功能是否強健為標誌，而是需要有純粹的藝術審美的趣味與能力，進入精神享受的美食家是不能縱容自己口腹之欲的。以此為計，

染有小恙權當自我限制倒是有利於更好的品味美食，淺嚐輒止，為精神舌蕾的想像提供充分的空間。我理解的美食家，就是這樣一種人。沈謙先生後來多次來上海，因為痛風什麼的病，點菜總是點新鮮蔬菜，有一年早春三月，他點名要品嚐江南剛剛上市的雞毛菜，碧綠鮮嫩的小菜，恰似江南小家碧玉，滑潤凝脂，滿口噙香。文人雅興由此而起，所謂秀色可餐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可餐者，秀色也。

沈謙先生早年治學《文心雕龍》，後從事修辭和現代文學批評，著述等身，卻不知道有沒有美食的文字留下。我想應該是有，記得一次與他同席吃飯，不知怎的扯到食魚，我例舉江南 12 月各有魚鮮可食，他立刻囑我記錄下來，說回去能寫一篇好文章。不知他後來寫了沒有，但以沈謙先生的美辭寫美食，定是絕妙之好辭。現在沈謙先生瀟灑瀟灑地走了，與他所喜愛的林語堂、蕭伯納坐而論道去了，但我們有誰能夠把這些兼美妙文收集成書，以惠來者，告訴他們什麼是美辭、什麼是雅興、什麼是淵博、什麼是瀟灑，我想，沈謙如在天上獲知，一定會發出朗朗笑聲的。

2006 年 1 月 4 日寫於黑水齋

耀德不見了，文學衰落了

整整 18 年了。不記得 1996 年 1 月的哪一天，在香港中文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晚宴上，忽然小思起身離席，到邊上去接一個電話，重新出現時她臉色大變，高聲地說：「林耀德死了！」我呆若木雞，頭腦空白，怎麼也想不起這個信息傳遞的是什麼？「林、耀、德，死了！」小思大聲地叫喊。我還是反應不過來……說的是什麼意思？一個生龍活虎的生命，一個世紀末文壇上的哈雷彗星，中國老文化的沉沉黑暗中一道閃電霹靂，就這樣消失了？這意味着什麼？

18 年過去了。這是王寶釧苦守寒窯，用張愛玲的話說就是從一個鮮活美女變成冰箱裏的魚的年頭。也許現在很少有青年人讀林耀德的書，媒體上也很少提起這個名字，畢竟那是一個還沒有網絡資訊、多媒體、手機微信的時代。林耀德的傳播工具，還是依靠出版一本一本書、策劃一個一個的專輯、舉辦一次一次的會議……刀耕火種啊，傳播工具瞬息萬變，時代也就跟着變了。林耀德的名字本來最應該與新媒體緊密聯繫在一起，高科技電腦字符科幻遊戲動漫異次元……這個名字在其間像幽靈般的活躍而穿梭不息，但是俱往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然而「林耀德」三個字，已經榮歸文學史了。這是誰也想不到的，古老的文學史冊裏靜靜地躺着林耀德的遺體。

那麼，我們就來討論林耀德的文學史的意義吧。也許，這個風火輪般的生命，博大而精明，凌厲而機智，呼嘯而來又滿載而歸，稍縱即逝卻意義深遠，命運早已安排了我們在 18 年後的今天舊事重提。畢竟，在一個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時代，偉大的生命不是靠血緣的遺傳，也不是靠宗派的傳人，而是在一代一代的批評和闡釋中——證明我們沒有健忘——得以延續血脈和精魂。

「新世代」的誕生

林耀德的文學行當，不僅僅是書寫，當然書寫是他的天才創作力的證明，但是從文學史的發展來說，上世紀 80 年代的台灣文學及內地文學都處在發展的瓶頸口上。一方面是專制體制行將崩潰民主聲音泛濫而起的社會大變局前夜，一方面文學觀念和美學觀念都逐漸脫離傳統的藩籬走向多元化、私人化及市場化，現代主義的精英文學一統天下也將隨之土崩瓦解，文學竭力要擺脫政治權力的扶植而獨立，緊接着又朝邊緣迅速滑坡。獨立 / 滑坡是雙向運動，考驗着一切有志於文學者，不僅推動文學與社會的同步進程，還要拯救自己、拯救文學的尊嚴。這個文化狀態，我稱之為「無名」的狀態，時代再也沒有一個足以號令天下的「共名」來制約文化思想的發展，眾聲喧嘩是這個時代的特徵。

正因為是一個熙熙攘攘、誰也顧不了誰的混亂時代，連交響樂也定不了音，文學的新生者已經無法像傳統的成長模式那樣，依靠前輩恩師的提攜、門第血緣的遺傳或者一篇妙文定天下而獲得成功。個體的力量畢竟太渺小，集體奮鬥才能引起社會關注，產生壓倒他人、挑戰傳統的效果。在這樣的背景下考量林耀德的文學活

動，那麼，創作僅僅是他個人天才的一種表現，而真正貢獻於文學史的，在於他自覺地以代際形象出現的「新世代」的文學活動。林耀德橫空出世，既是藝術女神的召喚和授意，也是時代的推動使然。1949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主流基本上是「五四」新文學的橫向移植，現實主義的文學因素滲透到台灣本土傳統，形成了陳映真、黃春明為代表的鄉土文學的強大傳統（其歷史還可以追溯到賴和、楊逵、鐘理和、呂赫若等）；而另一條吮吸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營養的傳統，更加壯大了文學的抒情性和審美性，從「創世紀」、「藍星」，以及台灣外文系才子作家群開始發軔，形成了以白先勇、余光中等為代表的精英主義的抒情文學，代表了它的主流。但是到了1970年代鄉土文學大論戰以後，這種文學的均勢被打破，讀者的興奮點在迅速分化和轉移，本土勢力在崛起，後現代——稀奇古怪的多樣審美口味隨着市場化而出現，主流文學的兩股傳統都面臨挑戰，而新興的個人化的文學秀又難以布陣營造新的格局。林耀德當時才20歲出頭，是個名符其實的新秀。但他出現於文壇，不是把文學看作一個人的事業，1980年代開始，他不僅創作數量眾多，更加重要的是，他參與策劃了多卷本的《新世代小說大系》（12冊）、《台灣新世代詩人大系》（2冊）等大型書系，還策劃了「世紀末偏航——80年代台灣文學論」、「流行天下——當代台灣通俗文學論」等主題的學術論壇。這些活動，耀德都是與其他新世代作家一起合作進行的，合作者有小說家黃凡、詩人簡政珍、學者鄭明嫻、游喚等。不僅如此，當時林耀德的背後還有一個台灣青年作家協會在運作，1990年代初，他兩次邀請我去台灣參加學術會議，都是以這個協會的名義進行的。在《新世代小說大系》裏，一共收入了101位作家的133篇作品，並且給以「新世代」一個寬泛的新

定義：「所謂『新世代』在未被確切定義前，是一個因時空轉移而產生相對詮釋的名詞。在此我們以出生序在 1949 年之後的小說家作為編選的主軸，並以四五年至四九年間出生者做為彈性對象，換言之，就是一般而言『戰後第三代』以降的小說作者群。地域方面的範疇顯然以台灣為核心。……我們採取的是文化視角而非泛政治化的血緣論，因此更無所謂『省籍』問題存在。」¹ 這個定義包容性極大，典型地反映了無名時代的特徵：所謂「新世代」不是以某種流派、宗旨、集團的面目出現，而是以「代際」的旗幟出現於文壇的，沒有流派，或者說，包容了一切流派、風格和藝術實驗，也理所當然地包括了通俗文學的類型小說——形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眾聲喧嘩的局面。《台灣新世代詩人大系》（兩卷）收集 24 位「新世代」詩人，標準與新世代小說家也基本相符，有：蘇紹連、簡政珍、馮青、杜十三、白靈、渡也、陳義芝、溫瑞安、方娥真、王添源、楊澤、陳黎、向陽、徐雁影、苦苓、羅智成、夏宇、黃智溶、初安民、林或、劉克襄、陳克華、林耀德、許晦之，都是 1949 年以後到 1960 年代初出生，風格也呈現出不同的傾向。林耀德指出：「『新世代』不宜做『單一流派』解，其實『新世代』中包含了現代主義、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和後現代等多元傾向。他們共同相對於台灣第一、二代詩人之處，在思維、形式、創作規模等各種層面的解放、重建與更新。」² 這些被入選的小說家和

1. 黃凡、林耀德：《新世代小說大系總序》，載《新世代小說大系》（台北：希代書版有限公司，1989 年）。
2. 林耀德：《新世代星空——台灣新世代詩人大系》編後記，載楊宗翰編《新世代星空（林耀德佚文選 I——批評卷）》（台北：天行社，2001 年），頁 20。

詩人，都是獨立於文壇的個體，他們的創作成功當然不依賴於別人的推選、介紹和歸入某個流派，但是經過了林耀德和他的合作者的努力和整合，作為「新世代」整整一個代際的力量顯現於文壇，意義就截然不同。

從年齡上說，林耀德在這個「代」的文學生力軍中屬偏小者，如果光憑個人的力量，他不僅難以在前輩傳統規範下標新立異，就是在同一個「代」裏也不佔優勢。但是他的聰慧過人之處就在於他敏銳感受到時代變遷之風，他發現了一個躁動於母腹行將臨世大哭大叫的新的文學生命體，他利用了這個機會，祭起了「新世代」的旗幟。這就是為什麼林耀德作為一個帶有鮮明的先鋒特徵的作家詩人，他不是以「先鋒」的排他性獨秀於文壇，而是用極為寬泛的概念來詮釋同時代人，包含了一個時代的五花八門的實驗。

以我對林耀德有限的了解，他之所以團結整整一個「代」來倡導文壇新風氣，並不是沒有假想敵人的，而他心目中要顛覆的正是當時佔着主流地位的老一輩的文學傳統——針對傳統的現實主義，他竭力提倡現代主義；針對傳統的現代主義，他竭力提倡後現代的包容主義；針對傳統的精英文學，他竭力融合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界限；針對傳統的文以載道的文學觀，他偏偏追求科幻、武俠、情色、暴力等亞文化因素在文學的實驗。林耀德的文學創作不是沒有源流可溯，他的文學追求有明顯的偏向性和選擇性，即從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流派中不佔主流的實驗文學，如羅門的現代主義詩風、王禎和的鄉土現代主義、七等生的畸零人的現代主義等邊緣地帶的文學傳統中獲得了傳承的合法性。但是要評價林耀德的文學史意義，首先不是他鮮明獨特的個人藝術風格，而是他作為一

個自覺的代際形象破舊立新、開創風氣的雄圖和實踐。這 101 位新世代作家，24 位新世代詩人，創作成就當然各有高低，但是在強大的主流文學傳統面前畢竟是散兵遊勇不成氣候，林耀德的突出的貢獻就把這批力量完整地整合起來，變成了一個「新世代」的陣營。林耀德的這種代際意識是極為自覺的，1989 年他和簡政珍（後來又加入了鄭明嫻等）頻繁討論、編撰新世代詩人大系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新世代」的觀點。更早的時間是 1986 年間，林耀德一人開設三個專欄，分別探討評介一批新詩人的作品，最後集成《一九四九以後》的評論集。他所選擇討論的 17 位詩人是：羅青（1948）、蘇紹連（1949）、杜十三（1950）、白靈（1951）、楊澤（1954）、向陽（1955）、羅智成（1955）、夏宇（1956）、歐團圓（1956）、焦桐（1956）、劉克襄（1957）、林彧（1957）、吳明興（1958）、陳克華（1961）、曾淑美（1962）、也駝（1963）、陳斐雯（1963），這可以看作是後來編輯「大系」的基礎工作。詩人名單還是有了變化，但是基本的定義還是如出一轍，均是指一個特定的年齡段而言。

林耀德定義「新世代」主要是着眼於 1980 年代台灣文學創作，「大系」還沒有包括 1990 年代以後在台灣文壇上大領風騷的舞鶴、丘妙津、紀大偉、洪凌等人，文壇怪才總是層出不窮，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兩套「大系」所囊括的新世代作家中，大部分都成為 1990 年代台灣文學的中堅力量，有了更大的發展和貢獻；同時，被遺漏的舞鶴等人的創作路子，基本上也未出「新世代」的範疇。這就顯示了兩套「大系」在文學史上的正典化的作用。林耀德去世後，各家的創作力量各自在發展，但似乎再也沒有「新世代」

的群體面貌呈現，沉浮各自，再也布不成陣。這對文學來說，它在緊接而至的洶湧澎湃的市場化的潮流中無力再佔據中心而成為中流砥柱，風流雲散也是必然的趨勢。

後現代創作的實踐

我們在討論了林耀德自我營造的「代際形象」以後，再回到他的創作本身來考量他的文學史意義，很多問題就不難理解。我知道，即使在林耀德生前，他作為一個文學新人的形象也遭到過許多非議。他也曾經為之感到沮喪。但是所謂「非議」大約也都是針對他作為代際形象的行為而言，似乎沒有人能夠否定林耀德在文學創作上的巨大才華。本文不想就他的創作風格展開討論，只是想把他的創作放置於文學史的發展中來考察其意義。林耀德的創作風格多樣多變，很難歸類具體的流派，但是有一個稱呼可以大致不差地模糊涵蓋，那就是耀德生前也屢屢使用的「後現代」創作。我們沒有必要照搬西方後現代理論的鼓吹家們似是而非的說法，其實耀德也未必是照本宣科地倡導後現代，他的創作風格及其實踐完全出於一種從體內急劇噴發而來的靈感，需要在文學生態下尋找一種合適寄寓的形式。林耀德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寫評論四維並舉闖入文壇，他幾乎在沒有清楚意識到自己應該成為一個什麼「家」的時候，已經形成了一種雜糅的藝術風格，把詩歌、散文、小說，甚至議論糅合為特殊的文體。他的後現代的綜合藝術，不僅表現於博採眾家之長吸取不同的流派藝術，還表現於無所不在的「破體」——我們如仔細分析耀德這一時期的作品，可以隨處找到一些詩歌不像詩歌、小說不像小說的文字，詩歌裏充滿散文化、散文裏滿溢着詩

意和敘事、小說成了詩意斷片和議論部落，甚至被用來當做自己的詩集或散文集的序跋，而他的評論又富有詩意和感性。沒有一個作家會像他那樣把自己當做一個魔術師，做着不斷變換文體的遊戲。

這樣的變幻文體，使他的文學創作保持了嚴肅文學的實驗性格調。林耀德從本質上是一個先鋒作家，善於在文體上進行大膽試驗，不斷出新；但是從純先鋒的角度來衡量，他的創作中也存在一些先天帶來的軟弱，他在政治上並不敏感，沒有使他的創作成為政治抗議的強烈呼聲，他的創作對於社會發展中的混亂面，偏重於化腐朽為神奇的藝術點金術，而不是正面的鞭辟入裏的人文批判。這就使他的先鋒精神打了折扣，他企圖以他極為豐富的形式主義來維護文學藝術的嚴肅性，企圖用一種集大成式的創作巨無霸來保證文學藝術的社會中心位置，努力誠可貴，但是作為文學藝術的精魂所在——人的自由精神的批判力量，一旦被有意無意地抽離，文學藝術就無法再佔據社會思想的中心，它被邊緣化是必然的結果。林耀德敏感到文學發展處於這樣一個瓶頸，他急於用他的方式來拯救文學擺脫艱難窒塞的處境，使文學繼續沿着嚴肅性純粹性往上提升發展。這是耀德的努力，也是他的貢獻於文學史意義的體現所在。

當這種西緒弗斯式的抗爭幾近陷於失敗之際，他也沒有放棄努力，反而充分利用了市場對文學的佔領，他的創作中另外一種因素：通俗文學的因素活躍起來。我前面說過，林耀德的創作是多重破體的樣板。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界限，也同各類文體界限一樣，被他完全消解。從林耀德創作《雙星浮沉錄》起，他就是一位寫科幻的高手，從科幻進入小說創作，自有較高的宇宙視野和想像力。後期創作裏，從科幻轉入了神魔類型的創作，包括在他參與策

劃的《新世代小說大系》裏包容了武俠、科幻、愛情、校園、神秘等通俗小說類型，與傳統文學的政治、心理、鄉野、都市、工商、戰爭等題材並列在一起，這些有新意的構思，都顯現了耀德在文學道路上的自覺的應變能力。林耀德屬兩岸文學家中比較早地意識到文學將發生大變化，市場衝擊會導致原來「五四」新文學劃定的嚴肅文學陣腳的崩潰，而從晚清小說就具有的隱藏着現代性因素的多元、通俗、市井的文學格局會捲土重來。這是林耀德文學活動的另一個內容，包括他策劃的學術研討會專題討論通俗文學問題。他顯然不是一個遷就市場推波助瀾的作家，而是努力用他的先鋒精神和多樣形式來提升通俗文類，竭盡可能地挖掘通俗文類的創意性。我們從《雙星浮沉錄》中所展示的人類（基爾星球）艱難生存的處境，便可以知道作家心存巨大悲憫同情之心。

可惜天妒奇才，耀德在他最活躍的文學階段，生命嘎然而止，永遠停格在文學史發展的拐彎角上，他留在了古典文學的最後那一站，但他的兩隻眼睛和一隻腳已經轉向了後現代多媒體網絡資訊時代的邊境。耀德所有的創作和實踐的努力，都對未來的文學發展具有啟示意義。今天兩岸文學都被市場大浪推向邊緣化，都面臨了嚴肅文學傳統的更新及與通俗文學（網絡文學）的彌合，而耀德卻一躍而過，在遙遙星空回顧着我們今天的掙扎和努力。

2013 年 12 月 19 日寫於魚焦了齋

《曾敏之評傳》序¹

1988年4月我第一次去香港，先是陪我導師賈植芳先生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接着自己又留下來，在英文系作了四個月的訪問學者，主要工作是搜集1950年以來香港和台灣文學領域傳播和介紹西方文學的資料。那時候兩岸關係還處於對峙狀態，去台灣作研究絕無可能，所以轉到香港去找材料，間接地做研究。研究主要課題之餘，偶爾關注到香港文學本身的情況。有一位新華社工作的先生聽說我在大學作研究，就主動來訪，約我為新華社寫一份關於香港文學的研究報告，說是新華社要為九七回歸做準備，編一本有關香港各界綜述的小冊子。因為我是外來作研究的，與香港文壇沒有關係，可以寫得客觀一些。我見這位先生思想很開放，態度很誠懇，就答應了下來。為此我採訪了一些作家。當時香港尚未回歸，形勢複雜，九七回歸被一些人視為大限，紛紛移民加拿大，太空人（指太太出國的）滿街走，人心惶惶不安。問及香港文學，都說文壇上派系林立，左右爭論激烈，連作家協會組織都有兩個，其中有左右之分。於是冒昧地問：那麼左派是誰？右派又是誰？得到的回答好像也不得要領。但問過多次，有一個名字則是被重複多次，那就是

本章原刊於陸士清：《曾敏之評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香港《文匯報》的老總曾敏之，曾敏之是文壇左派的領軍人物。但是那年我先後訪問了多位香港老作家，唯獨找不到機會訪問曾先生，心裏一直留下了遺憾。

給新華社的那份報告也沒有留下底稿，好像主要是談了如何正確看待 1950 年代的「美元文化」、西方現代文學思潮，以及通俗文學等問題，為此我也翻閱了《文藝新潮》、《好望角》、《中國學生周報》、《香港時報》副刊《淺水灣》等舊刊物，也讀了《海洋文藝》、《詩風》、《八方》、《素葉》等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刊物，這些刊物，有的已經停刊，然而尚在人們言談之中；有的在苦苦掙扎之下風雨飄搖、朝不保夕。我對於這些在商業繁華而文化寂寞的環境下堅持文學理想、引進新潮的文學刊物及其背後的文學工作者充滿敬意。報告寫成以後我差不多也回上海了，以後的年月，忙於各種雜務和教學科研，對收集了幾箱的香港文學資料並沒有很好地利用和寫作，當時的中國文學正處於百廢待興的階段，吸引我去關注的事情實在太多；再說港台文學也有專門的研究者當作一塊新開墾的處女地在拓荒和開發，碩果累累，大廈將巍峨崛起。我偶爾站在門檻朝裏窺探，聞得堂奧裏一片奮發之聲，也就會心地一笑，沒有再擠進去添磚加瓦。

現在，這幢大廈（也可以稱之為學科平台）已經十分壯觀了。從香港文學到台港文學進而拓展為世界華文文學，規模愈來愈擴展，隊伍也愈來愈壯大，機構也愈來愈多元。我知道這幢大廈的真正設計師是曾敏之先生，作為一個學科意義上的研究領域，從香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都是按照曾先生的理想藍圖，一步一步地進行着。30 年前，曾先生第一篇介紹海外文學的文章就是《港澳與

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這輕輕一瞥，就涵蓋了今天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和主要範圍。現在，國內高校裏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科發展，正在接近、並且圓滿地體現他的理念及其整整 30 年為之不懈的努力。

毋庸諱言，曾敏之先生是香港文壇的左翼文學領軍人物，這體現了他的一貫追求的進步理念。曾先生不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他的前半生的經歷，與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一樣，與苦難的中國同歷艱辛，共過患難，在南中國許多城市當記者、編輯、教師、作家，疾呼民主、宣傳抗戰，追求進步，盡了一個知識分子為國家為民族的應盡責任。但在他年過花甲之時，人生命運有了一個重大轉折，他被派遣到香港主管《文匯報》的編務大業，更主要的是，中國執政黨和政府需要他到香港，以文化領域為陣地，重新調整「文革」中被極「左」路線破壞了的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關係，在香港回歸已成定局以後，還需要他作為香港文化人的一面旗幟，團結大多數香港作家和知識分子，為香港回歸以後的文化建設作好準備。曾敏之先生是以官方人士的身份到香港展開工作，同時他又是一個頗有清流聲望的知識分子，他在 1957 年被錯劃右派，在「文革」中吃過苦頭，並且在以後的種種大是大非的風浪面前，也始終保持了知識分子的良知和風骨。這樣的知識分子，註定在 20 世紀中國的政治風浪裏要承擔更多的歷史責任。上世紀 30 年代開始，中共黨已經意識到：文化與軍事是革命事業中不可偏廢的兩條戰線，因此，如何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利用知識分子的崇高聲望來配合實現革命目標，成為一條重要的經驗。曾敏之先生在中國歷史關鍵時刻被委以重任，南下香港領銜左派文藝陣營，這正是從 1930 年代樹

立魯迅、茅盾為左翼作家聯盟的旗幟、1940 年代樹立郭沫若為文化界領軍人物、樹立聞一多與朱自清為進步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一脈而來，這也決定了曾敏之先生後半生重建輝煌的人生道路。

曾先生果然不辱使命。他不僅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和足夠的誠意，更主要的是，他前半生的經歷幫助了後半生的成就。他具有優秀記者的資歷和敏銳性，使他在魚龍混雜的香港文化界縱橫捭闔，游刃有餘；他具有長期編輯的豐富經驗和高瞻遠矚，使他能駕輕就熟地利用《文匯報》在海外的聲譽指點江山，振聾發聵；他具有作家的才情與文筆，使他立足於香港縱情文壇，文史雜論、詩詞散文雙管齊下，為香港文藝添了光彩；他更具有大學教師和學者的學科眼界和學術思維，從一開始他就把香港文學從一般報刊評論的小圈子裏擺脫出來，使其與高校、研究所緊緊捆綁在一起，使之進入高校教學領域，逐漸發展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並且，學者的眼光使他不是孤立地把握香港文學，卻是逐漸與台灣文學，進而與世界華文文學緊緊聯繫在一起，開創了一大片嶄新的研究空間，使之成為與中國內地文學並駕齊驅的一門新學科。從香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科發展歷程，今天只是順勢而行，但從一開始奠定基礎的時候，非曾先生的雄才大略，絕不可能有今天的壯觀局面。曾先生在這 30 年的努力——利用高校學術體制，爭取各種學術資源，培養新的學術梯隊，以及組織各種學會、會議來推動其工作，都是一個有機的大工程，事實證明，曾敏之先生真正做到了「港澳回歸、台海統一，要從文學、文化交流着手」的戰略目標，從不辱使命出發，從知識分子的良知出發，最後成就了一門學科的建立與兩岸文化的交流。

很可惜，我與曾先生交往不多，認識不足，也沒有機會從頭細說，探討其 30 年香港生涯的經驗得失。但研究曾先生，是香港文學研究、海外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重要一環。回顧以往，復旦大學在曾先生的支持下舉辦過兩次學術會議，我在會場裏有幸一睹先生的莊嚴法相。以後又多次去香港參加學術活動，也聆聽過先生的朗朗演講，印象極為深刻。因此，聽說陸士清老師已經完成了三十餘萬字的《曾敏之評傳》，不自覺由衷地感到喜歡。

記得在 1981 年，我還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唸大四的時候，陸士清老師開設了台港文學的課程，在當時大約也是全國高校裏最早開設此類課程。陸老師講台灣文學不僅僅講鄉土派和現代派，還介紹了台灣在 1950 年代早期的軍中作家，講司馬中原和朱西寧的小說創作，這讓我們大開眼界，知道了海峽的另一端還有着多姿多樣的文學創作。後來我在學術生涯裏多少也涉及到台港文學的研究，最初的興趣就是陸老師教授予我的。我以後的成長道路上，陸老師一再提攜有加，還記得 1988 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時，偶爾遇到作家施淑青，我們在港島一家賓館的咖啡廳裏聊到凌晨，過了擺渡和地鐵通行的時間，無法回去，正巧陸老師也在香港探親，臨時借宿在陸老師的親戚家裏，與老師同住一室，又接着聊天聊到東方微微發白。現在想起來真是令人神往。今天，陸老師也已經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高齡，伏櫪之志未減，成就了這部大書，可敬可佩。老師囑我為之作序，敢不從命！特此恭敬地寫下幾句，請教於曾先生，請教於陸老師。

2011 年 3 月 6 日寫於魚焦了齋

假如中國現代小說也有「大傳統」

——紀念夏志清先生

一

夏志清先生晚年唯一的一次來中國內地，是在 1983 年春夏之交，他應錢鍾書先生的邀請，走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接着來到上海，訪問復旦大學。好像那一次並非是學校主動邀請的，夏先生的一個親戚，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王繼權先生，他看望親戚順道訪問復旦。那個時候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在台灣出版不久，內地學術界有許多左派人士正在憤怒聲討、竭力抵制，官方很難善意地接待這位被認為是「反共」的學者。我不知道他在北京受到怎樣的接待，他來復旦似乎沒有被宣傳，只是悄悄地來又悄悄地離開。當年參加接待的賈植芳教授的日記裏記載了這段歷史，不妨引用一下：

六月二十九日

半陰雨，九時到物理樓外賓接待室等候夏志清教授（Prof. Hsia. C. T.）。他準時由文研所人員陪同到了，一同接見他的有陸、吳、王三位，外事組人員，照料一下就不見了。

由於此人政治思想觀點反動，接見規格放低了，由上午九時到十一時半，既未留影，也未賞飯。

談了許多文學事務，他問：「周揚講話還有人聽嗎？」他敬佩錢鍾書，當他看到我寫的名字時，大吃一驚說：「賈植芳，你是胡風派嗎？了不起的人物。」這後一句顯然是從他的反動立場說的。這時吳中杰插話說：「夏先生，你的書裏把賈先生的名字寫錯了。」陸士清忙不迭地說：「賈先生曾被劃為……」他說起胡風說：「他現在病危。」這顯然是他在北京時聽說的，又問起路翎，提起《財主底兒女們》，這時陸說：「夏先生大概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參觀一下圖書館吧」，他想把話題扯開，眾人起身，夏又過來和我握手，連說：「賈植芳，賈植芳……」說：「你們姓賈的有名的人物……」我說：「是的，最有名的是賈寶玉……」大家哄堂大笑，氣氛轉過來了，陸緊靠着他，談說不已。在圖書館轉了一圈後，陸說：「我和夏先生坐車子校園轉轉，你們回去吧！」於是會見結束，我們三個走了回來。¹

……

這則日記收錄在賈先生的《早春三年日記》。當時賈先生日記裏還有一則寫到夏先生來復旦的消息：

六月二十六日

下午吳中杰來，說是二十九日夏志清來訪，要看看夏的書，準備準備，當着 XX 去王繼權處取回《中國現代小說史》，

1. 賈植芳：《早春三年日記（1982-1984）》（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179。

由她送吳。夏的這本書，論及胡風時提到我，不過把我的名字寫成「賈冀汭」了。……²

這兩則日記文本值得細品。時間是 1983 年，「清污」運動正在醞釀中，以周揚名義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已經引起了黨內高層的爭議。夏志清對話裏問：「周揚講話還有人聽嗎？」應該是指這個背景。而賈先生雖然蒙冤 20 年的所謂「胡風分子」已獲平反，但心裏留下了陰影和警惕，在日記的措辭頗費斟酌。但先生畢竟是作家，寥寥幾筆，在場的氣氛和各色人物的神態立場都活靈活現。在場的三位接待者中，「王」就是王繼權先生，他是夏先生的親戚，陪在邊上一言未發；吳中杰先生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主要任務是擔任理論上的對話者，所以早幾天就借閱夏志清的書，有備而來；賈先生作為名流出場，言談顯然受到限制，只能王顧左右而言他。而擔任這次接待主導的是陸士清老師。我事後問過陸老師，接待後誰請飯？那時已經十一點半了，他說是接待完了，夏先生被送回王繼權家裏吃飯了。這也就是賈先生所說的，「接待規格放低了」。一本《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傳閱似乎也是圍繞着接待工作：據賈先生日記記載，1982 年 12 月 24 日由何滿子先生送給他這本書，第二天就開始閱讀。閱後又借給王繼權，在夏志清來復旦的前三天，又借給吳中杰做接待準備，很及時地派上了用場。

2. 同上，頁 177。

我想夏先生也一定感覺到接待方的冷淡。2000年我訪問哥大，王德威教授在一家中國餐館請客，夏先生夫婦也到場了，西裝革履，風度翩翩，談笑中我又提起他當年在復旦的訪問，他轉開話題沒有接着說下去，只是禮貌性地問了一下賈先生的身體是否健康。去年初我再度去美國，在紐約轉道波士頓，特意從紐約出機場，打算去拜訪夏先生，前來接我的宋明煒、陳婧祯事先也與夏先生聯繫好了，但是天不助我，竟下起了迷漫大雪，明煒擔心晚上雪地開車危險，就在電話裏辭了這次拜會。沒想到這一辭，我就永遠失去了再度聆聽夏先生妙語的緣分。

二

夏先生是以《中國現代小說史》而獲名於內地學術界，這本書直到前幾年才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印了內地簡體字版，大約是刪節本。我早年讀的台灣傳記文學的繁體字版，那是劉紹銘先生組織一群人集體翻譯的，也是目前最通行的本子。真正讀過英文原本的內地學者可能並不多。這本書最早於1961年耶魯大學出版，由此奠定了夏先生為海外現代文學研究界的祭酒地位，到了1971年夏先生對這本小說史做了很多方面的修訂，出版了第二版。待1979年中譯本初版前，夏先生又為它寫了一篇長序，在這篇序裏，他對自己從一個專攻西方文學經典的博士生如何轉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治學歷程作了認真總結。可貴的是，他對於這本著作中用西方經典的標準來批評「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偏見作了反省。他對於自己在寫作時因為資料不足而忽視蕭紅、低估吳組細、蕭軍等都做了自我批評，他強調了「中國現代文學是揭露黑暗、諷刺社會、維護人的

尊嚴的人道主義文學」，還誠懇地說：「總括一句話，本書 1961 年出版後，中國新舊文學讀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學革命』以來的這個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認同。比起宗教意識愈來愈薄弱的當代西方文學來，我國反對迷信，強調理性的新文學倒可以說是得風氣之先。富於人道主義精神，肯為老百姓說話而絕不同黑暗勢力妥協的新文學作家，他們的作品算不上『偉大』，他們的努力實在是值得我們崇敬的。」³ 讀此，我覺得當年夏先生橫空出世的狂妄精神已經被消磨得乾乾淨淨，完全回歸於兩岸認同的主流文學價值觀了。

我不知道應該如何評價夏先生的文學史觀。記得我在 1980 年代初閱讀這本小說史的感受真是振聾發聵。之前，我已經讀過丁易先生、張畢來先生、劉綏松先生的文學史，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更是我學習現代文學的啟蒙書。但這些文學史著作，雖然理論表述不盡相同，基本立場與視域的狹隘性是共同的，他們只有一個視角，就是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再從「左翼文學」到「延安文學」，除此以外，都被否定或者遮蔽，這一個視角，當然也是現代文學史的傳統之一，是一個內涵被不斷縮小的傳統。這個傳統後來發展到「文革」時期否定所謂「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時候，文學史的內涵就成了「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了。我剛進復旦中文系上課時，用的仍然是復旦教師自己編寫的文學史，好像不是公開出版物，書裏沒有淪陷區文學，當然也沒有錢鍾書、張愛玲的內容，周作人、徐志摩等都是作為反面人物供批判的，所以，今

3. 以上兩段引文均引自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頁 14-15。

天的研究生很難理解當時學習現代文學的環境。一部現代文學的歷史，基本上是被意識形態不斷扭曲的歷史。在那種情況下讀到夏先生的小說史，雖然不是直接針對學術界的現狀，卻是提供了另外一種全新的、然而也是更加全面的參照系。

我不是說，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所有觀點都是正確的，也不是贊同他所有的觀點。但是夏先生是很明確的，他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當然對於怎樣的作品才算得上「優美」，還是有討論的空間。但是要說明的是，夏先生並不是一個政治偏見決定一切的人，也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思維的學者。內地學界在 1980 年代簡單扣在夏先生頭上的「反共」帽子，可能是說明夏先生的政治立場，但是不能簡單說明他的小說史立場。夏先生早年讀博士期間，為了生計，加盟於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饒大衛（David N. Rowe）的工作團隊（年薪 4,000 美金），參與編寫為朝鮮戰爭的美國軍人了解中國情況而準備的《中國手冊》（分上中下三卷），饒大衛擔任主編，夏先生參與編寫其中的「思想」、「文學」、「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以及「禮儀」、「幽默」兩小節等。這裏的「思想」指的是孔孟儒家傳統思想，「文學」涉及到魯迅、周作人、沈從文等現代文學。這是夏先生首次涉及現代文學的內容。但是這部手冊編完後並未被錄用，只印了 350 本「試印本」。但夏先生由此產生了研究現代文學的興趣，便向洛克菲勒基金會申請了一項研究項目，就是《中國現代小說史》。很多人誤以為夏先生的小說史是從《中國手冊》改編過來的，其實，夏先生參與編寫《中國手冊》與後來他自己撰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兩回事。即使《中國手冊》出於「反共」的目的而編寫，與《中國現代小

說史》的學術研究也沒有直接的關聯。我們從這部小說史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固然有「反共」立場，但是他一旦接觸到文學作品，審美意識馬上就佔了上風。他對張天翼、吳組緬等左翼作家的論述和讚揚，批評矛盾的《子夜》不如《虹》與《蝕》，讚揚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都是從審美立場出發的。我們可以不同意夏先生的審美標準，但這與意識形態的「反共」大約關係並不是很大的。

三

在以後幾版《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夏先生的文學史觀雖有變化，但他並未對 1961 年版做過太多修改，他只是增加了許多附錄，同時又寫了許多論文，如對嚴復、梁啟超、端木蕻良、徐枕亞等不同人士的研究，甚至一直期待着能夠重新寫出抗戰以來的中國小說研究和晚清小說研究，夏先生是在不斷進步着，努力營造一個中國現代小說的「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他在 1961 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裏梳理出魯迅、茅盾、張天翼等代表的左翼文藝，沈從文、師陀等代表的鄉土民間文藝，張愛玲代表的現代都市文藝，以及錢鍾書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諷刺文藝等四大傳統，基本上也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格局，比起我們以前唯左翼文藝獨尊的狹隘文學史觀，自然是更加全面和符合歷史真相。

夏先生本來的專業是研究英國文學經典，深受西方新批評的影響。上世紀 40 年代的英國批評家利維斯 (F. R. Leavis) 對英國小說的「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 的研究讓夏先生對其「評審小說之眼力，嘆服不止」。所以他處處以西方經典文學的標準來衡

量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有的地方給人很多啟發，也有些地方用得不倫不類，但是我們不能不佩服夏先生的藝術鑒賞力和評審眼光。他無意之間的挑選和評鑒，揭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基本傳統的內涵。以前我們一說起「五四」新文學傳統，就是魯迅為首的啟蒙主義或者是激進的左翼文藝傳統，似乎就是一條直線發展而來。近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自從我提出了「先鋒」與「常態」兩種文學發展模式以來，我愈來愈意識到，「五四」新文學運動，最初是以激進的先鋒模式來運作和發展的，它對社會構成猛烈的挑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先鋒文藝運動又是一種激進的文化批判運動，它不可能持久地進行到底，很快就會與政治的激進主義相結合而自我消亡，或者就是轉而退回到文學藝術的審美形態（唯美主義）。因此先鋒運動必然是短暫的，它需要用不間斷的自我否定、此起彼伏的波浪式向前推進。從「五四」文學革命—革命文學—左翼文學而形成的先鋒文藝傳統，就是這樣一個帶有核心性質的文學發展軌跡。但是這一傳統到了 1930 年代已經是外部危機四伏，內在矛盾激化，難以為繼。而正是在這個時候，新文學出現了新的轉機，沈從文、蕭紅、沙汀、艾蕪等為代表的鄉土民間文學創作和李劫人、老舍、張天翼、張恨水為代表的都市民間文學創作先後崛起，他們的創作與「五四」主流的知識分子從啟蒙到革命的戰鬥傳統是有些不一樣的。他們似乎更強調民間性和文化意識，無形之間補救了「五四」新文學先鋒傳統的危機，把新文學的創作推向新的審美階段。抗戰以後先鋒文學傳統依然作為主流在蓬勃發展（巴金、路翎、無名氏、艾青、穆旦等），但是在常態發展的模式上，民間性的文學創作則更加繁榮，沈從文、師陀、趙樹理等各色鄉土民間傳統，張愛玲為代表的都市民間傳統（包括電影藝術），還有

就是錢鍾書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諷刺傳統都已經形成。這些新傳統與「五四」新文學的主流傳統一起構成了現代文學傳統的內涵，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最初從文學史的角度解釋了這樣一個多元共存的文學史「大傳統」。

所以，我不贊同一般人所說的，夏先生一炮而紅了張愛玲、錢鍾書和沈從文，好像這些作家都是被夏先生的小說史捧紅的，連夏先生本人也表示異議：我還高度評價張天翼，為什麼就不紅呢？在我看來，張、錢、沈諸位作家本來就擔當得起文學史上的大家地位，他們不肯隨波逐流，敢於自立門戶和流派，尤其是張愛玲和沈從文，開拓了「五四」傳統以外的城鄉民間寫作，自有千秋功業顯赫於世，不是靠誰能夠隨意捧紅的。不過是 1949 年以後以主流意識形態偏見來編寫的文學史有意遮蔽了他們的文學史地位，獨尊一家而罷黜百家，才使我們變得無知狹隘而且愚蠢。夏先生在海外沒有受到偏見的遮蔽，才能夠以審美趣味的立場來評價文學，大大開拓了現代文學傳統，還原了本來應該就有的歷史面貌。

說到這裏我不由想起了安徒生童話裏的那個說皇帝新衣的孩子，老頑童似的夏先生，無意間就扮演了那個童言無忌的孩子。

2014 年 1 月 20 日寫於魚焦了齋

《梁披雲評傳》序¹



我最初聽說梁披雲先生之事跡，是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福建泉州將重建黎明學園的時候。那時我還在復旦大學學習，準備撰寫有關巴金的論文，我對巴金南國之夢的描寫，非常嚮往。一次聽吳朗西先生說起，泉州的老朋友們正在重建黎明學園——「重建」，也就是意味着對 1930 年代安那其主義者們視為理想人才培育基地的黎明高中（及其系列中學）的肯定和復興。吳先生給我看一些信件和材料，還告訴我，他準備捐贈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給黎明學園。在這些材料裏，我初次看到了梁披雲先生的名字。我大致了解，梁披雲先生是重建黎明學園的主要支持者和資助者。

福建是華僑菁英薈萃之地，素有集資民間辦學的傳統。陳嘉庚籌辦的集美中學、廈門大學便是最輝煌的典範。我所服務的上海復旦大學，歷史上也混雜了閩籍華僑集資辦學的血緣傳統，著名教育家李登輝先生的毀家辦學便是最為感人的例子。民間辦學，自然不及官家辦學那麼財大氣粗，但是也有官家學堂所不及的長處，那就

1. 本章原刊於梁燕麗：《梁披雲評傳》（澳門：三聯出版〔澳門〕有限公司，2015 年）。

是相對自由的學術理想和比較樸實的服務精神，多為貧民子弟所歡迎。而本文所談到的泉州黎明高中，卻是一個民間辦學史上的「異類」，它的創辦人在教育理想之上，還有着一種更高境界的人類理想。當年黎明高中的主要創辦人許卓然、秦望山兩位先生，都有開明的見識和遠大胸襟，他們所賞識的青年才俊梁披雲，更是先在上海大學的革命氛圍下接受了先進的思想意識，經歷過大革命的風風雨雨。梁披雲擔任黎明高中第一任校長時才 21 歲，是我們現在一個本科畢業生還不到的年齡。

從這本傳記提供的資料來看，梁披雲的成長道路，與他在 1920 年代上海大學求學經歷有密切關係。上海大學本身集合了國民黨左派、早期共產黨人、安那其主義者三種政治背景的勢力，營造了一種與北洋軍閥官方勢力相對峙的革命氛圍。梁披雲在上海大學與各種人物風雲際會，接受的思想影響也是多方面的，但從幾位傾心相交的密友來看，他基本上還是屬安那其的圈子。如沈仲九是 1920 年代最負盛名的安那其主義者，同時在國共兩黨之間也有足夠的威信。1920 年代後半期，活躍在上海的安那其主義者的活動陣地，如匡互生創辦的立達學園、李石曾為後台的勞動大學、畢修勺為主筆的《革命周報》、巴金為骨幹的自由書店和《自由月刊》等，其之間的政治傾向或有不同，成員之間也時有爭論，但是沈仲九則一視同仁地參與所有活動，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另一個朋友秦望山，老資格的國民黨員，又是安那其主義的信奉者，他在福建主持晉江縣黨部宣傳養成所，表面上為國民黨培養幹部，其實培養了不少信仰安那其的軍事人才，他還在泉州組織民團武裝，努力掌握槍杆子，這在中國安那其運動中是非常特別的舉動。

因為安那其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社會運動，基本上排除了軍事活動，所以缺乏武裝力量，一旦遭遇反革命的暴力鎮壓，便毫無懸念地陷於失敗，而秦望山利用養成所和地方武裝，培養了不少軍事人才，而且在後來的實際戰鬥中還發揮過作用。不知道我的記憶對不對，巴金在短篇小說《星》裏好像就寫過泉州民間武裝的故事，可能就是寫秦望山領導的民團。像沈仲九、秦望山這些安那其主義的前輩，既不是安那其運動中投靠國民黨上層的右派（如吳稚暉、李石曾等），也不是偏向恐怖行動的極端分子，他們政治態度持中庸之道，與國民黨上層虛以周旋，在地方上也能夠保持一定的實力，盡其可能從事理想主義的改良運動。梁披雲由於朋友圈子的關係，所接受的思想、所走的道路，與沈仲九、秦望山較為相似。這為他一生從事的理想主義的事業奠定了基礎。

我以前在研究中國知識分子類型時，曾經提出過兩個概念：崗位型知識分子與流浪型知識分子。他們之間的差別，不僅在於是否居有定所，而是看他們所追求的理想，是與自己的工作崗位牢牢結合在一起，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還是漂浮在政治想像的空間，縱容自己不安定的靈魂去做永遠的探索。從現代文學的歷史看，大多數左翼作家都是流浪型的知識分子，包括早期的安那其作家巴金；巴金是到 1935 年底，由吳朗西、伍禪、郭安仁等人在上海創辦了具有安那其色彩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邀請他擔任總編輯以後，才逐漸轉變為崗位型知識分子。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建立，正是在泉州的黎明高等學校被查封、理想教育實驗失敗以後，一部分知識分子轉移到上海後的創舉，這也可以看作是黎明理想之火的傳遞不絕。梁披雲先生從一開始就具有崗位型知識分子的特點，他

不管從事什麼工作，首先是把信仰落實在具體的工作崗位之中，他從 21 歲擔任黎明高中的校長起，就開始履行一系列的教育主張。看得出，梁披雲的教育思想，貫穿了兩個傳統：一個是來自安那其的高遠的人生理想與倫理追求，另一個是來自黃炎培、陶行知等人的職業教育與服務社會的實踐，兩者構成了黎明高中的雙重品格：既是一家民間辦學、為貧民子弟傳藝教習的場所，同時又是灌輸安那其高尚人格、社會主義遠大理想的教育聖殿。因為後者，黎明高中才能藏龍臥虎，以反叛精神培養大批時代俊傑，直到最後被國民黨當局所查封。

這本傳記裏提到：梁披雲掌黎明高中只有一年多的時間。1930 年秋，他按照前約辭去校長職務，負笈留學。（他原來準備去德國留學，但因為把家裏替他準備的留學經費 6,000 兩白銀都捐給學校購買儀器設備，只能改變計劃去日本。）黎明高中校長由政治態度更為激進的吳克剛擔任，吳克剛曾在法國直接參加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與巴金、衛惠林等人引為知己。他推行一套更為理想主義的做法，並且引進著名的安那其主義者擔任教職，葉非英就在那時擔任了平民中學校長。巴金三次南下泉州尋找「南國之夢」，也是在這個時期。泉州的社會影響是大大被擴大了。但我注意到，作者寫了一個細節：「大多數的安那其主義者主張具有火藥味的『社會革命』，徹底地滌蕩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思想。這樣，在社會條件尚不成熟的狀況下，安那其主義陣營內也很容易造成互不服氣，互相排斥和鬥爭的局面。根據時人記載，在黎明高中也曾發生過校潮一幕。自從多位安那其主義社會革命者到校後，他們的思想更為激進，在留學資格或學術地位上亦甚高，對於梁龍光領導校政不很服

氣，或者對於比較單純的教育理想不以為然。他們以閩南地區偏居一隅，思想活動較為自由，希望把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等變成安那其主義活動的大本營。」我由此猜想，梁披雲離開黎明，是否背後還有着更為隱秘的安那其陣營內部衝突的原因。自然，吳克剛所造的聲勢雖大卻不長久，這也是中國特色的現實環境所致。在中國，即便現在也一樣，要做一點與理想有關的事情，最好是低調處理，多做少說，否則不易成功。只可惜當時少年氣盛的安那其們並不了解這個國情，運動終究歸於失敗，煙消雲散。所以，黎明高中的歷史也折射出中國安那其的歷史，其得失成敗，都以此教訓。

二

以上諸段，是我閱讀梁披雲先生傳記所獲的一點心得，也是我研究巴金與中國安那其主義運動的過程中，對泉州黎明高中與平民中學的理解。梁披雲先生的傳記，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在以上領域知之甚少的欠缺。梁披雲先生後半生的經歷更傳奇。1949年以後，披雲先生去國南下，在印尼繼續從事華僑子弟的教育工作，主持過許多華僑學校。安那其的政治社會理想暫且隱下，轉化為教育理想和倫理追求，服務於海外華族，成績斐然。1960年代以後，神州內地掀起「文革」惡浪，禍披海外，東南亞各國政府對於中國的輸出革命採取了抵制措施，殃及在地華僑，反華的腥風血雨給華僑們帶來了慘重損失和生命危險。此時梁披雲先生作為知名的僑界領袖，毅然擇居澳門這塊福地，豎起澳門歸僑總會的旗幟，排除難以想像的困難，向世界各地的受難華僑伸出援助之手，澳門成為逃亡華僑得以庇護的諾亞方舟，其功莫高焉。1980年代以後，梁披

雲先生又響應老友秦望山的後人的倡議，乘中國政府實行「改革開放」的東風，率梁氏家族的全體力量復興「黎明」，由黎明學園擴大為黎明大學，造福於世世代代的鄉親子弟，其德莫大焉。理想就是一把火，一旦在胸中點燃，就會支配一生的行動。其功其德，順風順水，都在晚年梁披雲的生命歷程中莊嚴圓滿。

這本傳記還有一個特點，作者在敘事中由傳主帶出了全體群像。理想是一種召喚，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是獨善其身的苦行僧，而是能夠率領周圍的人群，以其人格魅力團結大多數人們共同來完成高尚理想的追求。傳記中第三章和第十章，兩度濃墨酣寫梁披雲先生與泉州「黎明」的故事，前章寫了安那其主義者群體在泉州前赴後繼的悲壯歷程；後章又寫了當年故友和故人後代薪盡火傳再造「黎明」的歷程。真是理想之火不熄，動人心弦。不由使我想起本雅明的一段話：「如果是這樣，那麼在過去世代的人與我們這代人之間就存在着一種秘密的約定；那麼我們就是被期待着到地球上來的人，那麼我們就如同每個此前世代的人一樣地攜帶着微弱的彌賽亞力量，它正是過去事情所要求的。這個要求不能廉價地得到滿足。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此是了解的。」——關於這段話，我不是從本雅明的著作裏看來的，而是從七月派詩人曾卓先生的女兒萌萌的一篇發言稿裏看到了，我很喜歡這段話，曾經在其他地方也引用過。這是差不多近十年前的事了。現在，萌萌也已經去世多年了，我又一次想到了這段話，再次把它寫出來，作為這篇序言的結尾，以表達我內心深處對中國的理想主義前輩們的敬意。

2015年7月24日於魚焦了齋

陳映真先生

我最初接觸陳映真先生的作品，是在 1980 年代初讀大四的時候，那時復旦大學中文系在全國率先開設台灣文學的專題課程，主講老師是陸士清老師。我認真聽了這一門課，其中講到陳映真的創作，教材裏還入選了《將軍族》。我當時對台灣文學一點也不了解，對「外省人」、「本鄉人」這類概念也沒有什麼感性認識，但是這篇作品裏瀰漫的淒苦悲涼的氛圍，卻深深地打動了我。不像讀其他台灣鄉土作家的作品，在語言上、意象上總是有些隔閡，而讀陳映真的小說，撲面而來的是一種熟悉的氣息，用略微神秘的感覺來形容，他的文字間有似曾相識的感情密碼，讀來非常親切，生出一種「自己人」的文學感情。後來讀了更多陳映真的資料，才知道他在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初期，曾經受到過魯迅小說的影響，這就難怪讓我產生朦朦朧朧的熟悉感。

過了若干年，香港有家出版社推出一套「台灣文叢」，其中有陳映真的一本小說集《趙南棟》。那是陳映真在上世紀 80 年代創作的一組作品，其中最後一篇〈趙南棟〉創作於 1987 年，而 1988 年就通過香港出版傳入內地了。當時復旦大學有一個台港文化研究所之類的機構，編輯一本內部刊物，上面還出過專輯討論〈趙南棟〉。大約是那個討論專輯吸引我去讀了這組小說，但我讀後覺得，與我以前讀的陳映真的作品不一樣了。那時候的台灣社會，正

處於權威體制崩潰的前夜，民主運動風起雲湧，陳映真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一個標杆式的人物。他從監獄裏獲釋出來，積極走上社會，在思想、文學、藝術、出版等多個文化層面團結了一批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投入「社會改革」的實踐，他創辦的人間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十五卷《陳映真作品集》，海峽兩岸也都推出陳映真小說選。可以說，這是陳映真人生事業的巔峰時期，如日中天。可是，我在讀〈趙南棟〉及相關系列小說時，分明看到他的內心深處隱藏了無可迴避的焦慮感。一種對未來失望的頹敗心理，無情地盤旋在蔡千惠、趙慶雲等人物的靈魂裏，他描寫這批曾經的革命者、受難者們在彌留之際，面對着他們的後輩——碌碌無為的年輕人，發出絕望的悲苦尖叫。這是無聲的尖叫，你聽不到聲音，卻感受到靈魂在發顫。

我最近讀了報上悼念陳映真的文章，有一篇文章裏這樣寫道：「1988年是兩岸文化交流最頻繁的一年，那年映真先生在北京同全國台聯、中國作協接連舉辦了呂赫若、黃春明和自己的作品研討會，後又舉辦了楊逵作品研討會，這些研討會對愛國的、熱愛中華民族文化的台灣作家的主要作品，進行深入剖析、解讀和宣揚。」¹很明顯，就是在這個時候，陳映真把自己的活動範圍從台灣島提升到了兩岸以致東亞地區。他為了接近自己所奮鬥的理想——一個對20世紀進步知識分子極有吸引力的理想，他跨出了海島，希望從海峽對面獲得支持。對於這一步，他不是沒有疑慮的，從他的小說

1. 何標：〈他一生都是英勇的鬥士〉，《文藝報》，2016年12月9日。

裏的人物蔡千惠的嘴裏，已經說出了這批老左翼心底裏的憂慮，但是他還是要親自去實踐，為英特納雄耐爾實現而奮鬥。自然，陳映真的主要活動還是在文學和文化領域，在這些領域裏他威望日隆，左右逢源，一旦邁出了這個領域，成功就很難說了。

我最初見到陳映真是在 1990 年代初的日子裏。那時候內地的改革事業受到了政治風波的影響，知識分子的情緒普遍低落。王安憶毅然把陳映真當作一面精神風旗，寫出了《烏托邦詩篇》。我從王安憶的小說裏看到陳映真對她的影響，在這種特殊的時刻，陳映真成為一種精神之塔的象徵，被內地作家用來當作抵抗精神低迷的思想武器。那麼，陳映真本人是怎樣看待內地知識分子當時所處的精神狀態的呢？大約是這段時間中的一天，王安憶約我和王曉明去一家賓館面謁陳映真，我們一起在賓館大堂裏談了好幾個小時，講話的具體內容已經忘記了，大致的印象是他的狀態很好，興致勃勃地給我們分析世界形勢，指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危險，囑咐我們利用當下低迷的時期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認識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可能對人們帶來的異化作用。他對美國的資本主義非常反感，批評現代社會的人們每天就是麻木地工作，到了周六，就開着車去超市買一大堆東西，回來塞在冰箱裏，然後又周而復始地重複上一周的生活。他邊說邊用兩隻手比劃那種麻木地開車購物的動作，讓我突然想起他在《山路》裏批判這種追求物質享受的生活時用了一個詞：「家畜化」，指的是完全「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人們。時隔二十多年，我現在回想起那次談話，已經懂了他當時引導我們的意思，但在那時，我覺得他談的思想與我們遭遇的現實處境很遙遠，有點不知所措。不過，他的尖銳的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樣的與青年人的思想交流，在陳映真先生的日程安排裏，應該是經常性的節目。事後他肯定忘記了這次談話。當 1997 年我應聯合報邀請去台灣訪問，報社副刊的負責人安排一次飯局，在這個飯局裏我見到了陳映真夫婦，他已經想不起曾與我見過面，人也明顯發胖，在飯桌上他說話很少，神情有點寂寞，似乎心不在焉，與當初鼓勵我學馬列時的精神狀態有了很大的不同。

大約是 2003 年，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舉辦花蹤世界華文文學大獎。花蹤大獎第一屆得主是王安憶，當醞釀第二屆得主候選人時，王安憶、焦桐與我一起提名陳映真，經過了評委們幾輪商量，陳映真成為第二屆大獎的得主。那次在吉隆坡我又一次見到了陳映真夫婦，在幾天的活動中，我們都在一起，但是彼此交流還是很少。在我的眼裏，他似乎更像一個慈祥的老人，笑咪咪的，很少主動說話。而且他人更胖了，動作也有些遲緩，有一次集體乘車去一個什麼地方旅遊，半途中他突然心臟不舒服，大家連忙停車送藥遞水，忙亂了好一陣子。在那次相處的幾天裏，我覺得陳映真心事重重，彷彿內心深藏着巨大的糾結。在一些知情人的嘴裏隱約地知道，他在台灣的事業大約處於不順當的時候。這次活動結束後，我們在吉隆坡分手，我回到上海，他們夫婦好像是到內地什麼地方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但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映真先生手寫的信件，很短，大概的意思是說，他過去有些誤解我，曾在一個會上批判過我，現在他表示向我道歉。我看到了這封信真有些發懵，因為我從來不參與他們那個領域的活動，而且對陳映真始終充滿敬意。我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已經得罪了某些人士，如果不是這封短信，我還完全蒙在鼓裏。但雖然如此，我畢竟是長期在這個環境下生活，對於有些事情

的發生並沒有感到特別的意外，倒是隱隱地對映真先生有了一點感激之心，覺得我終於成為他所信任的人了。

再以後，就是陳光興教授穿梭般的來往新竹與上海，籌劃在兩地同時舉辦陳映真思想與創作研討會，還準備出版陳映真的文論選和創作選。我被分配到的任務是寫一篇全面評價陳映真與「五四」新文學關係的論文。於是，我又一次有系統地讀了陳映真的小說和文論，再次直面這個高貴的靈魂。這篇論文裏，我分別討論了陳映真的思想創作與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傳統、茅盾為代表的左翼文藝傳統，以及巴金為代表的安那其主義的關係，我描述了映真先生從繼承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精神到走向左翼文藝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進而站在安那其的理想境界對國家形式和本質進行深刻反省，由此得出結論是：陳映真的深刻性達到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精神的制高點。可是，2006年，在這個學術會議即將舉辦之際，傳來了陳映真先生在北京中風病倒的消息。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見到陳映真先生，也沒有聽到陳映真真實情況的消息，想來重病的他也不會讀到我的論文和這個學術研討會的所有文獻，從此再也聽不到他睿智而鋒利的談話了。

2016年12月12日於魚焦了齋

青春日新

系列 取名於《詩經·鄭風·子衿》，由多位著名的人文學者執筆，挑選了一些較通俗而有啟發性的隨筆文章，既有學術內涵，又富趣味，深入淺出地總結了文、史、哲、藝各個領域的學術研究，旨在讓讀者對學術產生興趣，並在人文思維方面得到啟發。

教誨提攜照亮前路 良師恩澤銘刻於心

韓愈《師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優秀的老師除了教導學生知識外，更能成為學生的典範，感染、引導、鼓勵着學生，影響他們的一生。

本書記述了作者在復旦大學求學和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得到不少先進、師長的教導、指引及提攜，包括賈植芳、巴金、陳子展、施蛰存、王瑤等多位著名作家、學者及教育家，作者以細膩、感性的筆觸敘述了每位老師鮮為人知的軼事，以及與他們相處的點滴與零碎片段，向讀者娓娓道來每位老師對他的教誨與提攜。

作者所寫的每個故事，不但展現出他與老師們深厚的情誼，更進一步反映了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刻劃出他們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面對壓迫、時代衝擊時仍坦蕩無懼、堅毅不屈的高尚人格與精神，值得人師與學生學習。

微信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62-937-404-4



9 789629 374044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